以色列当代文学译丛

AHARON APPELFEL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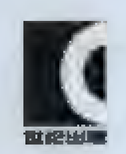
The Age of Wonders

奇迹年代

[以色列] 阿哈龙·阿佩菲尔德 著

杨 阳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奇迹年代 The Age of Wonders

阿哈龙·阿佩菲尔德（1932— ）为当代著名的以色列作家，1983年因在文学领域的杰出贡献，获国家最高荣誉奖"以色列奖"。《奇迹年代》是阿佩菲尔德的代表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奥地利，反犹太人的潜流已悄悄逼近。犹太小男孩布鲁诺敏感地觉察到和睦的家庭正渐渐被压抑的气氛笼罩。布鲁诺的父亲是功成名就的作家，由于犹太身份遭到报刊舆论的恶意攻击，这使一直自视甚高的父亲性情大变，最终逃避现实，抛弃妻儿，投奔到位尊权重的男爵夫人裙下。布鲁诺伴随坚忍的母亲尽力帮助身边的同族人，直至在犹太会堂集会时被出卖送往集中营。二十年后，布鲁诺从耶路撒冷重返奥地利故居，他期待的故友旧邻对他似有若无的回避使他深受震撼，那段特殊历史在人们心中烙下的创伤和悔恨并未随时间消逝……

全篇小说没有正面描写纳粹的迫害，而是细致入微地展示了人性在沉重历史背景下的种种表现：坚忍、背叛和逃避；在平静舒缓的描述中，能时时触碰到作家内心炽热而深沉的爱憎。

以色列当代文学译丛

上架建议：外国文学



ISBN 978-7-5327-4639-2



9 787532 746392 >

定价：22.00元

易文网：www.ewen.cc

AHARON APPELFELD

The Age of Wond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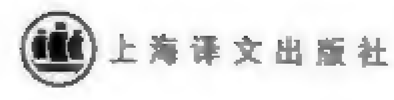
[以色列] 阿哈龙·阿佩菲尔德 著

以色列当代文学译丛



奇迹年代

杨 阳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奇迹年代/(以)阿佩菲尔德(Appelfeld, A.)著;杨阳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1
(以色列当代文学译丛)
书名原文:The Age of Wonders
ISBN 978-7-5327-4639-2

I.奇… II.①阿…②杨… III.长篇小说—以色列—现代 IV.I38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35761 号

以色列当代文学译丛
The Eisenberg Series of Modern Israeli Literature
Aharon Appelfeld
THE AGE OF WONDERS

图字:09-2004-717 号

奇迹年代 〔以〕阿哈龙·阿佩菲尔德/著 杨阳/译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25 插页 4 字数 122,000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5327-4639-2/I·2627

定价:22.00 元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第一部

1

多年以前，我和妈妈乘坐一趟夜班火车回家，我们从一个宁静却鲜为人知的休养地消夏归来。车厢是崭新的，在一面厢壁上挂着一幅广告画——一个手捧樱桃的姑娘。这是一节保留车厢，座位很稳很舒适，靠头的地方套着白色的绣花布套。车厢的前门开着，一个姑娘手里端着木制托盘，她长得很像画片上的那个姑娘。她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突然间，似乎是听到了外面的一声令下，她开始向大家供应夜点咖啡和乳酪蛋糕。

车窗外的那一片暗蓝色使我的脑海中又一次浮现出那一片静水，我和妈妈在那一片水岸边度过了这个夏天。这是一处被遗忘的水岸，散落着各种废弃物；似乎人类也被静静地遗弃在那里。那里有很多鱼，小小的、肉鼓鼓的鱼，从水底安静而又绝望地向上窥视着。它们缓缓地随波逐流，有些哀伤，又有些不安宁，而这种不安宁的心绪也正缠绕着我。

夏日的寂静终结了。此刻我们正在回家的漫长旅途之中。这也是一次奇妙的旅程，充满了一个又一个令人惊异的细枝末节。比如那个脖子上系着绿色丝巾的姑娘，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她看上去就像一位男爵夫人。她倚靠在白色椅套上的脸色显得苍白而透明。就在刚才，两个仆人把她的行李箱放上架子，一个皮肤黝黑、带有一种奇怪的优雅风度的男人吻了吻她的前额。此后她的身体好像再也没有动过。她的目光凝滞，似乎被禁锢在远方的某个小点上。尽管她被稍稍遮挡在帘子的后面，但她的半边脸颊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望着她的侧影，一阵快乐的涌流淹没了我。可是你瞧，这种幸福感已经有了残缺，还没有完全生成就有了残缺，一丝惆怅已然咬啮着我的快乐。这美丽的脸庞将在这次长途旅行中变得形容枯槁，这种暗暗的猜测将我小小的快乐蒙上了一层阴影。为了不错过她脸上的一举一动，我的双眼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

那白皙而纯净的面孔一动不动，又一次让我想起了我和妈妈在被遗弃的水岸边度过的明朗的日子。除了我们，那里别无他人。那些偶尔出现在那里的人，现在我知道，不是自己迷了路就是被指错了路，他们就像芦苇丛中吹过的一阵风一样转瞬即逝。这个夏季，又只有我们留在这片寂静而枯竭的水岸边。那两艘小渔舟显然属于另一些日子，属于另一片在春天涨满的水域。此刻，水流是涓细的，干涸的水岸起了褶皱。那种宁静让我们完全陷入了沉寂。如果说起初还会从我们的嘴里冒出几个词

儿来，渐渐地连这些词儿也消失得一干二净，再无声息了。只有在水里我们才会在一起。我们是偶然来到那里的，就像是出于某种无法解释的突发奇想。妈妈厌倦了那些度假胜地和豪华奢侈的酒店，爸爸从头到脚完全沉浸在他文学事业的成功之中，醉心于从维也纳到布拉格的巡游，一次又一次。他的成功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快乐。某种令人痛苦的压迫感统治着这个家，似乎我们只是一颗微尘，他的成功如同一台压路机一般碾压着我们。或许爸爸也并不快乐。因为当时爸爸离家去了布拉格，妈妈决定我们也离开家，远离人群，前往某个纯朴的荒凉之地。就这样命运把我们带到了那所小屋，在那条溪流的岸边，这条甚至从未有人命名的溪流岸边。最初她是快乐的，慢慢地，她又沉浸到她自己的世界里。她的活动愈来愈少，某种寂寥的感觉渐渐地把我们封闭了起来，如同被罩在一口闭合的钟形罩之下。

只有到了最后一天，当所有的快乐都已被剥夺，那两张乡间的床铺已被腾空，行李箱也已收拾停当只等上路的时候，妈妈才突然哭了起来，痛苦而无声的饮泣。我双膝跪地，极其笨拙地为她拭去泪水。我知道，全新的水流注入了这条河流，我们被从那里驱逐了出来，尽管并没有人对我们说，“快走开。”所有这些寻常而又让人赞叹的事物，只不过是黑面包、鲜牛奶和装在破旧的小篮子里的苹果而已。但这些简单而令人赞叹的事物，在这条无名的河流岸边，现在似乎都不存在了。妈妈在哭泣，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是极其笨拙地跪在她身边，擦干她的眼泪。

此刻行驶在夜色中的火车正在铁轨上平稳地滑动着。真奇怪，这个温柔而全新的空间就好像与那个我们刚刚离开的不知名的地方紧紧相连在一起。每一张面孔或身影都会唤起我对那片绿色水域和那所乡间小屋的记忆。或许那个年轻人，那个坐在轮椅上被推到前排包厢的年轻人，也是在那里与我们相识的。他的脸庞很清秀——仿佛漂浮在他宽大却似乎已完全没有知觉的身体上。他的目光从我身上滑过的片刻，我感觉到，他也在为这里那些正暗自悄悄凋零的残花败柳而忧心忡忡。有谁知道他要去哪儿呢。他那宽大身体上的头颅静静地吞噬着每一束目光和每一只小心翼翼地把一片片蛋糕送入口中的手掌。我确信无疑：他脑子里想的正是我们。

一种我们将在这里遭到灭顶之灾的感觉像一股黏稠的液体一般渐渐渗入我的体内。也许是由于那个列车员领班的身影出现在面前的缘故，绿色的制服令他显得威严而庄重。他经过我们的桌子，用一种冷冷的礼节性的语调向旅客们问安："一切都好吗？"

"一切都很好，"妈妈说。此刻我已经理解了妈妈哭泣的原因。她害怕被问到这个问题，不过显然除此之外不会有其他的问法。妈妈把手摊开在搁板上。那个领班，她对我解释说，问问大家的情况，看看是不是有人有什么特别的要求，或者有没有什么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她觉得有必要这样对我解释一番。

年轻的男爵夫人的目光苏醒过来，从一个角落飘移到另一

个角落。她有些焦虑不安，但并没有让人觉察到她的不安。她暗暗地笑了一笑。那个瘫痪的年轻人一动也不动，显得很平静，似乎已经习惯了他的病痛，从此无论在他身上发生什么他都会无动于衷。一种超越了自身的怜悯升起在他安静的眼神中。

“你们为什么要离开那个美丽的水岸?”年轻人突然把目光转向了我们。

“这不怪我们，”我竭力对着他的目光说出这些话，“别的地方的水，很急的水，从山上流下来，把一切都搞乱了。”

“真遗憾，那是个很迷人的地方。”

“毫无疑问，不过我们又能怎么办呢?”

“要是我就不会离开那样的地方。”

正当疲倦逐渐击退我脑中的幻想力时，火车停止了前行。起初让人觉得似乎是出了什么岔子。这趟快车在小车站是不停的，更别说是乡村小站了。由于事出突然，所有人都在位子上一动不动。

很快人们就弄清了，火车的确停了下来，这地方不过是一家阴暗的旧锯木厂。“火车拐错弯了，”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快车有时候也会走错路的，幸好我们没有脱轨。那个年轻的男爵夫人抬眼扫视了一遍车厢，目光冷峻而疑惑，似乎我们中间藏着什么难解之谜的答案。

“有时候会出事故，”从里头传来一个声音，非常温文尔雅的声音。

“最近事故很多，就是快车也靠不住了。”

还是没有人在座位上动一动。

年轻的男爵夫人率先从座位上站起身来，一只手伸向宽大的车窗，并用力向上打开了车窗。“天黑了，”她喃喃自语道，“什么也看不见。”

“你干吗不去问一问，”一个女人拖着长音对她的丈夫说道，那娇滴滴的声音令人烦躁。

“有什么可问的，出事故了呗。”

“这么说，你是想让我代你去问啰。”

男人起身向门口走去。他的样子让人觉得就像一个外交官员。门艰难地开启了，发出沉重的嘎吱嘎吱的响声。“好吧，告诉你，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到。这地方只不过是个旧锯木厂。你还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信息？”

“为什么停车？”

“因为火车头停下来了。”

“我再也不问你任何事了，”女人把怒气撒向车厢内的空间。

另一些旅客丧失了耐心，走下火车。他们在车厢旁的样子显得有些奇怪：就像一群在稻草上蠕动的小昆虫。要不是一个女人突然爆发出一阵笑声，一阵从因吸烟而焦枯的嗓子里迸发出的放肆的笑声，这样站着简直沉闷得让人恐惧。女人笑着，笑声中带着某种疯狂的喜悦。似乎多年以来她一直期盼着这一

刻。快车从不误点，这次可要误点了。没有什么比误点更有人情味了。她的丈夫和两个女儿会等她，他们会一直等下去。没关系，让他们等吧。丈夫和两个女儿会一直在站台上等下去的念头让她的笑声更加愉快，她不停地笑着，持续不断的笑声变得越来越惹人心烦了。

突然一个清晰的声音打破了死寂的空间："422 次快车请求各位旅客的原谅，由于出现了特殊情况，保安当局要求所有外国公民以及那些并非出生时即为基督教徒的奥地利公民，到刚刚在锯木厂开设的办事处进行登记，请带好护照、身份证或其他足以证明身份的文件。"

车厢里的人都被那个声音惊呆了，但那个大笑的女人却依然如故。从她身体里爆发出的笑声越发高亢，就好像被人多灌了一口甜得过分的饮料。"这是冲着我来的，这是冲着我来的，"她笑道，"我一生下来就是个犹太人。"此刻，那粗重而讨厌的笑声乏味得让人恼火。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女人的缘故事情才会这样，也许她还另有同伙。快车以前从来不停的，那些商贩互相开着玩笑，他们都是些老乘客。

"你为什么不闭嘴？"有人试图让她安静下来。

"怎么啦？"她说。

这会儿人们才弄清，她是喝醉了才笑个不停。女人站起身，扫视了一下车厢，转向车门的方向。这是个健壮而肥胖的女人，沉甸甸的胸口上吊着一枚金质大奖章，眼角处残留着眼影。她

突然转过头来，似乎正准备承认，这一切都是她干的，是她犯下的错。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她用一种充满母性的语调对众人说道，“来吧，孩子们，我们去登记，难道这节可敬的车厢里除了我之外就没有一个犹太人了？奇迹，真是奇迹。”

“谁拦着你了，”那个有着一副外交官模样的高个男人说。

“我需要一个同伴。”

“你干吗跟她说话？”那个男人的妻子冲着他不满地说道。

“带上我，”那个瘫痪的年轻人对陪伴他的老妇人说，这个年长的女人神情落寞，样子像个虔诚的信徒。

“去哪儿？”老妇人惊恐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去登记处。”

“你是怎么啦，我的孩子。这里没有能把轮椅放下去的坡道。你张开眼瞧瞧：这底下是一片旷野。那是针对健康人的。我的孩子，你对这一切都有豁免权。”

“我不想无视官方的通告，”年轻人用犀利的目光盯着她。

“我明白，”老妇人说道，“可你难道不觉得这儿；没有办法把这么重的轮椅弄下车？我是个女人，年纪也不轻了。我没法把这么沉的轮椅扛在肩上。”

“让我来吧，”大笑的女人说道，“要是这小伙子想去登记，干吗要拦着他呢？生活已经阻止了他太多的愿望。”

“对于你的插手，我真是十分感激，”老妇人强忍着怒火说道。

“还有谁愿意搭把手?”大笑的女人对着车厢里的人说。

“我,”年轻的男爵夫人边说边站起身来。

“奇怪,”大笑的女人爆发出一声惊叹,“我不相信你也属于我们这种劣等种族。”

年轻的男爵夫人没有答话。

事已至此,老妇人别无选择,只得同意接受人们的帮助,折叠起面前的搁板,清空了搁物的盒子,用手比划着如何正确地抓住轮椅的把手。她不情愿地做着这一切,嘴里还不住地嘀咕着:“留神他们的好心,他们会把你送进地狱的。”

那个大笑的女人紧紧抓着轮椅。当她站到车外时,她冲着车厢里用一种听上去恶狠狠的语气喊道:“出来吧,孩子们。出来吧!没什么可害臊的!

三个女人身体紧贴着残疾青年的轮椅,拽着轮椅进入了一片干枯的灌木丛,从那里走到锯木厂的门口,门前有一盏昏暗的电灯照明。

相邻的车厢里可以感受到一阵沉重而令人不快的骚动迹象,车厢过道里嘈杂的声音,听上去犹如干涩的笑声。

那个长得像外交官的男人失去了耐心,起身说道:“我不会像夜贼那样躲躲藏藏。如果那些人都不为公开宣布这样带有歧视性的通告而觉得可耻——我在他们面前也没有什么可隐藏的。”

“要是你想走,我不会拦你。别忘了,你这么做对我们所有

人都是不公平的。你正在卷入这黑夜里的疯狂举动。”他妻子故意干巴巴地说道。

“你想要我怎么办,不理他们?”

“我没这么说。”

“那你到底想要我干什么?”

“我想要你提出抗议。要让那些负责的人知道,在快车上不容许有无法无天的行为。”

“我懂了。你是想要我挑起事端。”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我没心思吵架。”

靠边的座位上站起了一对老年夫妇。男的戴着眼镜,看上去似乎是个瞎子,女的矮小瘦弱,怜爱地向他伸出自己的双手,这情景见证着他们的内心炽热相连。妈妈赶紧过去帮他们,于是我们也加入了下车的人群。

锯木厂的小木屋里出现了一阵混乱。显然登记令的规定含糊不清。几个实际工作人员对于这种拖沓倒是挺高兴。一个检查员在向人们解释,这么做没有任何恶意,只是为了统计而进行登记。登记者排成了两条平行的队伍。瘫痪的年轻人被推到了登记桌前,大笑的女人像母亲般爱抚地摩挲着他的头,这让那个照料他的老妇人心中升腾起一团怒火。

轮到我们了,妈妈摊开一堆文件,一脸真诚的表情。她记得每一个细节,一边看着我,一边说出我确切的年龄。她讨厌夸大任何事实。

登记手续结束了。三个女人推着轮椅朝车厢走去。年轻人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两只手帮着转动不听话的轮子。那对老夫妇不用我们帮忙就爬上了车。一节节灯火通明的车厢被困在旷野中，里面传来阵阵欢快的叫声，似乎一场恶作剧刚刚结束。

“谁的脑子出问题了，”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我要投诉。”

“是啊，”一个女人用并不当真的口气说道。

车门终于被锁上了。人们回到座位上。领班服务员又站到了门口，表明这个夜晚又恢复了常态。只有那个大笑的女人，那个眼角处残留着眼影的女人，不停地与那个残疾的年轻人交换着目光，此刻那青年挺直了背坐在椅子上，两手交叉放在胸前。

“没去登记的人可以在下一站登记，”大笑的女人向车厢里的乘客挑衅般地说道，“还有一些人没有去登记。这有什么可害臊的，还有比犹太人更坏的人呢，犹太人是商人，那又怎么样。我们当中还有不少医生，不少记者嘛。至于说到我自己，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可耻。”

“我们这些旅客不是来听你的自白的，”那个外交官模样的男人的老婆说道。

“我只不过是实话实说，”大笑的女人冲那年轻人眨了眨眼。

年轻的男爵夫人此刻缩在椅子的一角，目光又一次盯住遥远的空间。一想到她是属于我们之中的一员，我的心里就涌动着一股甜蜜的苦涩感。大笑的女人一刻也不让车厢安宁下来，

她一直从一只细长的小瓶子里呷着饮料，不停地与那身有残疾的年轻人交换着目光。那年轻人正坐在椅子上，冷静而精确地把蛋糕切成方形小块。

此刻，火车疾速驰入黑夜，车上所有的灯都打开了。前面几节车厢传来欢声笑语，仿佛这不是一列普通的夜间快车，而是一趟以寻欢作乐为目的的快速列车。几对情侣站在黑暗的门廊中，用不太文雅的姿势拥抱着。大笑的女人挤眉弄眼，欢快地怂恿着他们。那个残疾的年轻人也忍不住笑了起来。

外交官模样的男人那咄咄逼人的妻子起身说道："我不明白今天晚上这里出了什么事儿。难道这儿还是头等车厢？要不就是我弄错了。"

"是不是我们这些人让你觉得不待见？"大笑的女人故作天真地问道。

"是的，客气地说是这样。"

"有什么办法，我们就是这个样子。"

"坐头等车厢的人得懂点儿礼貌才行。"

"我们做错了什么？"

"像犹太人那样吵吵嚷嚷的可不成。"

大笑的女人一下站起身来，她的动作里似乎积聚了无数的能量。她说："瞧瞧是谁在说犹太人吵吵嚷嚷的。至于说到我自己嘛，哎哟你知道，嫁给了一个基督徒，我有两个女儿，现在正在车站上盼着我回来，就算是这样，我一点儿也不想隐瞒我的出

身，就算跟我丈夫我也是这么说的。不光如此——我还为此感到骄傲。”

“我们到这儿不是来听你的告白的。头等车厢也不是用来做告白的地方。我要叫列车领班来恢复秩序了。”

领班出现在门口，一见到叽叽喳喳吵个不休的女人就举起右手说道：“女士们，请遵守秩序。”

“请你要求她遵守秩序，”大笑的女人说。“哎哟您知道，领班先生，这个高雅的女人不管怎么说都是个犹太人。她不听从官方的明确通告，没去办事处登记。她觉得害臊。有什么可害臊的。难道我们不是和所有人完全一样吗？”

听到这些直言不讳的话语，车厢里陷入了寂静。

那个女人起身说道：“这不关你的事。关于行政当局的责任，我会提交完整的报告。我才不会把自己与你视做同类。”

“没什么可隐瞒的，我的夫人，人到头来终归还是人。”

“我和你可不是同类。”

“我不管怎样都不会隐瞒任何事。”

“安静，”领班发出雷鸣般的声音，这声音严厉而果断，就像金属坠地一般，车厢里顿时鸦雀无声。

此后再也没有传来任何的嘈杂声。车厢被裹挟进颠簸的节奏之中。人们坐在各自的位子上，一言不发，那个大笑的女人把沉重的脑袋垂落在椅子靠手上，仿佛受了责骂的样子。烟雾懒洋洋地笼罩在人们的头顶上方。妈妈抓着我的手说：“路还长

着呢，你干吗不睡一会儿？”

我一直醒着，是那种警醒。自从我们离开休养地以来就一直埋藏在我心底的忧伤，此刻又触动着我的神经。妈妈温柔的双手徒劳地守护着我。我知道，过去的一切都不会再来。即使是我们刚刚待过的地方，也只不过转瞬即逝。

坐在我们对面包厢里的年轻男爵夫人摘下了脖子上的围巾，此刻，她那天蓝中带着黑色的美丽双眼流下了孤寂的泪水。

妈妈直挺挺地坐着，脸上的表情冷冷的。夜风吹过她的面颊，令她的表情变得僵硬。领班再也没有离开过门口，好像他已经不再是领班，而是被派来维持秩序的守卫。女服务员们也不再送食品过来了。

“出了什么事儿？”我听到一个女人喃喃的声音。

“什么事儿也没有。官僚机构发神经。”

“真把我吓死了。”

“没事儿。不用害怕。”

灯一盏接一盏地熄灭了。夜晚的寒气渗入车厢，裹挟着人们沉睡而去。当整个车厢的人都沉沉睡去之后，那个大笑的女人站起身，摇了摇头，从她的行李袋里拿出一包糖果，递给瘫痪的年轻人，说道：“给你的。”

“谢谢，”年轻人说。他用两只手撑住身体，似乎是想站起来的样子。

“你坐火车要去哪儿，我的孩子？”

“重新去做一次手术。”

“我可怜的孩子，这么说你已经做了……”

“目前为止，两次。”

“那这是第三次手术了。”

“第三次。”

“多么勇敢，这是多大的勇气啊。遇见你真是太好了。这一车厢的人都快把我气疯了。我受不了这些胆小鬼。现在他们都睡着了，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而你，我的孩子，就要去做第三次手术。希望大吗，他们怎么对你说的？”

“他们没有做任何保证。”

“就算这样你还是这么坚忍、这么勇敢地接受了手术。”

“没别的选择。”

火车的速度慢了下来，那个大笑的女人，不知为什么，此时她的样子显得很肥胖，用双手抱着自己的头说道：“我能给这个可爱的年轻人什么东西呢？你看我什么东西也没有。把这枚大奖章拿去吧，是属于我的。”她问也不问就把奖章挂到了年轻人的脖子上。年轻人显得很窘迫，不断地试图用自己的两只手撑住身体，他的喉咙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失真的声音，要不是他依然沉浸在羞涩之中，也许他会爆发出一阵大笑。终于他提高了声音说道：“我不能接受如此贵重的礼物，我一辈子都会过意不去的。”

“你说什么呀，我的孩子，这只不过是我喜欢你的一点点表

示。要是我有更多的东西,我还会送给你的。你是个小英雄。"不等他回答,女人就急匆匆地回到座位旁,拎起与其身材完全不相称的一只又窄又小的箱子,快步跑到门口说道:"我在这儿下车。"年轻人还想说些婉拒的话,可是却发不出声来。

列车似乎往南奔驰在一道往下的斜坡上。年轻人此刻挺直身子坐在座位上,犹如冻僵了一般,金质的大奖章垂挂在胸前。他似乎还在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想要有这样一副装束。

照料他的女人在刚才的谈话过程中始终没有插话,现在终于开口说道:"你可是发了笔横财,这要值好几千呢。"

"我没向她要。"

"我希望你知道这么慷慨的礼物有多贵重。"

"我不是不懂得感恩,"年轻人气恼地说。

"承认吧。你并不想去。"

"我不害怕。动过两次手术的人已经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了。"

"承认吧,你就是不肯去。现在瞧瞧你得到了什么。"

"你想要我怎么样?"

"没什么。我只是在提醒你。"

年轻人低垂着头,奖章的闪光一下子让他的面颊显得躁动不安起来,那面颊年轻而柔软。

嘈杂声又归于宁静。如果不是车厢门口领班服务员的目光,一切都与夏夜里普通的夜班火车完全一样。疲惫不堪的人

们，尽情享受了日光与水的沐浴后，唯一的愿望就是没有人打扰，美美地睡上一觉。

突然，在没有任何明显征兆的情况下，女人悄悄地把头转向她那个长着一副外交官面孔的丈夫，说道："你犯了个错误。"

"什么错误？"

"你知道得很清楚。"

"我不明白。"

"走着瞧。"

"我没有挪用过公司的财物。税我也都按时交了。我有什么罪？"

"你这是避重就轻。"

"你是说我的出身可疑？我既不为此自豪，也没觉得这有什么可耻的。"

"可是没有哪个体面人会承认自己和那个胖女人是同类。"

"我问心无愧。"

"我倒要瞧瞧，要你坦白就这么难。"

"我坦白，我坦白，"他带着嘲弄的口吻说。

领班把犀利的目光转向他们，两人立刻安静下来。

晨曦微露。微弱的晨光穿透我的睡梦将我唤醒，让我想起了从前曾经度过的那几个长长的假期。今年有些事发生了。也许是因为爸爸没有和我们在一起。也许是因为那个被人遗忘的地方所带给我们的那种奇怪的甜蜜感觉，让我和妈妈如此的接

近,还有那种无论如何都无法让这样的日子延续下去的心灰意冷的感觉。

晨光渐亮,唤醒了所有的人。人们叠起毛毯,互相交换着目光,仿佛一场噩梦过后,终于可以重舒一口气了。妈妈也醒了,从行李架上取下箱子,心不在焉地,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道:“假期结束了。”

“爸爸会来车站吗?”我问。

“我不能肯定,”妈妈说。

我们还来得及再交换几个眼神。年轻男爵夫人的双眸一直没有从那个残疾的年轻人身上移开。呀,她的面颊上生出了一道细细的皱纹;此时的她依然美丽却不显柔弱。那个长着一张外交官面孔的丈夫和他的妻子也站在那里注视着那年轻人。一时间,我们之间被一种亲近的感觉所占据,仿佛我们早已相识。

妈妈拿出一个糖果盒对我说:“给那个年轻人。”

年轻人用锐利的目光注视着我,说道:“我不需要这个。”

“拿上吧,”妈妈在她的座位上说。

“我的礼物已经足够了。”

“不过这孩子可是真心实意要送给你的。”妈妈走过来帮我。

“我不喜欢被人怜悯。”

“你会伤了这孩子的好心。”妈妈恳求道。

“我不是为了唤起人们的好心而存在的。”

我站在那儿，满脸窘迫。

火车放慢了速度。我们就快到站了。我们站在车厢门口，人们试图抚慰我刚才所受到的小小的羞辱。年轻的男爵夫人也用充满同情的目光望了我一眼。这一站除了我们没有别人下车。食品小卖部的两扇百叶窗此时依然关着，熹微的晨光无法掩盖车站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

“别责怪那个年轻人。他病得很重，”妈妈说，“这会儿他正要去做第三次手术。”

我们向哈布斯堡大街走去，一路上没有遇到一个人。城市依然在沉睡之中。

妈妈提起了那个大笑的女人。

而我感到列车那摇晃的节奏至今无法让我的双脚松弛下来，还有车上的那些人也是。我们似乎依然置身于车厢中。在弥漫的夜色中，被各种各样的目光所笼罩，而其中最犀利的是那个年轻人的目光，仿佛插入了我的额头。

2

和妈妈共同度过的这个夏天再也没有离开过我的脑海。有时候我觉得,我们还在那里,或是在环绕的水中,或是踩着平滑的小路走入夜色。

我们回到家后,妈妈就脱下了白色的夏装,脸上那种神神秘秘的表情也消失了。妈妈开始忙里忙外,很少说话,她的动作敏捷,效率极高。再过几天家里就要为我庆祝生日,这一近在眼前的事件让她看上去更像一个精力充沛的实干家了。

爸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这个夏天在维也纳和布拉格之间的来回奔波以及事业上的成功使他精疲力竭,神思恍惚。

妈妈制作了各种甜点,一刻不停地端到他的面前,努力想让他回过神来。在我的印象中,爸爸的脸庞一直显得瘦削,但现在两腮却开始鼓了出来。当妈妈对他讲述那列奇怪的夜班火车,讲到火车停下来进行登记时,爸爸先是对官僚机构发了几句牢

骚，然后又突然说道，自从东方犹太人来了以后，一切都变糟了，那一定是因为他们把那里的恶灵也带来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一想到我永远也不能回到那间乡村小屋，就好像有一股陈腐而忧伤的气息弥漫在我的胸中。我对妈妈感到疑惑不解，她的举止很奇怪，甚至夜里当她上楼来到我的房间时，也不再对我说爱抚的话语了。她的沉默，在我看来就如同将我遗弃了一般，更加深了我的忧伤。

那个地方已经消逝了，那里所有的一切，甚至包括那些水底的鱼。我觉得我的秘密渐渐被各种色彩斑斓、散发出迷人香水气息的毒药所侵害，夜里我因为透不过气来而惊醒。

与此同时，家里正在进行着各种准备，狂热的准备，家里的房子似乎被撑成了一个敞开的礼堂。那些各式各样的家用小器具已经在我心里引起了一种隐隐约约的不快，这些器具都被擦得光可鉴人，一丁点儿暗影也没有，这一切与我毫不相干。我知道，会有很多客人，大多数我都不认识，他们会把这里的空间填满。大家都在说这将是一次盛大的庆典，而我却心存疑虑。也许是因为露易斯，也许是因为那不断游荡的恶灵。

有许多的恶灵。许多恶灵，因为它们无形无影，只出现在我的幻梦中。可是它们又真真切切地出现在现实中；最近它们就以那些肌肉健壮的女佣的形象出现在我家里，她们来布置房间并帮忙做准备工作。

谁都一样，没有人愿意搞这种兴师动众的庆典，更别提我

了，尽管这是为我准备的生日庆典。不过事情一旦开了个头，就会以自身的力量不断地往前，来势汹汹。那种极端的统治欲望，侵蚀着我们每一个人。妈妈——因为想要给家里吹进一阵新空气，一年来这个家沉浸在某种令人苦恼的煎熬之中。爸爸——是因为他的写作走进了一条死胡同；而我——则是因为期待着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肌肉健壮的女佣是从乡下带来的，这个家变成了一个不设防的空间，充斥着笑声和乡间气息。

晚上她们也睡在我们家里，后面的房间里充斥着放肆的笑声，一直渗入我的梦乡。沉静的愉悦和一丝丝疑惑在恍若透明的梦境中环绕着我。爸爸停止了写作，穿上工装裤，仿佛骤然脱离了他原来的世界，优哉游哉。女佣们一喊他“主人”，他立刻摆出一副监工的模样，似乎已习惯了向人施以恩惠。

到了月底，墙上已换上五颜六色、闪闪发亮的壁纸，旧橱柜被推到一边；全新的家具有些异样，在我的心底投下了一片阴影，似乎让我预先体会到了成为孤儿的滋味。爸爸慷慨地付了女佣们工钱，妈妈又送了些旧衣服，而我则被她们亲了又亲，她们那种乡下人的贪婪让我难以消受。

于是一切又恢复了平静。爸爸拟定了一份邀请的客人名单。并不是所有的客人都合妈妈的意。争论与其说激烈，不如说是痛苦。夜晚似乎变得空落落的，只剩下那些恶灵，那些跟随女佣们到来的恶灵。似乎一切都为一种不可捉摸的自由做好了准备，隐隐约约的恐惧感占据了我的内心。

就这样准备工作终于接近了尾声。

已经是午后了,不再强烈的阳光在屋内摇曳,不知怎么的,在我眼前浮现出一只手,有着柔嫩而透明的手指。那只手仿佛来自屋外,手指张开,好像在说:“从我里面拔出一根血管,你就能把我治愈。”我站在那里凝视着摇曳的幻影,那只手上出现了一个微小的血团,被皮肤上的绒毛所包裹着,轻轻地粘在食指的关节处。这只手就那样张开着,我甚至能看清流动在伤口周围的那些微小颗粒的运动。我又一次听见:“从我里面拔出一根血管,你就能把我治愈。”此刻那声音很清晰。那只手向后退去,黑暗降临到地板上。在隔壁挂着窗帘的阴暗房间里,我的生日蛋糕已经准备就绪,还有小提琴,翻开的乐谱和我的另一种焦虑。与此同时,在很多房间里,都能听到人们的期待,包括女管家露易斯那间布置得令人称奇的房间。

我知道,她正高高地站着,赤身裸体,给眼部上妆。在自己的房间里她的举止更为自由随意;她在墙上贴满了从杂志上剪下来的图片,不是光彩照人的女孩就是著名的演员。在长假中,有时我单独和她在一起,她会帮我洗澡,还把我藏在那张有点土气的木床上的大枕头下。

小提琴教师还没到,可我的左手手指已经真切地感觉到他的紧张。我的失败将会被认为是他的失败;不过暂时这一份宁静是属于我的,这份让我喜欢的宁静与家里那种甜蜜的气息包围着我,仿佛有一种魔力让我重新唤回了那些小小的快乐;又是

那些假日，与露易斯在一起度过的假日；那些在她床上和她一起入睡的夜晚，那些令人心醉神迷的擦脸粉和香水的气味。

那些美妙的日子结束了。我的生日已经具有了社交含义。露易斯的房间也不再是神奇的庇护所了。

爸爸在他的房间里。时不时从自我封闭中走出来，丢下几句让人心惊胆战的话。我的耳朵里已经在回响着他那有如炸雷般的咆哮声：“我的目录册在哪儿呢？我的东西全都不见了。”这一年来他的头发变成了灰白色。那是个什么样的敌手，一个我无论如何都未曾谋面的敌手，正在与他争斗着。只有跟姑娘们在一起时他才会说些逗趣的话。

“都准备好了吗？”妈妈问道。

“准备好了，”露易斯说。

“我要歇上一会儿，”妈妈说着把头靠到靠垫上。

我回到自己的房间，看看那只手有没有再来恳求我治愈它隐匿的伤痛：那团阴影消失了，地毯踩上去厚而柔软。我敲了敲露易斯的门问道：“可以进来吗？”她站在镜子边上，跟我想像中的一模一样，穿着透明的睡袍。脸上沐浴后留下的水迹还没有干。她长长的脖子向上弓起，宛如一只出水的天鹅。

“夏洛特今天晚上要来，”她说。

“我听说了。”

她笑了，笑声传入我的耳中，让我感到夏洛特这个名字里似乎潜藏着什么秘密和猜疑。

“我不认识她，”我急忙说道。

“我也不认识，”她轻声说。

我有好些天没进她的房间了。土里土气的床、枕头、橱柜和花瓶，一切都还是原样，按照我所喜欢的样子摆放着，显示着女性的条理。

多么令人伤感，我从未体验过的伤感，突然紧紧地包围着我，我知道：露易斯的一切，这些床、橱柜和枕头，从今以后无论怎样都再也不会让我体会到它们以前的意味了。

“好久没来你的房间了。”

“你永远是受欢迎的客人。”

可是我知道，以儿童特有的从不出错的确信知道，藏在我身体里的那些秘密细胞中的一个此刻已经爆裂了。

“一会儿见，”我说着关上了门。

我感到很累。拉琴让我筋疲力尽。伴随着疲倦的是我的老师丹齐格的忧心，爸爸称之为典型的犹太式的忧虑。他那股犹豫不决的劲儿简直是到家了，似乎只能被解释为自我惩罚的意愿，他确实有点邪乎。我喜欢看他做示范时那副责难自己犯错的样子。即使是他那少见的微笑，也只不过是为掩饰隐隐发作的痛楚而做出的怪相。

阳光的色泽渐渐褪去，黑暗涌入屋内。扶手椅上罩上了一层灰色的绒毛。我感到某种阴谋此刻正在一片沉寂中成形。果然妈妈起身说道：“到时间了。”她的声音在我听来就像是一种

恐吓。她站起身，动作中带着一种陌生的、舞台化的痕迹，她走近墙边，打开了枝形吊灯。

第一个到场的是我的萨洛舅舅和他的新情人。转眼间沉寂就被打破了，一种陌生的亮光占据了这个空间，直刺得人目眩神迷。电动火车用两个纸板盒包装着，是他从维也纳给我带来的。这个机械奇迹，立刻被拆开来展示在所有人眼前，火车令人惊异地在狭窄的轨道上跑了起来，时不时还发出一阵汽笛声。这就是我舅舅的出场，好出风头，无拘无束，却常常让人们大吃一惊。这种率性却并没有被人认为是缺陷，相反，我们常常说：萨洛不是按照社会传统生活的。当然，也并非事事都让人看得惯。他也有不少招人不待见的事儿。他的妻子被认为是个不太聪明的女人，或许这也是人们原谅他胡闹的原因。

我们喝了茶。从露易斯的房间里飘来了香水的气味，这是梳妆打扮已接近尾声阶段的信号。果然门开了。露易斯一身碎花的百褶裙，红润的脸颊光彩照人。我的萨洛舅舅，对每个女人都不吝溢美之词，他站起身来，大声宣布道："快看看这里发现了什么。"他的新情人显得很不自在，她一直紧咬着嘴唇，竭力做出轻快的样子。这个家庭中的切口对她来说是陌生的。当然，人们谈到了夏洛特，谈到她的魅力，她的成功以及近来她所经历的艰辛日子。你一言我一语，欲言又止，低声细语让我无法理解话中的含义。我所知道的是：在这件事情上有着一些阴暗的东西。

我的卡尔舅舅和他的妻子在预定的时间到场了，所有人立刻都像冻僵了似的在原地一动不动。作为一名律师，他有着苛刻的处事方式，对于我们这些家庭成员表现出的任何逾规行为都极其敏感。他的妻子却不一样，她比他更年轻，行事也更为自由。他们的婚姻也并非一帆风顺；这是一场持续了多年的争斗，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却始终是斗而不破。他对自己那寻欢作乐的兄弟的态度就在怒气冲冲和息事宁人之间交替；不过由于兄弟之间的联系很紧密，他们也有过激烈的争吵。这次卡尔就有意避开萨洛在角落里坐下。刚才的欢快气氛此刻并没有受到干扰。客人们聚集在门口；爸爸的脸上摆出一副待人接物十分老练的表情。

看上去可怜巴巴的是我的老师丹奇格，他被客人们晾在一边。即使当他喝着咖啡，嘴里咬着馅饼的时候，他的肩膀还在不住地颤抖。没有人向他问好，他坐在桌角边的样子刺痛了我。

轮到我的演出了，我装出一副信心十足的样子。丹奇格站在我身旁，神情畏缩。“宽弓，宽……”他无助地对着我低语。

第一部分顺利地捱过去了。到了第二部分我的手指可耻地背叛了我。我装作若无其事。丹奇格的脸色不断改变，最后他蒙住了自己的脸。没有人觉得我犯了什么大不了的错。我暴露在所有人眼皮底下的弱点在人们的内心唤起了一种共同的宽容；只有我的老师丹奇格不是这样，他把我在演奏中出现的每一个错误都视为他自己的错。欢快的气氛达到了顶点，没有人注

意到他的消失。我是这场晚会上的话题。我的天分与我的父亲有一点儿关系。我在演奏时就已经知道自己出了几个严重的错误，比我的老师发现的错误少，不过我装作一切都很正常。我的萨洛舅舅的新情人热切地抓住我的手，她对音乐的理解并不深，显然是被我的架势所迷惑了。

大家都在盼着夏洛特，不停地说道："不知道她还来不来。"飘然而至的露易斯端出妈妈亲手切好的桑椹蛋糕。已经九点了，萨洛舅舅开始夸张地喝起了酒，以此表现他不羁的风格。由于一场疾雨而姗姗来迟的舞会乐队终于登上了舞台。萨洛舅舅宛如少年一般轻轻挽着他的情人。卡尔舅舅用严肃的目光将大厅扫视了一遍，挽起妻子的手说道：来吧，我们离开这儿。她用一种欲哭无泪的眼神望着我们，就像一个正在尽情享乐的人突然被拽入了冰冷的暗夜之中。但她无处可逃。

乐队使人们陷入了另一种沉醉的感觉。爸爸坐在椅子上的样子有些奇怪，他喋喋不休地与朗德曼律师谈论着这座故乡小城中被租借的土地。爸爸的目光中带有肃然的沉思，仿佛他们谈论的并不是被忘却的遗产，而是他隐秘的内心生活。律师找了个好时间来向他灌输这一堆事实和数字。

一切突然都安静了下来。萨洛舅舅放纵舞动的手就像是被人从空中一把勒住，他的情人脸上那愚蠢的表情也消失了，眼神中显出几分诧异和哀伤。爸爸问道，"那些土地会怎么样？"好像他明白事情已基本无望。朗德曼律师没有答话。

“是不是蛋糕不好吃?”妈妈绝望地问道。

这时乐队奏起了伤感的歌曲。爸爸受不了这种温柔悦耳的声音,他一句话也不说,或许是因为妈妈疑惑不解的样子。她集中注意力,努力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却依然不得其解。出了什么事,她脸上的表情依然在问。就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只不过难以觉察地微微停顿了一下而已,人们便又沉浸在流淌着音乐的空间里。露易斯用托盘端上新煮好的咖啡,她那气色健康的脸庞上洋溢着勃勃生机。

萨洛舅舅将他白皙的手伸向一瓶法国白兰地,又给自己倒上一小杯。赫尔茨·布劳尔大夫坐在宽大的扶手椅里,上半身僵直地挺立着。自从妻子去世后,一层阴云将他和大家隔绝了开来,当他一坐进扶手椅,阴云愈加浓厚,覆盖了他整个脸庞。当他站起身,阴云也如影随形般地跟随着他。事情总是要比你所看到的复杂得多——他常常说。这句话从他开始从事繁荣的私人医生行业的黄金岁月里就跟随着他。妈妈递给他一块受人欢迎的乳酪蛋糕,可是布劳尔大夫却纹丝不动。“布劳尔大夫,您尝一口吧,”妈妈恳求道。布劳尔大夫这才挪了挪身子,说,“我马上就吃,”说着把叉子插入了蛋糕。

大家在说,夏洛特不会再来了,都这个时候了她不会从家里出来了。萨洛舅舅斟满了一杯又一杯,寻思着找些乐子。他和露易斯一起端着盘子,在客厅和餐厅间进进出出。他的新情人把他的一举一动都看在眼里,不满地说道,“你喝得太多了,你

干吗不坐下来?”可是和露易斯一起端盘子令他十分惬意,他依然紧紧地攥着那些盘子不肯放手。

然而这种轻松却无法缓解忧伤。爸爸起身站在朗德曼律师身边,冲着他以一种教训的口吻述说起那块租借出去的地皮,那是他父母的遗产,他用一种我不熟悉的哀婉语气说着。没有人听到他的话,而我则以为他只是在生气说着自己的什么事。萨洛舅舅的情形倒是稍有好转。他已经完全醉了,正在讲述着我们这个家族的庞大,一个一个地数出音乐家、画家和作家的名字,还有那些背教者和国际投机家。这一个个名字和他滔滔不绝的话语稍许消磨了已经扎下根来的忧伤,但却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慰藉。

有人说道,反犹太主义又在抬头,萨洛舅舅却抱住露易斯说,“你说,你不喜欢犹太人吗? 世界上还有比他们更好的人吗? 犹太人不是最好的情人吗? 你说啊,露易斯,你说!”

“是的。他们是的。”露易斯说,脸因羞涩而涨得通红。

“你们瞧,我说对了吧?”萨洛舅舅说。

“可是,夏洛特怎样了? 你一点儿也没听说她被国家剧院解雇了? 这种传言一丁点儿也没传到你的耳朵里?”一位实业家喊道。

“为了什么? 为了什么?”

“就因为她是个犹太人。”

“我不明白。我不懂。”萨洛舅舅说着抓起一个盘子。

一切都像是一瞬间的错觉，门开了，伟大的夏洛特，受人崇拜的夏洛特站在门口。她的到来是如此出人意料，以至于所有人，包括乐队在内，都在原地默不作声。只有萨洛舅舅高声叫道："夏洛特！"

这时我看到她的脸上释放出一道奇怪的光芒。她轻而易举地就主宰了所有人。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她的经历与我们这个小小的家庭有什么密切的关联，也不知道她的生活与我们会产生怎样的纠葛。

夏洛特仿佛一下子把这个庆典从索然无味的谷底拽了出来。咖啡被置诸脑后。客人们喝着法国白兰地，津津乐道地谈论起我在家里闻所未闻的话题。已经很晚了，可是没有一个人说天晚了。还有露易斯，我注意到，微笑浮现在她绷紧的唇边。

"夏洛特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萨洛舅舅说，他的话也许只是由于想听到自己发出的声音。到来时就已有些醉意的夏洛特傲慢而优雅地说道："我来庆祝我新的自由，把椅子拉近点儿，举起酒杯，向夏洛特新的自由致敬。"我感觉到我的生命，被禁锢在这片狭小围栏中的生命，将要冲破限制，走向某个我所无法理解的黑暗处所。夏洛特发出了一声咒骂，这是我在家里从没听到过的骂人话。让我诧异的是，竟没有一个人觉得脸红。她闪动的目光中隐藏不住的是一股怒火。人们继续喝着酒，萨洛舅舅的新情人克服了她的困窘，无所顾忌地大笑着。夏洛特不

依不饶，面无愧色地诅咒着那些伯爵、导演和女演员。朗德曼律师这时站起身，以听上去足够平静的语调说道："我无法理解。"

"难道您压根没把自己看成犹太兄弟会中享有平等权利的一员？"夏洛特咄咄逼人地说。

"对。"

"如果是这样，您在这个中央委员会里干什么呢？您难道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当选的吗？"

"是的。"

"这样的话，"她转向萨洛，"朗德曼律师对选举的合法性提出疑义。宪章上是怎么说来着？"

"女秘书，把宪章拿来瞧瞧，"他冲着他的新情人说道。

"不必了，"朗德曼气恼地说，"我跟这种疯狂行为毫无关系。"

"你是个犹太人。你再怎么说也没有用。你的父母为你行过割礼，给你打上了高贵的印记，难道你要放弃这块漂亮的胎记？"

"太无礼了。"

"什么无礼。这难道不是生活中一个普通的事实？"

"我拒绝谈论这个话题。"

"这有什么不对？"

"我是人。"

"当然了。不过您必须承认身上有一块辉煌的印记，不

是吗?”

“太无礼了。”

“那么,萨洛。把他从犹太兄弟会的名单里划掉。宣布你为失踪者。永久性的失踪者。”

商人布朗趁乱把露易斯拖进了她的房间。显然这并没有逃过众人的眼睛,不过这个时候没有人打算去关心这小小的奸情。况且众所周知的是,那个商人是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好时机的。

骚动在加剧。朗德曼一边走向门口一边咆哮着:“我不会参与这种头脑疯狂的行为!”

“把他从兄弟会名单中划掉,萨洛,”夏洛特在他身后喊道。

“宪章里规定要进行表决。”

“没有必要,这是十足的藐视法庭案。”夏洛特的脸红红的,她已经是口无遮拦了。微微的疼痛感越来越紧地裹挟着我,她的声音越响,我就越觉得这是我自己的声音。那些我不解其意的词汇仿佛一束束燃烧的火把在我眼前跳跃。我正要鼓足勇气闯入露易斯的房间,夏洛特抄起一只酒瓶冲着大门的方向甩了过去。

最后人们终于把这几只凶猛的猎鹰分隔开来。朗德曼被轰到了走廊上,夏洛特被推入了书房,而商人布朗则从后门悄悄溜走了。

大约一小时后,露易斯从房间里走出来,撤去桌上的餐具,她脸色红润,微笑挂在唇边。

夏洛特不肯睡在我们家,爸爸只好摇摇晃晃地把她送上了出租车。“我亲爱的,”她冲着我说,仿佛我也在她疯狂的大脑中占据了一个位置。天下着雨,潮湿的公路上一辆辆汽车如同黄蜂般嗡嗡地驶过。房间里如同液体凝固一般渐渐安静下来。我蓦地感觉到夏洛特那张纤小的醉态的脸庞,她那迷惘的眼神在我的额头停留了片刻。我还感觉到了父亲的手,仿佛他的手触及的不是她而是我的身体。萨洛舅舅的新情人在台阶上被他一把拉住,她嘶叫着,就像一匹被套上了绳索的母马。萨洛舅舅说道:“把手给我,要不就把脚给我。”他的情人突然放肆地大笑起来。

夜幕如同坠落悬崖一般渐渐坠入我的心底,平淡无奇的话语连同乐队奏出的最后几个音符在我的心间流淌。我知道:黑暗的种子,已经长出浅红色根须的种子,今晚植入了我的体内。

房间里凌乱而压抑。妈妈坐在扶手椅中,双目紧闭。

从枝形吊灯上溢出的锐利的光芒恬不知耻地窥探着每一个角落。

第二天房间被打扫干净了,但恶灵并未离去。尽管谁也没有说,但我觉得一切都在按照夏洛特那令人不安的话语节奏推进。露易斯穿着罗纹布衬衣,两个硕大的乳房傲然挺立。

3

这年夏末我们是在巴登附近的一所乡间住宅一起度过的。这是一个古老的乡村，有着许多水井、草地和一座礼堂很小的教堂。阳光一直流连到夜里很晚的时候才踩着轻巧而莹润的步子悻悻离去。夜晚由于乡村湿润的气息，乡间的绿意更为厚重。这里没有人会说，时间很晚了；黑夜在不知不觉间降临，就像涨潮时的海水不知不觉间冲上了海滩，当我阖上眼帘，黑夜也随之消失。

于是我第一次见到了我的小姨，特蕾莎。那时她十七岁，高高的个头，跟妈妈长得很像。那时她的额头上已经盘桓着一道纯洁无瑕的光芒。她正在准备毕业考试，这种考试在我看来是人们在十七岁时发作的某种迟来的童年病症。直到天黑她才从自己的房间里出来。她穿着一件短上衣，就像一个度日如年的囚犯。她回来后就和妈妈、爸爸一起坐在简陋的客厅里，不过这

些时间并不属于我，而是属于我上床睡觉的时间。蒙胧中她的面颊出现在我眼前，又突然靠近我，让我有种飘飘欲仙的感觉。

也会有一些可怕的阴影，比如，在黑夜中现身的米策尔大夫，拧着我的脸颊说道："瞧瞧这小犹太佬。"

"凭什么说他是犹太人？"妈妈喊道。

"看这孩子苍白的面容。男孩子就是得趁着他们还年轻就磨炼塑造他们。"

爸爸从里屋出来大声叫道，"米策尔大夫，你躲到哪儿去了？"

"犹太人处处包围着我。让我无路可逃，"米策尔大夫打趣地说道。

我知道这只不过是轻松的夜间谈笑。尽管如此，这还是给我留下了一种不愉快的感觉，一直潜入我的梦乡。明朗的清晨将一切都涤荡得干干净净，特别是那些清晨，沿着河岸漫步，走到那个磨面粉的磨坊，那里，在磨坊的地窖里，有装在五颜六色的瓶子里出售的苹果酒。

可是真正给我们的这个夏末下咒的是爸爸的继母。那时候她已经九十三岁了，眼睛瞎了，三十年来她一直被遗忘在疗养院里。我们从没有人提到她的名字，我怀疑我们是不是还愿意见到她。可是事与愿违，来了一封由疗养院照料她的女护士代她手写的信件，信中说她向我们每个人致意，信中的口吻显然已经让我们感到不太习惯了。"我常常想起你们，常常梦见你们。"

爸爸急忙把信拿给妈妈看。他们互相对视了一下,爸爸说:"很奇怪,不是吗?"于是爸爸当即决定把她带来巴登和我们同住。

此后的事情就按惯例进行。爸爸出发了,萨洛舅舅陪伴着他,我们站在窗前快乐地挥着手,尽管如此,仍有一种隐隐约约的不安潜入我的内心。

像往常一样,准备工作总要出些小岔子,妈妈和我出发晚了,最后我们还是按时赶到了车站。让我感到遗憾的是露易斯不跟我们一起去。那时候露易斯对我有一种甜蜜而隐秘的魅力,这一遗憾给男孩那小小的快乐蒙上了一层阴影。

我们抵达巴登的时候是夜里。站台上的灯光已经点亮。在售货亭边,一些男男女女摩拳擦掌地挤来挤去。货栈已经关门了,货栈边站着几匹马,马腿被拴着。

爸爸和萨洛舅舅在出口处等候我们,两人中间是一副担架床,担架上躺着的是爸爸的继母艾米莉亚。我们对她说了几句话。"她话很少,"萨洛舅舅说道,好像说的并不是一个自己亲近的人,而是一个曾经难以驯服而此时已威风不再的生灵。显然我们需要有一辆双轮马车,就是套上四匹马的那种。一开始她没有认出我们,也就是说没有从我们的声音里认出我们,她拒绝我们的陪伴,不过我们还是说服了她,向她保证会好好陪伴她。爸爸的脸色有些不同寻常。似乎他并不是这次冒险旅程的同伴,而只是在执行某个不为人所知的强制命令。他神情无助,心烦意乱,语无伦次,我以前从没见过他这样。

艾米莉亚奶奶前几次婚姻中生过几个女儿，一开始她们还惦记着她，后来随着时间的流逝，她们嫁给了非犹太人，就不再来看她了。最近几年没有一个人来探望过她。这些事儿是那个照料她的护士说的，那是一个修女，和她关系很亲密。

假期的头几天像往常一样令人愉快。露易斯被从家里召来，照顾艾米莉亚的工作就交到了她手上。我们在一次次外出游玩的间隙也暗暗窥视着是否一切正常。从巴登请来的医生断言："真是个令人钦佩的老太太。"于是，光照充沛的漫长日子又回到了我们身边。有一次，白天，爸爸和萨洛舅舅把担架床抬到屋外的草坪上。于是我才从近距离看到她。这是一种很高的担架，靠四只脚支撑，华而不实的装饰，让人想起某种古老的祭器。老实说，还不如说它是只老式的柜子，四个角上粘着凸起的桌腿，你几乎一眼就能看出是那种廉价的手艺。

一些日子里，她蜷缩在床上，一声不吭。她那张瞎子的脸上看不出任何渴望或者痛苦的表情。萨洛舅舅兴高采烈地说："真是个令人钦佩的老太太。"第二天他去了维也纳。爸爸又重新开始看他的校样。

那时候似乎有某些令人担忧的信号已经慢慢潜入，不过这些信号过于微弱，无力打破早已注定的生活秩序。特蕾莎小姨勤奋地学习。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这是一种苦行僧般的修炼。每个星期她出去参加一次考试，回来时眉头紧锁，眼窝暗黑，头发干枯蓬乱，然后回到她的房间把自己关在里面。妈妈曾说，她年

轻那会儿要求还要严厉。说归说,其实什么也没有耽搁:外出漫步,泛舟河流,酒馆里轻松的午宴和夜里的晚餐。剧院准备把爸爸的一篇小说搬上舞台,这件事为我们带来了一些新朋友;不过这些轻快的夜晚也并不总是以欢乐而告终。爸爸是弗朗茨·卡夫卡的忠实崇拜者;卡夫卡出版的为数不多的作品完全占据了他的心灵。他从心底里理解这些作品,有时候,关于卡夫卡的争论一直持续到深夜。于是一个新的词汇撞击着我的耳朵:颓废。不过这些争论,说实话,与其说把我吵醒,不如说送我进入了梦乡。

“我们在哪儿?”两眼一抹黑的艾米莉亚醒了过来。

“离巴登不远,一个古老的村子,空气清新,有很多水井。”

“这儿有犹太人吗?”

“除了我们,我想没有别的犹太人了。”

“奇怪,”艾米莉亚说道,“我还以为这里有犹太人呢。”

“您忘了米策尔大夫了,”妈妈说。

“对了,米策尔大夫生来就是个犹太人。”

自从失明的那天起她就不再吃煮熟的食物了,靠生食蔬菜维持。她的女儿们作了很多努力,苦口婆心地劝说,但都不管用。她对煮熟的食物疑虑重重。她告别了先前的习惯,失明后养成了新的习惯。失明后的日子,漫长的日子里,她不再要求什么特别的食物,在这里她也没有提出过任何要求。

乡村的宁静让我们沉浸在夏日的恬淡之中。我们每个星期

去一次巴登。那里的每一家铺子里都是吵吵嚷嚷的度假者。爸爸无法忍受这个地方,把它称之为:犹太小资产阶级的马蜂窝,他们不再是真正的犹太人了,但还是保留着吵吵闹闹一起用餐的习惯。

我们从巴登回来时,爸爸还是把自己堵在房间里细细读书稿校样。这些日子里他的书就这样一本接一本地出来了。当然,有些敌人是不会错过对他施放冷箭的机会,不过,这只是些无足挂齿的敌人,评论家们对他的书颇为欣赏。那一时期,爸爸与斯蒂芬·茨威格非常接近。他们常常在维也纳一块儿呆上几整天。

"我们的艾米莉亚还好吗?"萨洛舅舅以愉快的口吻问道。

"一切都挺好的,"露易斯总是这样回答。

有一天,艾米莉亚想要人帮她支撑着坐起来。她的那张柜子一样的床上安装了一种能把床铺升高的机械装置。我们所有人费了半天劲儿才扳动了那因久未使用而锈蚀的把手,最后我们终于成功了,艾米莉亚从那个柜子里现出身子坐了起来。

直到这时她那张失去了视力的脸庞才暴露在我们面前。她的面庞并不大,岁月已经皱缩在她的这张脸上。

她问了每个人的名字。

爸爸简短地作了介绍,避免太多的细节。

"这儿没有人在做祷告吗?"她问。

"没有,"爸爸吃惊地说。

“我听到有人做祷告的声音。”

“这里是乡村,离巴登不远。”

“又是我的耳朵听错了,”她冲着自己发了通火就又陷入了沉默。

妈妈去准备晚饭,露易斯把床朝后放下,艾米莉亚一言不发地倒在床上。

来吃晚饭的有米策尔大夫、两位男演员和一位兴高采烈的女作家。大约一小时后我就在客厅的沙发上睡着了。这天夜里我的睡眠很奇怪,似乎一切都已离我而去,我抽身而退,如同退入了一片寂静之中,高高的植物丛中的寂静。

第二天天下起了雨,我们正在地里,只穿着轻薄的夏装。爸爸伸出双手,似乎在请求雨水把自己浇透。妈妈捋了捋湿漉漉的头发,脸上又现出年轻的光彩。由于雨越下越大,我们急匆匆地向着临近的农场跑去。爸爸大声叫着:发大水了。这是一个培植蘑菇的农场,供应出口的蘑菇。农场主板着面孔对我们说,今年的雨来得不是时候。我们回去时已浑身湿透。

特蕾莎有整整两天没有露面了。拉丁语考试让她害怕。妈妈一遍遍地和她一起用心念着课文。露易斯走进客厅宣布:“晚饭很合艾米莉亚的胃口,她做完祷告就睡着了。”露易斯的脸上露出一种怪异的虔诚神情,仿佛她照顾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尊活的塑像。

生活按常规进行着:草坪被修剪过了,黑樱桃成熟了,特蕾

莎参加了考试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而我们所有人都在宁静的树荫下找到了庇护所，艾米莉亚开始悄悄地嘀咕着什么。起初露易斯以为是食物不合她的口味，不过她抱怨的并不是食物而是各种吵闹声。她说鸟叫声吵得她夜里头疼。爸爸站在她的床边对她解释说，那些鸟今年一直在这里，是些安静的乡间小鸟，这些小鸟没有任何恶意，这个季节它们好像要飞到比较潮湿的地方。艾米莉亚对此不以为然。这些不是本地的鸟，它们叫起来不像是乡间的小鸟。她很肯定地说着，似乎对那些鸟有直接的了解，不过对我们来说，这番话无异于瞎子的幻觉。可是第二天，当乡间的天空中出现了一大群我们谁也叫不出名字的鸟时，真的令我们大吃一惊，就连房东，一个打生下来就住在这里的乡下女人，也不知道这是些什么鸟；当爸爸过来告诉艾米莉亚时，她眯缝起眼睛，似乎笑了一下，随即又闭上了双眼。

从那时起她就不停地发着牢骚。那些吵闹声，那些蔬菜也不对劲儿，不过她抱怨最多的还是她那几个嫁给非犹太人后改宗的女儿。上帝不会宽恕她们的。怎么可能宽恕她们呢。现在她不能为了她们而死。

“你没有罪，”爸爸努力以宽慰的口气说道。

“我当然没有罪。”

“那你为什么要折磨自己呢？”

“因为我不能死。我怎么能在我的女儿们都成了背教者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呢。”

她的声音里有种力量；在她面前我们觉得自己很渺小，我们就像面对着一个黑漆漆的火山口，从里面喷发出的言语掷地有声，就像金属浇铸成的一样。

“那你想要我们做什么？”

“你们又能做什么？”

因为下雨，没法把她送回疗养院，我们不得不再听她发上一个星期的牢骚和诉说内心的痛苦。她的嗓门一天天地升高，她漫长的记忆似乎重新被激活了。不过最坚定的还是她的信念；她那些强烈的复仇的信念。上帝不会怜悯那些背教者。他们永远也得不到安宁。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在天国里。她的脑袋里分门别类地装着每一个我们和她所知道的背教者的名字，她不停地叫喊着这些人的名字。

劝阻完全无效，她的抱怨声却越来越响，爸爸决定，除了把她送回疗养院别无选择。第二天担架已经搬到了屋外。马车准时到来了，我们没有征求她的意愿就上路了。

一路上她一直在自言自语。现在显然她不再怜悯自己，而是可怜起她的女儿们来了，怜悯她们将要在另一个世界里遭受的严厉判决。我们上了火车，爸爸一直在试图掩盖自己的羞耻感。

到疗养院后办了一个简短的手续。那个照顾她的修女看到她很高兴，我们从那里出来，就像刚做了一件见不得人的丑事，羞愧难当，语无伦次。

余下的假期我们是在屋子里度过的。特蕾莎不停地复习着

功课，有妈妈帮着她。每一次考试过后她的嘴唇上就刻上了一道粉红色的印痕，不过她总算都熬过来了，在规定的时间内通过了所有的考试。夏末的光辉是完满的，天空中没有一丝瑕疵。如果不是艾米莉亚挥之不去的声音，这个假期本来可以平静地走向终结。

露易斯不停地说："我不知道艾米莉亚对我做过什么，她改变了我，或者怎么说呢，我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

"什么事儿也没有，"妈妈安慰她说。

"我再也睡不着觉了，"露易斯抱怨说。

米策尔大夫要去他母亲那里，我们为他准备了一个小型的聚会。他又把我叫作小犹太佬，说我是个应该在运动场上经受锻炼的小犹太佬。特蕾莎没有参加这个聚会，露易斯为她找了一个男朋友，他们一块儿出去玩了。

自从艾米莉亚离开我们之后，露易斯再也无法在这个家里找到安宁，夜里很晚她才回来，脸色通红，头发凌乱，立刻钻进被子把自己藏起来。一天晚上她突然放声大哭，哭得撕心裂肺一般："自从艾米莉亚离开我们后，我就越来越堕落了，男人贪婪地啃着我的肉体。我会变成什么样？"

妈妈抚慰她说，"我们很快就回家了，你会忘掉这一切。"可她还是无法平静，盲目的、难言的痛苦折磨着她，她无时无刻不停地提起艾米莉亚。似乎她丢失的不单单是她的青春，还有她的守护神。那一年秋天她离开了我们家。

4

秋天爸爸出远门去了地区首府，为了一桩被放弃的遗产提起法律诉讼。这是个久远而丑陋的案子，让爸爸不得安生，爸爸决定一劳永逸地了结这桩案子。不过这似乎只是让事情愈加复杂。即使是文学事业的成功也无法令爸爸容光焕发了。一家出版商要求进行删节，宣称作品的长度让人厌倦。我记得，这让爸爸很恼火；可是几天后，像往常一样，他最终发现那个人说的是对的。的确存在缺陷，严格地讲，缺陷还不少，文体也远不能说完美。

爸爸花了好多天时间仔细地修改，最后还是不能令人满意。他写了一封长信，表示歉意，要求把手稿还给他。与此同时，那桩久远而丑恶的诉讼又开始了，爸爸决定去地区首府一趟，至少把这桩诉讼给了结掉，或许这样也可以缓解一下他所遭受的屈辱。

可是事情的发展往往不遂人意，好多人在那儿宣称对这份小小的遗产具有所有权，还气势汹汹地宣称要聘请厉害的律师为他们诉讼。整整一个星期我们没有听到他的任何消息，到了周末妈妈也急匆匆地赶去首府，只剩下我和新来的女佣留在家里，她是个高个子女人，有着一双南方人的透明眼睛，谨小慎微，缺乏幽默感。

我的日常生活突然间变得冷冷清清，井然有序，夜里一束冷光无情地停留在我的床上。新来的女佣以前显然在那种高高在上，与世隔绝的人家做过，她把那里的寒气也带到我们这里来了。

一天晚上我的小提琴老师丹奇格出现在门口。他比以前更高，也更瘦了，他的条纹西装从前总是熨烫得那么平整，现在却随随便便、松松垮垮地披在他的身上。新来的女佣在门口准备像打发乞丐一样把他打发走，可我坚持要求让那个男人进来，还给他倒上一杯咖啡，女佣一开始拒绝这样做，但看到我的态度很坚决，就又同意了。这时我才注意到一些变化，他脸上一副失魂落魄的神情，左肩微微地颤抖，并一直传递到他的手掌和细长的手指上，那曾经松软细腻的手指，此刻正以与肩膀相同的节奏颤抖着。

他正准备坐船去澳大利亚，不过在离开欧洲之前，他想要来向我们辞行并表示歉意。那都是他的错，一种他无力发觉的潜伏的缺陷破坏了他的演奏。我们坐在客厅里，他对我提起了他

的双亲，家境宽裕的纺织品商，他们毕生都在为他而辛劳，把他从一所学院送到另一所学院，从一个艺术大师送到另一个艺术大师手中，就是为了改掉他那些纠缠在他的演奏中的缺陷。起初他似乎根除了这些缺陷，也许还从缺陷中生成了某种全新的力量。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他的手指或者是他自身存在某种力量阻止他达到完善；于是在他已故母亲的建议下，他决定做一名小提琴教师，专教那些有钱人家的孩子，可是有一天他突然觉得，他把自己的那些缺陷也传给了那些稚嫩的孩子。

“你还拉琴吗？”他问道。

“不拉了。”

我想要让他高兴起来却又不知该怎么做。我给他看了我的三年级成绩单和爸爸最近那本赢得颇多赞誉的书。新来的女佣坐在厨房里，把我们的一举一动尽收眼底。我注意到：一个寒酸的穷鬼坐在精心布置好的客厅里让她极为不满。不过我却是喜滋滋的，仿佛从前那些清晰的生活片段又回到了我的身边。我喋喋不休地对他讲起当时成功考入维也纳艺术学校的特蕾莎。他充血的、冻成暗棕色的脸颊，好像一下子苏醒过来，凄然地望着我。这时我才明白：那些扎下根来的小小缺陷，已经变成了一道道伤痕，如今他将带着他的伤痕远行到澳大利亚。

我对他讲起了露易斯。以前丹奇格总是跟我们一起去度长假，他会带上小提琴拉曲子给我们听。那个时候他身上已经被打上了某些羞怯的单身汉的印记，虽说如此，可我们有时候也会

看到他和一个乡下姑娘在一起。丹奇格常常抱怨演奏中的缺陷，爸爸总是半开玩笑地向他建议说："娶个乡下姑娘，我的朋友，要不就改宗，这些缺陷就会一眨眼消失的。犹太人的多愁善感对艺术并不是好事。"

从那时起，缺陷变成了伤痕。

女佣给他端来一杯咖啡和一片不新鲜的蛋糕，丹奇格把头埋在杯子里。我的话戛然而止，我不知道该对他说些什么，也不知道怎么才能让他高兴起来，他那埋藏在咖啡杯中的脸庞让我木然呆坐在那里。

"你干嘛不留在我们这儿。爸爸妈妈会很高兴的。"

"不能改变了。我明天必须得赶到维也纳。"

我知道，我的小手帮不了他什么忙，不过我还是又一次恳求他，留下来吧，此刻我所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些了。丹奇格站起身说道："我得走了。"夜色已朦胧，我无助地倚在门口，沮丧万分。

第二天爸爸妈妈从地区首府回来，把一阵异样的骚动也带到了家里，有些话显然是他们从那里学来的。我什么也听不明白，只是感觉到：他们似乎还置身于那里。爸爸脱下冬天的鞋子，把衣服东一件西一件地扔在客厅里，完全是一副疲惫的生意人心不在焉的样子。妈妈不停地因为出庭的主要证人而辩解着。当我告诉他们丹奇格前一天来过并要去澳大利亚的时候，爸爸说："谁？"妈妈甚至连问也没问一声。他们俩都还完全沉浸在这桩诉讼案中而无法自拔，其他任何事都已经无法让他们

分心了。爸爸诅咒着那些被金钱弄得鬼迷心窍和无时无处不吵吵嚷嚷的犹太小人,阴暗的贪婪欲望让他们的脑袋发了疯。

那天夜里,一丝孤独的感觉缠绕着我。此时我知道:那些宁静的日子,那些房间里填满了琐碎而平静生活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好几天来,家里一心一意只想着法庭的事儿。爸爸一刻不停地谈论着那些不怀好意的证人和没安好心的法官。尽管没有人提到艾米莉亚的名字,可是她那被囚禁的声音似乎依然在两层窗户之间回荡,她的面容即使到了冬天还是驱之不散。

特蕾莎已经深深陷入她的学业之中,她的那些文字优美的来信让我们感动不已。她的学业一帆风顺,不过在信中并未表现出过分的欣喜。信中描述了很多细节,显露出她敏锐而细腻的感觉。爸爸在读信的时候对她精准的描写惊叹不已,信中还不乏一丝不易察觉的幽默感,似乎她自己与学院中的纷纷扰扰毫无干系。谁都不会想到,她连这个艰难的夏季家里所发生的一切也没有遗漏任何细节,如艾米莉亚的到来和离去,萨洛舅舅的疯狂举止,以及露易斯的性冲动。这样她虽然身处远方,却似乎离我们很近。谁能料想,在这样一个纯净的灵魂里,已经敲响了暗无天日的丛林大鼓。

5

此刻我依然清楚地记得那趟从巴登回家的夜班火车。一年又一年我们都是走的这条路。那些个夜晚欢乐和恐惧的嘈杂声从我童年时起就一直萦绕在我的耳际。可是我记住这条路的原因更多是与我母亲的妹妹特蕾莎姨妈有关,是因为和她在一起度过的那疯狂的夜间行程。有时候,在假期之中,突然有一种隐秘的欲望映现在她的脸上,苍白的面色一直延伸到她的脖颈。有些日子里,她一言不发,就像陷入了某种半梦半醒的状态。当她清醒过来后,脸颊上出现了一道尖利的褶痕。噘起的嘴唇中轻轻发出一些我不解其意的词语。可是我知道:这里已经不是适合于她的地方了。一种纯净而骇人的美闪耀在她光滑的前额。妈妈匆匆地收拾好两只颜色鲜艳的箱子;夏日的阳光,照出一片郁郁葱葱,在我们的头顶上映着一片丑陋的秋云。

阳光照耀着,而我们站在车站餐厅昏暗的后门口,爸爸悄声

与领班商量着什么,就像在谈论一桩可疑的买卖。甚至连送我们去车站的马车也不是那种布置得富丽堂皇的马车,而是一辆套着两匹瘦马的普普通通的马车,似乎我们一下子成了穷光蛋。爸爸走在我们前面,衣服敞开着,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在掩盖什么丢人的事儿。

"上路,"爸爸用乡下口音喊道。

马车也像是羞于见人似的拐上了一条土路,这条通往工业区的土路我们从未涉足。我还在心存疑惑,那些靠近糖厂的晦暗的破房子就来到了眼前,证明这个假期不会以一种极为体面而华丽的方式而告终,就像以前每年那样。

最近几个月,特蕾莎姨妈由于周期性发作的抑郁症而住进了一家以圣彼得命名的著名疗养院。我们在家里悄悄提起她的名字,带着一种不易察觉的惊惧。每个星期妈妈都要坐车去那里。她有专为这一行程准备的外套和几顶帽子,回来的时候她的额头总是放射出一道锐利的光芒。我从来都没有问过,那儿怎么样?或是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之间似乎达成了一种默契,我什么也不问。你瞧,春天的时候她却出人意料地回到了我们身边。她竟然已经是那样一个身材高挑而年轻的女子,那么像妈妈,甚至连坐在椅子上的样子也像极了。从她的脸上看不出任何陌生的印记,身上穿的长衣衬托出她的身材。明媚而温暖的春色流淌在街道上,欢快的气氛也洋溢在我们家里。爸爸出版了他的第四本书,并且取得了成功。两家杂志赞扬了他的

风格，并说他给奥地利文学带来了一种病态但却新奇的美感。斯蒂芬·茨威格寄来了一封贺信。爸爸的成功也让我们觉得很光彩。法官、律师和医生从我们家进进出出，他们在这个平静的地区范围内很少找得到这样的刺激。

不过这个春天是属于特蕾莎的。夜里，她把脸靠在炉边，穿着长裙，似乎这个女性的身体已经成了宗教情感的化身。妈妈一刻也不敢离开她的身旁。关于疗养院里的生活她一个字也没提过，可是她的一举一动，绵延而优雅，仿佛夜风、巨树和渴求内省的生命提升了她的心灵。我们也被这种无声的壮景所捕获了。空旷的房间饥渴地吸取着亮光。两把用鲜花装饰的遮阳大伞被拿到了阳台上；尽管当时家里没有女仆，我们的晚餐却有着丰盛的蔬菜。

连那些夜晚也被微微的不安所涤荡。爸爸嘴里那些清晰而晓畅的话语充斥在我的耳边，比如，咱们一块儿把角落里的那张桌子抬起来，把它抬到阳台上去，春日的天空不会让我们失望的。而妈妈的话，总是让人难以捉摸。她说话的态度就像一个屡屡犯错的人，她会鼓足勇气说，也许还应该拿上那些柳条椅。这种琐碎的布置好像一下子让我接近了古老仪式的气息，那种被我们遗忘的仪式，此刻好像复活了，轻而易举地复活了。

夏天来了，特蕾莎的脸上再也看不到不祥的痕迹。她穿上夏季的窄上衣，看上去又像一个女学生了，一个因学业负担而在举手投足间现出疲态却又楚楚动人的女生。而我呢——我在学

校的课程也结束了。时机已成熟，该是走出家门的时候了。这种温和的转变过程伴随着各种准备活动，这一次完全像过节一般。特蕾莎暗自成长，让人想到她所逗留过的那些十分宁静的地方。就连她笑的时候，那种从那里吸收而来的宁静也没有离开过她的额头。突然间，正当我们还沉浸在优美的风景，陶醉于阳光之中，泛舟河上，暴露在太阳底下的时候，特蕾莎的脸上出现了那种隐秘、苍白的欲望，它舔舐着她，一点一点传到她的脖颈，一直到她纤细的手指，此后她又陷入了那种接近半睡半醒的沉默状态。

我们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惊恐万状地看着她，犹如直接面对着恐惧。妈妈两腿一软，跪倒在地，紧紧抓着特蕾莎的手乞求道："这是怎么啦，这是怎么啦?"当任何言语都对她毫无用处的时候，爸爸走了出去，站在账台前，和领班悄悄地嘀咕着，一脸惊慌失措的表情。后来我们从昏暗的后门走了出去，走入暮色之中。

我们到达车站时天已经黑了。显然列车时刻表更改过了，我们错过了那班夜车。我们只能在一条亮着灯的烟雾弥漫的狭窄过道中等待下一班火车的到来。这时我看到：一只只熏黑的罐子挂在千疮百孔的顶棚下，发出难听的嗡嗡声。

爸爸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目光游移，仿佛想要守护坐在头等车厢站台长椅上的我们。妈妈不知道为什么穿着冬季的雨衣。不远处，在通过栈桥与车厢相连的旁边的货栈中，有马匹从

里面一对一对地走出来，马腿上戴着镣铐，马眼被麻袋布蒙着。两匹马用蹄子在松弛的木板上摸索着前行，跌跌撞撞，后腿直立起来，像是害怕那个站在货栈门口咆哮着的马夫手里的马鞭。可是马一走过栈桥，那个车厢旁边的马夫鞭子就抽了下来；马抬起被铐着的腿，落到像一只只盒子一样的车厢里。栈桥上一下子变空了，马夫们交换了一下眼神，又有两匹马，同样被铐着腿，蒙着眼，从货栈门口出来。

不一样的黑暗从屋顶上降落下来，刚才的那幅画面从我的眼中消失了。爸爸问道："有人要柠檬水吗？"

与此同时，后面站台上的人越聚越多。罩在格栅里的灯泡照亮了潮湿的地板。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再过一会儿那些被蒙住眼睛的马就会冲进站台把这些人踩在脚下。不远处的售货亭旁还聚集着另一群人，穿着不同式样的黑色条纹服，嘴里贪婪地吞咽着三明治。

"这些人是谁？"特蕾莎问道。

似乎没有人听到她的问话。

"这些人是谁？"她又一问了一遍。

妈妈弯下身子轻声说道，"犹太人。"那样子就像在解释一个意义不明的词汇，一个从街头巷尾学来的词语。

"最近这几年他们的人数在这里增长得很快，"爸爸高声说道，紧接着又像是自言自语地加上一句，"我们到车厢里找点喝的。"

特蕾莎此刻目光如炬，聚焦在这个近点之上，好似要用眼中的光束捕捉住这个聚焦点。她蓦地咯咯笑了两声说道："他们在吃三明治。"

这个美丽的假期，用树木和河流编织而成的假期，在这寒气逼人的黑暗中渐渐皱缩，只留出一块狭长的地板，被那些灯泡发出的稀疏光亮切割开来。脚夫们坐在柜台旁抽起了烟，他们黑如煤烟的脸庞上隐约流露出一种听天由命的神情。

"这些人是谁？"特蕾莎又问道。

"犹太人。"妈妈说。

"他们要去哪儿？"

"我不知道。"

我们家里一直在议论着犹太人，不过总是压低了声音，外加不屑一顾的神情。有的时候也会有一阵突然的情感爆发：不可否认，我们也是犹太人。自从爸爸发现布伯[①]之后，这个小小的耻辱就找到了某种补偿，并不完全的补偿。几年前，爸爸去法兰克福与马丁·布伯会面。那时候家里充满了期待，妈妈不知道该怎么对我解释这种期待。可是当他回来时却并没有带来特别让人高兴的消息。他给我带了一袋玩具，但脸上却黯然无光。过了好多天我才明白，这次会面并不美妙。

---

① 马丁·布伯(1878—1965)，生于奥地利的德国犹太宗教哲学家，《圣经》翻译家，1938 年被迫离开德国。

此刻我才第一次见到东方犹太人：矮小、瘦弱，站在售货亭旁狼吞虎咽地吃着东西。有些人还穿着款式陈旧的衣服。他们即使在吃东西的时候也像是被捆绑在一起。他们在夜晚的出现没有任何引人注目之处，要不是特蕾莎把她梦游般的目光投向他们，这次他们又会让我们视而不见。

“他们要去哪儿？”特蕾莎又一次问道。

“我不知道，”妈妈说。

黑暗此时从那高高的、千疮百孔的顶棚上和悬挂着的罐子那里降落下来。人群簇拥到后面三等车厢的站台上。头等车厢的站台上空荡荡的。爸爸站在栅栏旁，就像是这个隔离栏的守卫。

快车突然出现了，特蕾莎站起身来，样子就像一个仍然听凭父母摆布的小女孩。爸爸提着那两只色彩艳丽的皮箱，向上用力把箱子推进了车厢。车厢里很空。一种熟悉的混合着香水和烟草的气息又让我重新感觉到那种熟识的家庭的气息。头等车厢大多是空荡荡的，总是用绿光来迎接我们，这是因为那些绿色的窗帘，贫乏却依然体现具体的形象，那些树林和公园的形象，我们就是来自那里。那一小群分散的脸庞，总让我觉得不是遮遮掩掩，就是病病恹恹的样子，但又不乏棱角。一连几个小时我都会注视着这些寂静的跳动的场景，来回往复，就像一种无声地盘旋而上的音乐一般令人着迷。

此刻，不知什么原因，这节车厢看上去十分破败。或许是因

为那些棕色的窗帘。阴影散布在车厢的每个角落里，是那些几个小时前在这里的人留下的影子。

列车刚刚奔驰起来，头等车厢就已经开始供应午夜咖啡了，特蕾莎从半梦半醒的状态中清醒过来，说道："我不回疗养院。"她柔嫩的脸庞阴沉下来，嘴角上浮现出尖利的神情。

"你在说什么？"妈妈搜肠刮肚地找寻着回答，"我连想都没想过。"

"那你对我发誓。"

"我发誓，"妈妈说。

显然，现在怎么跟她说都没有用了。她又要求我们把她送回家，不是回我们的家而是回到她父母的家中。

"我们已经没有父母了。"妈妈以恳求的语气说道。

特蕾莎的回答是残酷的。"我们当然没有父母了，我们杀死了他们。"她的声音里透出一种强烈的哀婉的语气，似乎并不是在说她自己，反倒是我们对她犯下了不道德的恶行。火车正在加速飞驰，特蕾莎站起身来宣布，我们要在最近的车站下车。她无法再忍受这些绿色的气息和涌动在她周围的邪恶企图。妈妈乞求着，赌咒发誓说没有人打算加害于她，车厢里除了我们没有别人。可是特蕾莎好像什么也没有听进去。我们在第一站下了车。像穷人一样拖着行李。

已经是午夜时分。空荡荡的车站上响起了哗哗的冷水冲刷的声音。信号牌亮了起来，火车潜入了黑夜之中。原来这群带

着所有他们能够搬动的物品的犹太人也在这一站下了车。他们和他们那些尖叫的孩子,这时候看上去就像一只被拆散的包裹。

“我们在哪儿?”特蕾莎怒气冲冲地问。

“我不知道,”爸爸说。

奇怪,爸爸的火气现在都倾注到了这些可怜的漂泊者的身上。似乎是他们不怀好意地跟着我们在夜里经历了这一番折腾。特蕾莎的病好像被我们忘却了。两只色彩艳丽的皮箱,表明度假者的高贵身份的皮箱,随意地扔在地板上,无人过问。

“什么地方你都能看到他们,”爸爸用愤怒的口吻说道。

妈妈一直努力在用各种我不解其意的话语抚慰着特蕾莎,让她摆脱那种胡思乱想。最终妈妈却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确想把她送回疗养院,而现在她对这一企图深感后悔。

然而特蕾莎的眼中依然流露出阴郁的疑惑。远方的教堂敲响了夜半的钟声,我们站在入口处,边上是长长的、紧锁着的货栈,还有那些可怜的漂泊者,车站值班员不允许他们进去。我们一起站在夏日阴凉的夜空下。

“我们上哪儿去?”妈妈鼓起勇气问。

“我们去教堂,”特蕾莎坚定地说道。

“夜里所有的教堂都关门了。”

“这不要紧。”

“我们走吧,只要离开这儿就行。”爸爸站直了身体。车站值班员什么也不知道,他知道的只有一件事,今天夜里没有火

车了。

“那这里附近有旅馆吗?”

“我想没有。”

“要是没人在这儿过夜,也没有旅馆,快车为什么要在这里停站呢?”

“您是问我?”车站值班员诧异地说道。

“我不问你问谁?”

“当然,你有权问我,但别指望从我这儿得到答案。”

“那马车呢,连马车也没有吗?”

“那儿有个人,睡在长椅上的那个人。”

夜色越来越深,夜色仿佛一道厚重的圆环笼罩着车站上依稀的亮光。夏日的凉意,来自河边的潮湿的凉气,拍打着我们的脸庞,渗入衣内。

睡眼惺忪的马车夫答应带上我们。我们挤坐在一辆旧马车上,身上觉得凉飕飕的,马车行驶在没有铺石子的土路上,走过一座座狭窄的乡间小桥,我们被特蕾莎反复无常的病情搞得晕头转向。

“别听他们的,去教堂,”特蕾莎冲着马车夫说道。

“我的小姐,教堂夜里都关门了。一个人都没有。”

“我说了去教堂。”

“男主人在这儿。如果这是男主人的意思我就去。”

“去教堂,”爸爸说。

“你干嘛不早说？现在我还得走回头路，”马车夫咕哝了几句。

特蕾莎坚决的愿望似乎也把爸爸吓住了。马车翻过一座又一座山头。夜光变换，远远地看过去闪烁迷离，又渐渐消失，仿佛来自遥远的空间。这番折腾似乎还到不了尽头。

最后马车终于停在一座乡村小教堂旁，教堂四周围着朴素的尖桩栅栏。

“到了。你们还想怎么样？”马车夫喊道，仿佛他应付的不是一群活人而是几个鬼魂。

爸爸下车站立着，一副别无他求的样子。特蕾莎在黑夜中更显高大，如同一位狂热的女教士。妈妈弯着腰站在她身旁。就在我们还疑惑地看着她要干什么的时候，她已经踩着敏捷而坚定的步子朝着大门走去，她一路拨开垂下的树枝，仿佛一个在黑暗中也能认清自己道路的人。我们就像瞎子一样被她拽着往前走。她在紧锁的大门前站立了片刻，双膝跪下，像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般低下头——她划着十字，随即便开始抽泣起来，带着痛苦的哭声，她哽咽着，身子一颤一颤。

我们弯腰把她拉起来。

“上路，”爸爸冲着马车夫怒吼道，那架势仿佛想要让马儿安上翅膀。下坡时，马儿飞奔起来。特蕾莎依然啜泣着，身体不停地颤动。妈妈给她裹上一件冬装。

“快走，”爸爸吩咐马车夫。马控制着自己的步伐，并没有

使出更多的劲头。余下的一整夜马车在似路非路的道路上转东转西,驶过灌木丛和坚硬的泥地。

当晨光微露时,我们已经回到了昏昏欲睡的车站。爸爸的脸上笼罩着一层苍白的阴影,仿佛有一种异样的力量统治着他。妈妈尽力表现出很有经验的样子。马车夫索要了一大笔钱,爸爸耸了耸肩,就没再跟他讨价还价。

我们刚要站起身来,特蕾莎却在妈妈的怀里睡着了。

我们缓步下了车,走进熹微的第一缕晨光中。快车还会在这儿停吗?站长坐在他的座位上说,"有时停有时不停,全凭中心的指令。"

"那你就什么也不知道吗?"

"对。"

爸爸站在那里,身边是两只花花绿绿的箱子,似乎正要绝望地发作。

快车准时到站并停了下来。

我们把特蕾莎架上空荡荡的头等车厢。她睡得很沉,这跟夜里的那番折腾有很大关系。苍白的阴影没有从爸爸的脸上消失,似乎正吸吮着他生命的活力。

我还记得:我们从巴登回家的路途曾经是多么愉快。此刻我们甚至变成了这辆我们所熟知的快车的囚犯,穿过那些我们所熟悉的地方,直到令我们感到心痛。两个妇人慢慢呷着清晨的咖啡。她们苍老的脸上流露出某种令人惧怕的满足,似乎连

她们也成了我们这场噩梦的一个组成部分。相邻的车厢有一个醉鬼耍起了酒疯，列车员正在和他周旋。醉汉咒骂着犹太人和他们的金钱，咒骂着总是晚点的火车。列车员没有注意听醉汉的咒骂，只是要他把地方让出来。那两个老妇人停止了交谈，用余光瞟着我们，目光中并没有有什么直接的企图，只是有几分戒备。光线渐渐伸展开来，那熟悉的树林和熟悉的草地，从我更小的时候开始我们就一年又一年穿行其间的树林和草地，渐次暴露在第一缕阳光的照射下。特蕾莎额头的皱纹化开了，她苍白的前额显得纯净透明。我一下子意识到：我们家里从来没有大声地谈论过特蕾莎，只会用一些暗示宗教神秘的词——或是暗示过早死亡的词。

火车向前飞驰，令人沮丧的是，再过一会儿我们将又一次与特蕾莎面对面交锋，这种沮丧的感觉又开始统治着我们。不过睡眠似乎让特蕾莎有所好转。她从沉睡中醒来，脸上释放出和解而温柔的光芒。她不再问去哪儿或是为什么了，似乎心甘情愿要回到疗养院去。这立刻又让我们觉得颇不自在，似乎我们欺骗了她。

妈妈问，“你不想和我们回家了？”

“假期结束了，”特蕾莎笑了笑，“姐妹们在等着我。”这时她说到姐妹们就像说到亲人，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一般。妈妈不知怎的问她是否必须穿上袍子，特蕾莎说，那里的一切都井然有序，让人赞叹。修女们早上做祷告，谁只要愿意都可以参加她们

的祷告。开饭很准时。她用一种柔和的,带有禁欲色彩的语调缓缓道来,仿佛平静的疗养院完全占据了她的思想。不过对我们来说,这却是一种极为奇怪的解脱,我们似乎一下子成了多余的人,被她的病情所抛弃。

路程越来越短了。中午时分我们抵达了疗养院。我们窘迫地站在拱形的天花板下,那上面装饰着各种易于理解的宗教标志。疗养院就坐落在这家以圣彼得命名的修道院中。修女们友好地迎接我们的到来,什么也没有问。

此时的特蕾莎举止活泼,彬彬有礼,如同一个回到自己的地盘和最亲近的事物中的人;我觉得,她马上就会脱下她的度假服装而穿上修女的道袍。妈妈抽紧了脸,眼看就要哭出声来。但她并没有哭,而是以一种怪异的方式伸出双手,仿佛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感到羞愧。

于是,我们才突然发现被免除了所有的义务,在这个由郁郁葱葱的草坪、雕像和喷水池所构成的空间里,只剩下我们几个人。两位修女亲切地拥抱了特蕾莎,我们只是眼睁睁地看着她在白色大理石地面上远去的身影。我注意到:特蕾莎没有拥抱妈妈。

夜晚我们回到家里。两只色彩绚丽的箱子放在进门处的屋角。这一路上所遭受的所有侮辱和经历的所有磨难都被吸收进了箱子的皮革中。爸爸穿上拖鞋,脸上恢复了自如的神情。房间里一片狼藉,仿佛有陌生人在我们离开的时候闯进来大肆乱

翻了一通。妈妈没有脱掉裙子。她坐在扶手椅中，她的大眼睛被散落的脂粉弄得有些迷离。我蜷缩在沙发里，期待着有人走过来脱下我的鞋子。可是妈妈没有向我走来。一种冰冷的、折磨人的忧伤，从屋子的各个角落里升腾起来。

后来，爸爸和妈妈坐到屋角的桌子旁，吃着腌过的沙丁鱼。他们把面包在油里蘸一蘸，一言不发地吃下去。不知怎的，我感觉他们以前吃东西时从来都不是这样一副机械性的样子。看来是饥饿让他们改变了习惯。

我试着回忆，可是什么也不能让我感到害怕。只有候车室里那幅马利亚的圣像，给粉色的婴儿哺乳的画像。我感觉到：黯淡的画面上出现的这抹粉色渗入了我的脑海，并在其中流淌着。

6

转眼间一阵狂风暴雨突然袭来。爸爸一个不知名的对手开始发表了一系列诋毁其作品的文章。那是家偏远的地方报纸，主要登载一些地方性的政治、经济消息和妇人们爱读的文章，这家报纸发现了一个新的耸人听闻的主题，爸爸的作品。“没人知道他的对手们在哪里聚集，”爸爸手里拿着第一份报纸说道。从开篇文章就能看出，对手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并不满足于轻轻带过地贬低几句，而是意图借题发挥。

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作家作品中的主人公是谁，他回答说：既不是城里的奥地利人，也不是乡下的奥地利人，而是犹太人，失去了偶像的犹太人，如今他们是一群没用的废物，腐败堕落，误入歧途；他们是一群寄生虫，全靠健康的奥地利传统才得以苟延残喘；那不是他们的精髓而是别人的精髓。不能说这种寄生生活缺乏一种美妙，但那只是属于寄生的美妙罢了。

这是篇恶毒的侮辱性的文章，不过其中多少还有些价值，特别是当他把话题扩展到所谓可耻的美妙时。爸爸忿忿不平，但还是努力掩饰着他的怨恨。他想，他那么多朋友中总会有人出来为他辩护。但没有一个人出来。一个星期过去了，第二篇文章发表了。这一次是公然的诋毁。攻击的目标不是作品，而是针对创作者本人。这位批评家费尽心机地搜集了爸爸的早期作品以表明这种寄生性是如何成型、扎根，并且渗透到奥地利文学创作的精髓之中，在这片土壤中繁衍出寄生的孢子。这里没有人类，只有一群骨瘦如柴的魔鬼，他们不是富有情感的血肉之躯，而是浑身上下充满了邪恶。他林林总总，大大小小地挖出各种证据，甚至连爸爸年轻时在学生报纸上写的诗，也被搬出来以资佐证。

当时甚至不能说这些文字是出于反犹太主义者之手。这位批评家，从其姓名来看，是个犹太人。文章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地发表出来，却没有人予以回应。似乎人人都赞同他那些粗暴的判断。严酷的秋天降临到这座城市，爸爸下到放木炭的库房，从那儿提上来满满两桶木炭。妈妈把双层窗户安上。朋友们晚上来谈论的，当然就是那几篇言辞激烈、诋毁名誉，整版整版地登在报纸上向爸爸的脸上抹黑的文章。爸爸依然保持泰然自若的神情，不过从他的脸上看得出来，对他来说这并非易事。

与此同时，特蕾莎来自修道院的第一批信件也陆续寄到了。她讲述了修女们对她的悉心照料和包围着园中花草的那份安

详。信写得很长，很具体，从信中传递出修道院的宁静。那种清晰晓畅的语言让人想到冬日沁人心脾的空气。

没有任何怨言或怒气。仿佛她的生命停泊在一个温暖的港湾。她描述了她的生活日程：起床，早餐，散步，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古老建筑中的晚餐；以祈祷作为结束的夜晚。妈妈一边念一边哭。

里面第一次出现了一些她掌握的生词：虔诚，祷功，冥想和涤罪。还有一些我无法理解的词汇，我只觉得这是些精巧的，只可轻声细语娓娓道来的词汇，人们没有权利把它们大声念出来。

妈妈分别包起一些衣物、糖果和巧克力，一罐果酱和干酪饼。尽管她什么也没说，我知道，这是为特蕾莎准备的。我跟着她去邮局寄包裹。我们步行了很长的路，走过整条哈布斯堡大街。妈妈什么也没问，我倾听着她的步伐。每天我的日程都一成不变。德语，拉丁语和代数，下午是背诵课文。那些恶毒的文章开始在家里留下印记。爸爸把它们读了一遍又一遍。我们从他咬牙切齿的声音里能听出他是如何与远方的敌人进行着抗争；只有夜晚能使他忘记羞辱。夜晚朋友们的到来让家里充满喧闹。爸爸一次次地宣布，他正在准备一篇详细的答复文章揭露那个无赖的嘴脸。那个无赖，这就是那时候我们对这个无名的外省批评家的称呼。然而这期间，那个无赖的地盘不断向内扩展，不光占据着报纸的版面，而且实实在在地进入了家庭；没有一处角落看不到他的身影。他的文章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越

拉越长，他那高声的宣布响彻了整个奥地利：必须把这个犹太孢子彻底根除。

可是人往往不知道自己来日无多。正当文章还在继续登载，其声势在奥地利全境越来越大之时——无名的批评家却死了。报纸编辑在中间版面发了讣告。这样我们才第一次了解到，这个人病得很重，被束缚在病榻上，最后几篇文章是在他妹妹的帮助下才写成的。一种奇特的宽慰感降临到我们家中。爸爸并没有喜形于色。他只是说，这个人既不知道自己来日无多，也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这些天来恶灵依然游荡，但其力量却越来越虚弱了。我们时不时还能听到爸爸咬牙切齿的诅咒声。但声音终究越来越小直至消失，他又回到他的案头工作中去了。

那时候特蕾莎的信一封封接踵而来。爸爸一边读一边赞赏她细致的描写和丰富的情感。看得出修道院生活在她身上产生了魔力，她的多愁善感也不再仅仅针对自然景色。她的字迹细密娟秀，没有涂改或擦拭的痕迹。我们被特蕾莎的信牢牢地拴住了，不时念上几段，或是伫立在窗前。

一天早晨妈妈起床后说："我要出趟门。"

"上哪儿去？"

"圣彼得。"

晚上她回来了，裹着羊毛围巾，脸颊绯红，眉头上看不出任何表情。原先的忧伤凝结在她的嘴唇间，让人觉得几分陌生而安静。对爸爸的问话她回答说，特蕾莎穿得很好，房间里整整齐

齐,她的桌子上除了一本《圣经·新约》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她很从容地说着这一切。我注意到:妈妈的用词都经过仔细权衡,冷静而没有多余。爸爸问,她是不是真的想成为一个基督徒,需要经过什么程序,妈妈说,这个问题压根儿就没有提起。

日子逐渐恢复了宁静。还是那位无名的批评家,只是换上了另一副面容。不再被称为那个无赖了,而是陶哈尔。全名米哈埃尔·陶哈尔。而且,他成了目光敏锐的陶哈尔,具有某种洞察力的陶哈尔。可怜的来日无多的陶哈尔,需要可怜的妹妹来照料的陶哈尔;于是陶哈尔终于安顿下来,居留在我们中间,似乎成了一位我们收养的家庭成员。

当妈妈试图反驳这无名批评家的一个论点时,爸爸会愤然说道,“我不明白你在说些什么。难道你一点也没有注意他所有的论点都是以文本为依据的吗?”有时候他的火气更盛:“你什么也不懂!”每时每刻,从拉丁语到代数课,以及在我不得不用心学习德国古典文学段落的同一时刻,那个聪明的小丑正在家里游荡,坐着他的轮椅从这个房间转到那个房间。不必问他任何事。他不是已经回答了一切了吗。只需读读他的文章就行了。妈妈尝试用各种新鲜的糕点来减轻爸爸的痛苦。爸爸越来越胖,脸上的赘肉一直耷拉到脖子上。

7

最后一个长假我们是在古斯塔姨妈的乡间住所度过的。那时候，显然阳光已经不再属于我们，树林也不属于我们了。尽管如此，在我们和古斯塔姨妈所万分珍爱的那些为数不多、朴实无华的物品之间依然有着一种温暖的亲密感。

古斯塔姨妈虚弱地半躺着，睁着眼睛，放在低矮的藤椅上的两只小药瓶就是她患有慢性疾病的痛苦标志。漫长的几个小时在这里如同往常一样，与这种或那种糕点的香味交织在一起，似乎只是又过了一个小时而已，夜晚会让我突然感到恐惧，害怕这样的日子很快就要结束。

爸爸那时在校订他的新书。他以一种坚韧不拔的狂热，沉浸在最后的修订工作之中，就像一个性急的人，觉得命运已经不再垂青于他。他从新书里撕去了很多页。这部作品并不能让他满意。电报和快信几乎每天来打扰这个平静的住所。出版商看

来并不理解，作者已经完全被要将作品缩短的热望所吞没。他恳求，威胁，却被更多的紧急信件所淹没。

六月就在这样一种异样的忙乱中从我们身边溜走了。爸爸终于对那么多不令人满意之处作了妥协。他写了一篇长长的序言，表示歉意，重又精神焕发。此后的日子十分宁静，我们呼吸着乡村舒缓的气息。爸爸穿上运动短裤，妈妈在花园里干活，脸上围着透明的纱巾。河水涨潮了，湍急的水流默默地向前，似乎要用无声的水流将这些天来焦躁的喧闹声都吸收殆尽。很快我们又开始外出漫步了；开始只是短距离的，漫无目的地走上岔路，发现自己置身于丛林浓荫下，寂静包围着我们，让我们把步子放得轻柔。就连古斯塔姨妈的脸色也恢复了正常。我们绝口不提维也纳、布拉格、报纸和杂志，多么奇妙的遗忘，仿佛是鲜花的芬芳造成的遗忘把我们抛入了阴暗稠密的丛林。白天与夜晚悄然相连。早起，远足，难以用语言形容的亲密，夜里回报我们的是晒黑的皮肤和疲惫的身体，我们似乎在按着某种盲目的旋律而移动。

七月下了几场大雨，我们不得不呆在家中。爸爸想起他那不完满的作品，阴郁的脸上黯然无光。妈妈试图转移他的注意力，但也只是徒劳。每一处欠缺都置身在他眼前，要求羞辱他。我们知道看不见的利刺扎入了他的肉体。

米策尔大夫出现了。夏季他和年迈的母亲住在一起，冬季又回到维也纳。他当时正在写他那本出名的书："祛除犹太

性——缓解和治愈。”爸爸从少年时起就认识他了，他们一块儿在维也纳上学，还在布拉格共度过一段时间。妈妈认为应该让爸爸置身人群，而不能让他总是孤独一人。可是米策尔大夫并没有带来具有疗效的转变。他会过来尝尝蛋糕，喝喝咖啡，大声吹嘘自己那轻快的沮丧心情。争论是单方面的：米策尔大夫自己与自己争论。他爱憎分明，多姿多彩，充满了力量和机智，他犹如一口深井，能从中挖出一大堆词汇、俗语、笑话，甚至还能哼上几句小曲。爸爸把自己封闭起来。他在自己最近一部作品中发现的大量缺陷使他变成了一个谦恭的男人，尽管从表面上看，他只是保持着原有的礼节。没有人知道在他脸上沉默的面具背后在想些什么。而夏天的雨，曾经让我们精神一振的雨，把我们互相紧密地关在一起。我什么也不需要做，不需要拉丁语，不需要数学，也不需要拉小提琴。我读卡尔·梅的书。晚上，妈妈一连几个小时坐在我身边。光明与寂静共同走向睡眠温暖的边界。如果妈妈说“我不明白”，那就意味着发生了什么事。那么对我来说，这件事已经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米策尔的喜悦让我感到害怕。早晨我站在窗前，数着那些汇集在窗格上的光环。

可是妈妈还是认为，无论是靠夜里轻松的闲谈，还是靠米策尔大夫那种轻快的沮丧，应该把爸爸逗乐才行。雨下个不停，在米策尔大夫的来去之间，那种难以忍受的沉默让这个家不堪重负。因为除了他没有别的人来我们家，他留下的话语填满了我们生活的空间，重重地回响在我们的耳边。犹太人没有艺术才

能，只会唱唱赞美诗，逗个乐子而已。不应夸大犹太人对奥地利文化的贡献，尽管他们填满了所有的杂志和所有的街头小剧场。我会给他们在轻喜剧里派个角色。他的这些话是不是有意针对爸爸的，很难说。爸爸没有写过喜剧，不过参与过杂志的编写工作。他的小说流传很广，在维也纳和布拉格都很受欢迎。可是最近这一年，一片难看的橙色阴云开始笼罩着他的双眼。还有那种绷紧的不满心绪，也清晰地显示在脸上。他常常会头晕。一度处于休眠状态的溃疡重又苏醒并困扰着他。他会几个小时坐在扶手椅上，像是倾听着压迫他肢体的隐秘的病痛。我们曾希望这个假期里壮丽的景色能稍稍转移他的注意，但这个希望没能维持多少日子。妈妈抱怨这场雨把我们关在家里出不了门。

七月末，隆费尔舅舅和他年轻的妻子希瑞尔出人意外地出现在我们面前。舅舅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一些平平常常的生意中，生意虽然还算繁荣，不过大生意还到不了手。希瑞尔舅妈热衷于时装和化妆品。像往常一样，这次他们的到来又带回了些许来自城市的骚动，当然，还是行李箱。两只行李箱在车站弄丢了，最后又完好无损地找了回来。希瑞尔舅妈按她一贯的令人精疲力竭的方式详详细细地讲述着他们所经历的一切。她娇滴滴地叹息了一声，责怪起她的丈夫，然后像要昏迷一般地倒在椅子里。他们的到来每次总是让我们陷入尴尬。要不是妈妈认为应该让爸爸置身人群而不让他独自一人，也不至于这样。希瑞

尔舅妈从昏迷中醒来，大发脾气，又哭又笑。似乎这个世界一直刺激着她娇生惯养的生活。爸爸越发沉浸在他的苦恼之中。

天气的突然好转拯救了我们。我们把乡下土布做成的桌布摊开在草地上吃了午饭。一瞬间爸爸眼中难看的橙色阴云散去了。他模仿着希瑞尔的怪相和米策尔大夫的手势。长距离的散步又使他恢复了亲切的表情。我们以前的对话似乎又重新复活。我们又像孩提时一样紧紧缠绕在一起。

要不是那些夜晚，情况还会更好。隆费尔舅舅和希瑞尔舅妈就像住进了平民旅馆一样舒适地安顿下来。他们把众多的衣物展示在大家眼前；浓重的香水味和未挥发尽的樟脑丸把这个家里修道院般的禁欲气息吹拂得一干二净。

隆费尔舅舅的傲慢，那种在商场上春风得意的商人式的傲慢，在这一年里达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或许是因为他在萨尔茨堡成功地开设了一家分公司的缘故。他不停地对现代文学指手画脚地一派胡言——说什么现代文学是哗众取宠，居心不良，完全沉溺于噩梦之中。很明显，他针对的是卡夫卡，是爸爸如同对待一位真理的先知一般崇敬的卡夫卡。

爸爸忍不住开了口，争论爆发了。那些我无法理解的隐秘往事，被详详细细、阴险而恶毒地捅了出来。当然还包括仅仅几个月前在法庭经过诉讼和争吵后分割的那笔遗产。

爸爸对犹太小资产阶级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说他们的世界里只有金钱、度假村和松松垮垮的宗教信仰。隆费尔舅舅也按

捺不住了。他斥责现代艺术，说那是些根据想像编造出鬼魂、噩梦和性变态的玩意儿。爸爸大叫大嚷地说，一定要消灭犹太商人，他们玷污了每一块好地皮。第二天舅舅他们就怒气冲冲地离去了，就像逃离一所失火的房子。

严酷的，紧追不舍的恶灵又来到了家里。爸爸不再写作，不再校对，也不再回复堆积在他书桌上的一大摞信件；如果对他提起他写的作品，他就会做一个苦涩的鬼脸。古斯塔姨妈的病情恶化了。年迈的乡村医生摊开双手说有必要从城里请医生来，越快越好。这个忠心耿耿的老人把自己视为犹太人，因为其祖父是一个改宗的犹太人，并且也是一个医生。在古斯塔姨妈发病的日子里，他和我们家的关系变得很密切，向我们刨根问底地询问犹太人的习俗。接下来是一阵难熬的，令人绝望的奔忙；从地方上和从维也纳来的医生纷至沓来。爸爸总是筋疲力尽、心灰意懒地从城里回来，有时还喝得醉醺醺的。妈妈坐在他身边，就像坐在病人身边一样。古斯塔姨妈一天天慢慢走向死亡，但神志完全清醒。爸爸在乡村和城市间匆忙奔走，医生和药物，还有那个老是上门、就像亲兄弟般缠着我们的老乡村大夫，这一切都无法缓解爸爸内心的煎熬。我们知道：在一次又一次的等待中，他不是坐在小酒馆里就是在轮盘赌桌前下注。妈妈把痛苦完全埋在心里。

我那微不足道的生活似乎迷失在这一阵骚动之中。遮天蔽日的森林日渐显现出夏末的壮丽。从前窗可以望见一块块方形

的田地，一直延伸到地平线。所有这一切宁静而美丽的景象注定都要终结，这种想法纠缠着我，如同一种赤裸裸的恐惧感。

要是没有那些快递邮件，情况也许会好过一些。这些信件不断地提醒着外界的要求：出版商、杂志以及爸爸允诺要写的文章。夏日的长夜，曾经是温馨的家庭氛围的源头，如今却总是灯火通明，就像时刻处于警醒中的医院，没有一丝阴影。妈妈穿着宽松的睡袍，医生们呆在古斯塔姨妈的房间里，爸爸似睡非睡，像一个失明的信使，生前一直忠于职守，现在却只能无可奈何地半躺在扶手椅里。那老医生没有再来打搅，似乎在里面讨论的话题已经超出了他的理解能力。除了信，间或我们还收到过几张明信片和亲戚寄来的请贴，要是换一种环境，根本不会引起我们的任何兴趣。弗洛姆舅舅背弃了犹太教，到安特卫普学习神学去了；我们一个小有名气的表兄炮制出一篇杂文，讥讽犹太教是一种不讲善行的宗教。我们家族中这些隐秘的伤口，一个接一个暴露出来，似乎再也无法隐藏而现身于世。

爸爸没有表示反对，只是说："强者会走出去自信地迎接生活。"我知道，这句话里隐藏着多少事。我特别注意到"自信"这个词，那是隆费尔舅舅的惯用语。

那个老医生，梅斯特大夫，当时公开宣称："我从未为我的犹太出身感到羞耻。"他说这话时一脸天真无邪的表情。倒是爸爸不知怎么觉得那老医生只是想要抚慰他的苦恼，他说，"至于说到我自己，我不是吹牛，我的犹太出身对我毫无意义。"

当天夜里医生们没有从病人的房间里出来。窃窃私语声传入我们的耳中，声音很微弱，晦涩难懂，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一大清早，医生们走出她的房间，判决书就刻在他们的脸上。

古斯塔姨妈在那个周末去世了，我们不得不按照她祖先的习俗安葬她，她在生前就把这一要求记在了本子上。爸爸从当地弄来几个犹太人。他们说着我们听不懂的语言，吵吵嚷嚷地在各个房间进进出出。这是令人难堪的耻辱，不过由于这是她的遗愿，我们只得默默地按照她的愿望做完这一切。爸爸带着一顶破毡帽，样子怪怪的。

当我们从葬礼上回到家，屋子里看上去就像被洗劫一空。透明的光线照耀在墙上。皱巴巴的窗帘仿佛做着鬼脸。谁也没有走过去关上百叶窗。晚上梅斯特大夫来了，坐在一把矮椅上，像是一个来请求宽恕的人。谁也没有靠近他，他那谦恭的样子更让我们觉得羞耻。

第二天爸爸没有出门去城里。妈妈试图让房间恢复那种修道院般的宁静，可是她根本无力阻止夏季毒辣的阳光侵入屋内。

晚上我们念了遗嘱。遗嘱是用有点学究气的手写体写成的，没有任何夸张的语言。她请求我们的宽恕，却没有按惯例在遗嘱中提到上帝。柜子上的长蜡烛点了三天，直到第四天才熄灭。漆黑的夜又降临到这所住宅。

无精打采、毫无意义的日子，把我们互相铐在一起。爸爸一边喝酒一边撕扯手稿，嘴里还咒骂着出版商和自己毫无目的的

写作。妈妈站在那里，就像站在军事法庭的被告席上。

我们的最后一个长假就这样结束了。

这是一九三八年的夏天。那一年我十二岁，爸爸四十三岁。没有人知道以后将会发生什么，又有什么样的经历在等待着我们。

我们急匆匆地离开那所住宅，好像别处还有一场葬礼在等待着我们。火车停在车站上我们下车时的同一个地方，车厢的边缘熏得黑黑的。工人们在小餐厅里喝着晨间咖啡。一个衣着华丽的女人站在边上，轻蔑地注视着被一大堆孩子拖累的一家人忙乱的动作。天上滴滴答答地下着细雨。没有一个亲友前来送行，有的只是一种陌生感。而我们，爸爸，妈妈和我，也仿佛失去了关爱，失去了语言。爸爸把绿色的箱子推进车厢，脸上痛苦的表情就像一个终日辛劳的苦力。

当我们回到家里，夏日的阳光已经下沉、冷却。妈妈穿着系上扣子的绿色睡袍，她的脸在旧衣服的映衬下现出不自然的镇静。

妈妈说："我没有告诉古斯塔姨妈特蕾莎的事儿。我很高兴我没告诉她。"

"她没有问起吗?"爸爸产生了兴趣。

"她问了，我对她说一切都好。我做得不对吗?"

这时爸爸又噘起了嘴。我知道，某种新的不满正在他的脸上酝酿。

妈妈说:“我不想加重她的负担。”

那所乡村的房子省却了任何的装饰,此刻空空地锁在那里,园子里的花草正在枯萎,当那个乡村老医生从房子旁边经过时,虔诚地低下头,这些想法如同一根无声的琴弦,让我不寒而栗。

爸爸下面的一句话却破坏了这种细腻的感觉:“我恨那些犹太小资产阶级。”我明白,他指的是让我们不得安宁的隆费尔舅舅和希瑞尔舅妈。

特蕾莎的信来得少了。她不再讲她自己的事儿,而是讲起了修道院和里面的生活习惯。从她少许的暗示中可以判断,她已经多少了解了一些其中的神秘之处,其余的她还在尽力去发现。现在她对于我们的称呼方式比以前冷淡了,也不再有情感的起伏,除了她的签名:爱你们的特蕾莎姐妹。爸爸又一次对她叙述的准确和遣词用字的功夫发出赞叹,赞叹她用简单而精确的语言进行描述的能力。

爸爸回到了他的书桌前,我也回到了我的课堂上,历史课排上了日程,有两篇作业要写。文学创作促进会决定在我们家里召开会议。这是一个极为严肃的委员会,以其不偏不倚的公正评判而著称。但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却产生了意见分歧,爸爸威胁要辞职,委员会成员决定推迟作出最后决定。

妈妈穿上冬装出门去看望特蕾莎。妈妈穿上冬装的样子有些奇怪,厚重的衣服让她行动笨拙。我感到,那个令人痛苦的秘

密，没有告诉古斯塔姨妈的秘密，仍然在压迫着她，尽管她一直说，她很高兴什么也没有告诉古斯塔姨妈。在一个天气潮湿而恶劣的夜晚，妈妈从后门出去上路了。

8

我还记得那天晚上栖息在双层窗户上的坚实而纯净的亮光。炉子里的炭灰满满的;不过我记得更清晰的是那个年轻女人带进来放到地板上的那束影子,就像放下了一件脆弱而可伸缩的东西一样;她还带来了一只柳条篮子,里面有一个女婴。

女人坐在扶手椅上,她带进来的影子伴随着她,沾着初霜的影子,在她身边喘息着,似乎担心与她分离。那时,在夜晚柔和的亮光下她看上去是那么美,宛如从我读的书中翩然而出。朴素的地毯与她的双脚很相配,她把两手放在膝盖上,松弛而又有些出神。女婴没有哭。绿色的眸子在她窄窄的眼窝里转个不停。女人缩着脖子坐在那里,脑袋一动也不动。夜晚的亮光在她圆圆的脸上停留了许久,才如燃烧的炭黑一般渐渐暗淡下来。

爸爸回到家时已亮起了灯。女人带来的影子退缩到黑暗的角落。女婴闭上眼睡着了。爸爸很高兴,起初我不理解写在他

脸上的快乐意味着什么。原来她是来自那个乡村，来自我爸爸出生的那个乡村。“难以置信，难以置信，”爸爸叫喊着。仿佛某个他以为永远也不会再见到的生命又回到了他身旁。

他一边重新思量着一边说，“那边还有人吗?”年轻女人露出脸来，一种似倾听又似诧异的表情出现在她的脸上。爸爸问，“那家邮局旁边的树还立在那儿吗?”她羞涩地低下了头。

爸爸不停地说着，说了很多话。爸爸从记忆中搜寻出来的话语让妈妈畏缩在一旁。有一种冬日的气息在响动，仿佛有人拿来了雪橇上的铃铛。最后她终于开口说道:“河里发大水了。桥晃晃悠悠地差点塌了。”他们一直谈到很晚。每句话之间的间隔越拉越长。在言语的间歇中，我在沙发上睡着了。

当我起来时，秋日的阳光已经穿过了走廊。炉子在叫着。牛奶的味道飘散开来，仿佛突如其来的惊喜降临到家中。在晨曦中我看到:诧异的表情依然停留在女人的脸上，即使在她照料婴儿的时候，诧异的神情也未曾离开她的肌肤。她没有像女人们通常那样问我，你几岁了，而只是用她那如同绒毛一般柔软的目光覆盖着我。

“他们还记得我吗?”爸爸问。

“记得。”她紧闭的嘴唇裂开一条窄窄的缝隙。

关于爸爸出生的村子，我只在很小的时候听他讲过一点。而在过去的两年，或许还要更早，爸爸就不再说起了。有时候会向我迸出几句关于乡村的美好记忆，我就会要求他给我讲讲。

可是爸爸却对我的这一要求置之不理，对我信口讲起了别的故事。妈妈就会抓起我的手，放在她的手上，那种感觉和故事一样让人愉快。那些夜晚的记忆甚至比清晨更为清晰。或许是因为那些夜里的话语，入睡之前的话语，也带有睡眠的状态，它们无遮无拦地掉落下来，就像落在松软的土地上。

从她的寥寥数语中我就了解到：她在路上漂泊了几个星期。她的未婚夫没有信守诺言，她确实收到过他的来信，但信上却没有具体地址。乡村永远只是乡村。犹太家庭正在缩减，大部分都是老年人，但他们依然尊奉着古老的信仰。奇怪的是，她的脸上看不出任何愤怒的迹象，也看不到疑虑或是任何情感的表现。没有笑容，也没有哭泣，只有一种诧异的神情。现在爸爸提出的问题似乎也有些让人惊异了。我闭上眼睛看到：村子里一些老年人站在窗前。对遗弃他们的儿女怒不可遏，苦楚的怒火如同黏稠的液体从眼中倾泄出来。

爸爸回到了他惯常的事业中，并深陷其中：基督—犹太联合会准备扩大它们的月刊，并任命他担任编辑。第一期当然是关于马丁·布伯的专刊。马丁·布伯是我们家里常常提到的一个名字。有人完全以欣赏的口吻谈到他，并把他与古代的使徒相提并论，有人则对他的信条提出怀疑。争论有时候很激烈。我很难弄清爸爸的态度究竟如何。有段日子他也很崇敬布伯，但现在他的崇敬已经不是全身心的了。如今什么也不会让他感到崇敬。他的热情消退了。似乎有一丝怀疑的微笑浮现在他的唇

边。只有卡夫卡。只有在谈到卡夫卡时他的口气才和缓下来，仿佛在谈论一位真理的先知。可是谁又认识卡夫卡，知道他的人很少。人们并不喜欢黑色的预言。

就这样，置身于这些严肃问题和世界大事之中，耶蒂安分守己地做着自己的事，女婴在她的篮子里。她似乎不属于这个世界，而属于她甘心承受的遭弃命运。没有人问她，你想要干什么或是你一无所知想要往哪个方向去。她经历的灾难给我们家带来了一种奇异的光芒。或许就是因为这个婴儿。这个粉嫩、强健的女婴。

与此同时，爸爸对两家杂志提出了指控。其中一家称他是传播焦虑的犹太作家，美化主人公的弱点。其原因就是在他血管里流动的不是高贵的奥地利人的鲜血，而是外国人的血。第二家杂志把他称作向往颓废的犹太佬。两家杂志拒绝道歉。一开始，看起来基督—犹太联合会准备站在他一边，但是有几个头头觉得没有必要去炒这碗冷饭。坏事自己会烟消云散的。爸爸只好孤身上阵。

晚上那只黑乌鸦米策尔大夫又像往常一样坐在我们家里。他散布着无伤大雅的玩笑，称爸爸是个不可救药的犹太作家。

“行行好，谁能跟我解释解释，我的作品里有什么犹太性的东西?”爸爸问。

“那种焦虑。这难道不是前代人身上传下来的遗产吗?”

“这难道不是人类的特性。不然我们跟畜生还有什么

两样？”

“对，”米策尔大夫继续发掘下去，“必须承认，这对奥地利人来说是陌生的。”

“我不承认，”爸爸怒吼道，“我不承认犹太性跟我有什么联系。”

“我明白，”米策尔大夫以明显的怀疑口吻说。

几乎每天晚上都是这样，直到最后。

只有到了深夜，我已经上了床，似听非听，爸爸、妈妈和耶蒂会坐在一起谈论着那个遥远的、被人遗忘的村庄，令爸爸痛苦的采石场熔炉。渴望渗入我浅浅的睡梦。那种隐约的渴望，如同夜雨一般。

一天夜里，她无意中透露，那个负心汉正是个犹太人，一个旅行推销员。爸爸怒不可遏：“他们这些犹太人就是这个样子。只有把他们彻底根除才行。”他的眼中燃烧着猎手特有的闪电般的眼神。我看到：耶蒂的不幸遭遇此时在爸爸眼中积聚起了可怕的力量。他发誓说一定要把那个骗子铐到法庭上，让他名誉扫地。耶蒂垂下眼帘，仿佛他说的话与自己的不幸毫无关系。

这场战斗让他找到了众多同盟军：一位退休法官，一名律师，还有那个药剂师和几个生意江河日下的商人。那时已经明摆着的是，抓住他的机会微乎其微，可是爸爸却不肯放弃。他强烈的愤怒已经脱离了自己的控制。

夜里来了两个收集证词的律师。耶蒂对他们讲起了那个村

子，村里的习俗和那个信誓旦旦花言巧语的犹太经理，奇怪的是，从她的声音里听不到任何痛苦。她的话简短得屈指可数。然后，他们就坐在那里边喝咖啡边发泄对那些推销员和无赖们的憎恶，不要脸的犹太人，把乡下人洗劫一空的犹太人。

他们一晚又一晚跑来向她询问。她的记性并不好。“我不知道。我没问过。我很害羞。我相信了他。”这就是她所能说的几个词儿。她的脸红红的，双手放在膝盖上，一副漠然视之的表情。

耶蒂的脸上越来越明显地流露出某种潜藏的喜悦。也许只是看上去如此。她的嘴角露出了微笑。或许她明白这种搜寻不会有任何结果。或许她在对自己说：“我不想再要他了。”在任何情况下她都没有失口骂过人，即便是在那些似乎不骂不足以解恨的时刻。

下雨了，爸爸重又说起了那个村庄的事，不过此时不再有感伤，而只是露出凄苦而无情的笑容。深夜里米策尔大夫来了，带来了屋外的寒冷，他的声音久久回荡。然后又是那种熟悉的、刨根问底式的窃窃私语：没什么可耻的。犹太兄弟会并不是最糟糕的兄弟会。相信我，还有比它更糟糕的兄弟会。

我注意到：耶蒂的脸上没有了那种尴尬的神情。她的脸颊上长出了青春的绒毛。来到我们家的男人们无法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在欲望的驱使下千方百计地接近她。耶蒂躲进了厨房，似乎在寻求妈妈的庇护，可是即使在那儿他们也以种种借口跑

去亲近她。

“耶蒂，”爸爸会喊道，“出来露个面。”

耶蒂就像一个被男主人呼来喝去的女人一样跑了过来。

有时候，家里又充斥着那种欢快的绝望气氛时，爸爸就会揽住耶蒂说：“我们村里的姑娘就是这个样子。她们个个不都是这么漂亮吗。”

妈妈又一次无法控制她的窘迫，当她感到手足无措的时候，就会有一道厚重的皱纹鲜明地出现在面颊上。耶蒂坐在扶手椅中，明亮的眼中闪耀着那种受到抚爱的农村姑娘才会有的欣悦。

没有人再议论严肃的世界大事了。也没有人议论爸爸牵扯进的那桩官司了。人们只是边喝边笑，而这笑声，放声的大笑，让我产生了一种可疑的不适感。

每天晚上都是这样。陌生的男男女女。差不多都是只因为耶蒂而来。飘散在烟雾和酒精气味中的是针锋相对的话语。那个未婚夫，忘了他吧，这里比他好的有的是。耶蒂的不幸变成了奇特的狂欢节。她穿着妈妈的衣服，身上散发出科隆香水的味道。

当家里的狂欢者都走空后，妈妈坐在椅子上，摊开报纸，沉浸到报纸的内容中。

“你怎么不去睡觉？”我听到爸爸的声音。

“我要在这儿坐坐。”妈妈说。

耶蒂带来的影子正自由自在、不受控制地四处蔓延。音乐

声也从未停止。爸爸变了:他的额头上有一条神经在肆意地跳动抽搐。而我,仿佛已经从他的视线中消失了。

在一杯接一杯的咖啡之间,我记起:耶蒂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是多么朴实和单纯。仿佛她的到来只是为了带给我们那个被人遗忘的爸爸出生的村庄的清新气息。可是一切都颠倒过来了。所有人都对耶蒂很好心。我理解:这是一种奇特的好心,别有用心的好心。妈妈哭泣着,她的哭声像冷雨般钻入我的睡梦。

而耶蒂自己呢,她是否了解在她周围发生的事?她的词汇量没有增多。说话时依然是乡下口音,两手放在膝盖上,就像一个毫无心机的女人;尽管如此,那些夜晚却依然变成了盛典,轻快的音乐和缭绕的烟雾填满了客厅。他们会早早把我赶到床上,这种屈辱的驱逐让我几个小时都无法平静下来。

我们的财政状况恶化了。妈妈觉得不能再请客人来了。爸爸火冒三丈:“只要我还活着,我们家的大门就是为大家的幸福而敞开的。我活着不单单是为了自己。”

女婴生病了,家庭医生日夜照看着她。奇怪。耶蒂此时却对孩子的哭声不闻不问。妈妈不无勉强地照料着她。我在家里从未听到过那么怒气冲天的话语,划破阵阵笑声,犹如一群呱呱乱叫的乌鸦。

这阵可怕的狂风暴雨连续肆虐了好几天。那一道抽搐的神经没有离开过爸爸的额头,他被某种不属于自己的欢乐所俘获。妈妈忙于照顾康复中的女婴;而耶蒂端来咖啡的样子就像一个

妖娆的女明星。

一天晚上，妈妈闯了进来，怀里抱着女婴，她厉声叫道：我不允许再这样下去了。

“我活着不单单为了自己，”爸爸让她闭嘴。

“家里有孩子。只要家里还有孩子，我就不能允许这样。”

“可是我允许。”

“我要告诉大家，”妈妈怒吼着，为的是让所有人都听到，“我们的钱都花光了。我们靠欠债过日子。”

爸爸站起身，那种毫无掩饰的屈辱完全暴露在众人眼中。奇怪的是，没有一个人走过来告别或是安慰两句。人们穿上冬装，像逃离起火的房子似的夺门而去。

第二天耶蒂戴上那条乡下头巾，把女婴抱在怀里说，她要出去吹吹风，透透气。这天傍晚的天空很晴朗，天色微微带点浅红，就像她来的那天一样，只是天气更加寒冷了。谁都没有想到，她会一去不返。光线不停地变换，黑暗骤然降临。

爸爸很晚才从委员会开完会回来后，他直奔火车站。只迟到了几分钟时间火车已经出站了。耶蒂就是坐着这列火车走的。当他凌晨回到家里时，一句话也没有说，浑身散发出一股酒气，看上去筋疲力尽，脸色苍白。

他一整天都在昏睡。妈妈站在他睡床边，轻手轻脚，低三下四地叠好床单和毛巾。几个星期以来温暖着我们家的奶香味，现在飘散出苦涩的滋味。一朵橙色的云逗留在我们的窗户上，

一整天都没有离去。我不敢走进爸爸的房间。那里似乎坐着几位大夫。

第二天明朗的阳光侵入我们的房间。家具被剥夺了自己的影子。炉子里一条长长的木炭已经烧成了灰,让人无法呼吸。妈妈身上穿着绿色的睡袍,脸色苍白。爸爸站在窗前。

"我不是有意的,"妈妈说,努力使自己的声音穿透沉寂。爸爸转过头,用目光扫视了一遍房间。一会儿早晨的咖啡端来了。爸爸的目光没有离开窗户。妈妈缩着身子,双手握住咖啡杯。光线越来越强,锐利地扫荡着边边角角依然残留的阴影。那些角落白光光地暴露出来,如同一块块桀骜不驯裸露在外的皮肤。

那是些漫长的、明亮而空寥的夜晚。爸爸的嘴唇越咬越紧,就像被某种病痛所折磨。他越来越深地纠缠在那场官司中,直到难以自拔。对于耶蒂转瞬即逝的回忆在夜里化为某种让人惊恐的可感知的实体,仿佛她依然与她的影子一起坐在角落里。

妈妈徒劳地试图恢复以前餐桌上的那种宁静。所有的一切,甚至那些窗帘都在暗示着将有孤儿产生。意味深长而又未被说出的话语在空中弥漫,似乎在悄悄控诉。妈妈的脸上也感染了同样的病痛。一天晚上爸爸说:"你还想干什么,是你赶走了她。"妈妈哭泣着,爸爸没有走过去抚慰她。我知道,以前的一切永远也不会回来了,我的童年也一样。

黄色的渗漏印渍出现在天花板上,妈妈没有出去找工匠。

一股淡淡的霉变气味弥漫在我们的房间，让人透不过气来。妈妈不知为何总是带着恳求的语气说："饭准备好了。"可是爸爸却宁可吃三名治，这可以让他坐在那里粗鲁地三口两口匆匆吃完。

老话题又重新复苏了。耶蒂到来之前的话题。两封挂号信的到来提醒大家：外面的战斗还没有结束，尽管是爸爸要求赔偿对他的诽谤言论，可是似乎原告已变成了被告。或许是为了他的脸，他不刮胡子的面颊，从这间屋子跑到那间屋子，搜寻着文件。

房间里被翻了个空。阳光侵入屋内，似乎耶蒂将我们的影子和她自己一起带走了。爸爸站在后屋里一遍又一遍地研究他呈递的起诉书，就好像那不是他的起诉书，而是他无法赎清的罪状。

9

我们是在夜里意外地得知特蕾莎姨妈的死讯的，就像出于随时做好准备的老习惯，妈妈立刻开始整理那两个鲜艳的皮箱，可马上她又觉得没有这个必要了。从我们家到圣彼得修道院的这点距离并不需要换什么特别的衣服。“我们准备好了，”妈妈做着一种家常的手势说道，就像平日午后我们要出门去“玫瑰刺绣”咖啡馆时那样。“让我查一下火车时刻表，”爸爸说，震惊使他依然按部就班于那种注意实际的老习惯。噩耗是在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时刻传来的。毫不奇怪，我们的身体动作依然会由于惯性而运行。

最近几个星期，特蕾莎姨妈停止了来信。对她的回忆，那从远方遥控着我们的回忆，也逐渐消退了。我不再想她，只想到那些种植在修道院中的高大的白桦树。有时候我会想像，我依然站在走廊里，注视着一幅阴暗的画，画面中是一个粉色的婴儿在

黑浪中打转。可是特蕾莎我却再也没有看到。对她的记忆似乎已被我消耗殆尽。即使是此刻,噩耗传来,她那张年轻的面庞也无法闪现在我眼前。只有那些白桦树,似乎已成为了她的化身。

尽管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没有火车,可我们还是出发去了火车站。陪伴我们的还有雕塑家施塔克,爸爸年轻时的朋友。无情的,隐匿的灵此时也正折磨着艺术家施塔克,一位犹太母亲的儿子。他在各种奇奇怪怪的地方找寻着摆脱危难的庇护所,于是也来到了我们家。他身材高大,体格健壮,满脸胡须,好像是根硬骨头。不过说实话,只不过看上去如此罢了。这一年他四处游走,从这个拉比[①]到那个拉比,从这家犹太法庭到那家犹太法庭。拉比们并不欢迎他。他那副强壮的雅利安人的外表只会引起他们的怀疑。最后终于有一位拉比对他说,"都这种时候了,你干嘛要给自己找这样的麻烦?"他们用尽各种理由把他推来搡去,然而这样的推拒只能点燃他隐秘的欲望,回到他追寻的血统熔炉中,他敬爱的母亲的血统,他想要皈依她的信仰,更准确地说是她祖先的信仰。

爸爸不是一个慷慨大方的人,并没有给他好脸色,甚至还训斥了他一顿:"库尔特,这个时候你怎么还要找这种麻烦。相信我,犹太身份对你我都毫无意义。它根本就不存在。要不是还有反犹主义,它早已经消失了。"妈妈没有插话。

---

① 对犹太学者、教师的尊称,尤指从事法学者。

于是，就在每个人都忙于自己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得到了那个噩耗。这天夜里，我们家里也有些奇怪。仿佛屋子里下了一场浓雾。妈妈站在门口，衣着素朴，脚上穿着靴子。爸爸的注重实际与这一场合似乎并不合拍，仿佛是那种难堪的窘境敦促着他必须有所行动。只有艺术家施塔克，在这一刻似乎还能镇定自若，试图用他那双毛茸茸的大手来保护我们。

我们是步行到车站的。爸爸根本就没想到叫辆马车或是抄条近路。我们穿过整条哈布斯堡大街。妈妈走在我们前面。爸爸不知怎的说起了圣彼得庄园，他年轻时曾与一个开明贵族隐居在那里，那是个怪异的具有自由派倾向的人。在那里他第一次发现了奥地利山区景色的魅力。但是在他内心有什么东西使他无法沉浸在这静谧的壮观景色之中，那一定是当时已经侵蚀着他的犹太病菌。

关于特蕾莎我们只字未提，似乎她已不再属于这个时刻。最后还是艺术家施塔克鼓起勇气问道，特蕾莎是不是在修道院里住了好多年了。爸爸说，一开始她住在那儿的医院里，因为经常发作的抑郁症，后来时间长了，她对修道院的生活方式和晚上在那里举办的神学研究专题讨论产生了广泛的兴趣。

“那你们就?”施塔克迟疑地问道。

“她好像，很快乐。”爸爸说。

妈妈迈着稳稳的步子走在我们前面。大街上一个人也没有，只有秋天的潮气。我们走了好久，爸爸突然又开口了。他说

起艺术家必须有一双安详而不动声色的眼睛，少了它就不可能有伟大的艺术。

雾越来越浓，我们到达了火车站。已经过了午夜。那种湿漉漉的空虚感从每个角落里发散出来。两个年轻女子默默地倚靠在小吃店的柜台上。她们的脸上显出阴沉而呆滞的神情。爸爸走近关闭的售票窗口，当他确认售票窗口确实都关了的时候，冲我们转过身来说："我们得问问清楚，一定还有车的，这个地区可不缺旅客和货物。"

售票员的回答来得并不迟："没有车了。只有当地一列运牲口的货车会在凌晨时经过。"

"不要紧，"爸爸说，"我们要跟那群马呆在一块儿。我们可不怕畜生。"

从远处一个守卫那里传过来下面这样一句话："奥地利马的气味也要比犹太人的气味好。"

一时间鸦雀无声。妈妈颤抖的双手停止了抖动。艺术家施塔克一面竖起耳朵倾听，一面朝着发出声音的方向喊道："那个躲起来的男人，你在哪儿？你为什么不出来露个面？"

"别去惹他，"车站值班员说，"他是个凶恶的家伙。"

"我们，不管怎么说，"艺术家施塔克说，"还没有失去人性。我们准备进行斗争。"

"你跟他没什么可吵的，"值班员说，"别去理他。"

奇怪。我们似乎已经忘却了来这儿的目的了。时间已经过

了午夜，妈妈提议我们四处走走，也许可以去“玫瑰刺绣”喝杯咖啡。

艺术家施塔克说，他可正想干上一架呢，不过那家伙是个胆小鬼，躲在暗处不敢出来。施塔克饱满的声音给了我们安全感。

我们穿过街道，一下子置身于浓雾包围的旷野。艺术家施塔克把身子缩在大衣里。尽管我们已经走到“玫瑰刺绣”的门前，妈妈还在不停地想让我们相信，那里的咖啡既够味又新鲜，蛋糕也很新鲜，跟家里做的一样，这个时候你找不到比那儿更好的地方了。这不是她的声音，而是从别的日子里留下的声音。

“玫瑰刺绣”依然还开着。几张无精打采的面孔坐在木桌旁大口地喝着午夜的啤酒。没有人喝醉，只有一股浓重的啤酒味儿。

艺术家施塔克突然显出极为亢奋的样子，用或许与这一场合并不相称的大幅度动作向我们宣布：“各位，记在我的账上，记在一个杂种的账上。”

“这个奥地利杂烩汤卖给我多少钱？”爸爸问道。

“这一磅奥地利肉我免费奉送。”

“你马上就会对这笔买卖后悔的。”

爸爸和艺术家施塔克要了法国白兰地，妈妈和我喝着加奶的咖啡。女侍者抚弄着我的头说道：

“帅小子。没人在夜里带我去咖啡馆。没关系。这种生活你很快就不会觉得陌生了。”

“嗨，亲爱的，你第一次夜里出去是什么时候？”爸爸恶作剧般地冲着她说。

“很晚，我父母天生就是天主教徒。他们不让我跨出家门一步。”

“你听他们的话吗？”

“说实话，没听多久。”

艺术家施塔克没有插话，自顾自地啜饮着白兰地。突然，犹如童年清晰的记忆，我感觉到我们和艺术家施塔克之间一种温润的亲近感。仿佛他不是一个匆匆的过客，而是和我们相处多年的老友。

妈妈专注的目光一直注视着我们。我不知道她的眼睛里在说些什么。一道薄薄的、透明的，但却无法穿透的幕帘此刻横亘在我和她之间。她两手放在桌上，神情安详而坦然。

我不停地想着这个叫做施塔克的奇人，想到他怪异的人生沉浮和这些年来驱动着他的那种隐秘的激情；此刻他与我们坐在一起，去给特蕾莎姨妈奔丧。而他根本不认识特蕾莎姨妈。

“为什么这种时候你还要给自己找这样的麻烦？”我似乎又听到爸爸前些天的声音，“真让我无法理解，无法理解。”艺术家施塔克只是承受着责问，默不作声。而爸爸身上，有另一个恶魔，可怕的恶魔：他的写作，正压迫着他。最近一年来，杂志上不再把他列入奥地利作家的行列。以前只是暗示性地提及他的犹太身份。现在却是明确地说他的每一句句子里都散布着外来的

因子和颓废的病菌。每一个健康人都应该禁止读他的作品。从前爸爸曾宣称:言论自由是第一位的。没有言论自由也就没有了思想。有多少律师是靠他的控告,审判和上诉才有口饭吃。现在已经没有更多的钱来供养他们了。现在爸爸只能咬咬牙怪自己不好,怪自己的作品因为没有学学那些法国人而毫无目标。只有他们懂得那种适度的、不会使人激动的平静,没有了这种平静,所有的作品就成了道德说教或是没有根基的奇谈怪论。就此而言,他准备承认,无论是他还是瓦色尔曼①还是茨威格还是施尼策尔②,都没有在艺术上达到真正的水准。奇怪,现在他已经没有钱去控告那些报纸和杂志的诽谤了——他只是坐在那里自怨自艾。那些自责的话语听上去颇为苦涩。

我听到艺术家施塔克说:“在维也纳走街串巷的犹太小贩,在我看来比那些奥地利军校生更入眼。”

“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爸爸说。

“不对。因为你不了解那些奥地利人。我是在军队的寄宿学校里长大的。”

“可你呢,我的朋友,你不了解那些犹太人。要是你了解那些犹太人,你是不会高兴加入他们的行列的。他们从骨子里就

① J·瓦色尔曼(1873—1934),德国小说家,著有长篇小说《卡斯帕尔·豪泽尔》等。

② A·施尼策尔(1862—1931),奥地利剧作家、小说家,主要作品有《阿纳托尔》和《轮舞》等。

是些小资产阶级。他们的信仰也是小资产阶级的。”

“那么奥地利人呢。奥地利人有什么特性？他们让我觉得恶心。”

正当他们的争吵趋于激烈的时候，传来了噩耗，特蕾莎姨妈，我最漂亮的姨妈，在圣彼得去世了。爸爸做了个很奇怪的鬼脸，站起身来像是要去关上敞开的前窗。妈妈跌坐在椅子里，接着立刻就开始整理行囊。

我从沉思中醒过神来后看到：坐在咖啡馆里的客人这时已经走光了。艺术家施塔克因为喝了那一多半的白兰地而面色苍白。爸爸却是脸色通红，仿佛这不是死亡的门槛而是充满绝望的欢歌前奏。女侍者靠近我身旁问道：“你不累吗，亲爱的？”

“不累。”

“瞧你有多好，你爸爸妈妈还带你出来开开心。将来有一天你还会记得我吗？”

“当然会记得。”

“我的名字叫爱尔莎。我肯定还会继续在这儿干下去。你爸爸妈妈都是非常讨人喜欢的人。”

奇怪。谁也没有来打断这段对话。爸爸以一种心满意足的神情看着我，仿佛我已经有能力驾驭这样的谈话而不会陷入尴尬的境地。

妈妈站起来说道：“四点了。”让我惊讶的是，妈妈在这一时刻的举止依然与实际那么吻合。

浓雾已经弥漫到大街上和临近的地方。零星的亮光在黑暗中摸索。妈妈拉着我们走上一条通向车站方向的窄路。与此同时我回想起那个漫长夜晚的奔波，就是我们把特蕾莎姨妈送到疗养院去的那个夜晚，那时还是夏天，晴朗的、没有一丝云彩的夏天。

那家小吃店这时已经空无一人。两扇肮脏的窗户关着，可以看到里面一片狼藉：杯盘和酒瓶堆积在一起。

“火车在哪儿呐？”艺术家施塔克用饱满的声音嚷道。白兰地似乎让他的声音充满了力度。

没有回应。有一种隐隐约约的笑意从妈妈的脸上掠过。仿佛她不是我的妈妈，而是那些辛苦操劳的女人之一，她们要为众多的孩子辛劳，身体已经习惯了疼痛，新的疼痛只会让她的嘴角略微歪斜一下而已。

“列车员，火车在哪儿呐？”施塔克又大吼了一声。

列车员从他的观察岗上探出头来说：“你们怎么搞的，这么晚才来。”

“有人告诉我们说，货运列车五点钟会经过这里，是准备来卸货还是装货啊？”

“它是来装货的，不装人。”

艺术家施塔克奇特的信心让我们打起了精神。如果不是妈妈的脸色，这几乎就成了一次夜晚的冒险。

五点钟火车来了。施塔克爬上机车对司机说，我们的妹妹，

最亲爱的小妹妹，特蕾莎姨妈，今天夜里在圣彼得修道院去世了。他说话声音很高，每个字都发出重音，以便盖过蒸汽机车的轰鸣声。从下面听上去就像在宣读一份强硬的声明。机车司机，身上被煤烟熏得黑黑的，疲惫之极，根本没有留意听他在说些什么，只说了一句："由你负责。"

"上车，"施塔克下令。

我们正要爬上木板上车，一个守卫走过来拦住了我们。开始施塔克还试图耐心地、几乎是低声下气地向他解释，说这家人要去奔丧，家里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最小最受人疼爱的女儿在圣彼得去世了。就在几个小时前刚刚得到这个噩耗。

一番话似乎打动了这个男人的心。可是突然间，就像是存心要跟我们作对似的，出现了另一名守卫，他打着哈欠宣称，别想再骗得了他，他很清楚这些人：他们是犹太人。他对我们的存在视而不见，只顾和门口的那个守卫说着话。起初神情颇为尴尬的那个门口守卫只得屈从于他的意见说，他不会允许我们上车。刚才一直跃跃欲试但又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施塔克把身体靠近那两个守卫，仿佛是要向他们展示一下魁梧的身躯。那两个人也毫不退让地站着。

"上车，"施塔克命令道。旁边的那个守卫，似乎没有料到会遇到这样的反应，开始对着列车员大声叫了起来："犹太人未经允许上车了！"

"不要说犹太人，就说有人要上车，"施塔克轻轻说道。他

的话看来点燃了那个守卫的怒火。那家伙脱下上衣说："我要为我的名誉而战。"施塔克从口袋里伸出右手，几乎是以优雅地姿势抬起手臂，一拳打在那人的脸上，立刻又以一种炫耀般的平静语调说道："这一拳是奥地利的，纯奥地利的。准确地说，这是在以伦茨将军命名的军校里学到手的。"

结局是明摆着的：旁边的那个守卫趴在地板上，门口的守卫步步后退，在观察岗上的列车员冲着他们喊："你们干吗要去惹那些无辜的人？"

"我没弄错。他们是犹太人。我可以当着所有的圣徒起誓，"旁边的守卫尖声叫道。机车已经喷出了一股蒸汽。我们凭着一种直觉上了车，有某种力量相伴，正义终将克服愚蠢。

这次旅行的目的似乎已经被遗忘了。施塔克插科打诨般地讲起了几段小插曲，都是关于那个备受赞誉的以伦茨将军的名字命名的军事学校的，那里将一大批瘦弱的小生灵锻造成一群肌肉发达但头脑中却没有自己意志的身体。他在那里度过了整整四年。要不是他的神经一刻也得不到安宁，目睹了那么多令人作呕的场面，他现在一定是在享有盛誉的 52 营服役，表现突出，升官晋级。

艺术家施塔克在我眼中愈加神秘。货运列车缓缓前行。原野上的冷风侵入我们的衣服。妈妈不知怎的觉得有必要抱歉地说道，她的家庭中的确有背教者，而且是一些大名鼎鼎的背教者，不过他们，毕竟，不是出于信仰才背教的，只是迫于时代环境

的压力。

我知道，这些事实并不确切。我没有吭声，爸爸也没有纠正她。我感觉到那种痛苦已经超出了她所能够承受的程度。黎明前沉重的黑暗从周围挤压过来。我们沉入了那一片湿漉漉的黑暗之中。

大约一小时后我们已经站在古色古香、考究得有些夸张的圣彼得车站的站台上了。几个搬运工把行李包从车厢里拖出来，一辆没有套马的运货马车，车梁耷拉着，无精打采地停在车站门口。几抹浅红色的纹理出现在地平线上。

圣彼得的大门紧锁着，门上有着雕刻的金属格栅和泛黄的攀缘植物。夜晚的黑暗依然附着在古老建筑的墙上。空气中有着拂晓前广袤的宁静。

渐亮的晨光和孤独的钟声震撼着这种宁静。这样傻呆呆地站在紧锁的大门外，并没有燃起我们心头的怒火。一夜的劳顿使我们筋疲力尽。

“七点以前不会开门的，”妈妈说。似乎她对这些墙上隐秘的入口都了然于心。

“为什么?”施塔克兴致勃勃地问道。

“他们只有在祈祷完了以后才会开门，外人会让祈祷者冥想时分心。”

不知道为什么，看来妈妈对于修道院的生活方式，和大量隐秘的细节都十分了解。妈妈热情地说着这些事情，仿佛特蕾莎

生命最后阶段的思想附到了她的身上。爸爸试图缓解这等待中的无聊，说："必须承认，他们确实表现出几分真正的宗教虔诚。"这番话顿时让艺术家施塔克从疲劳中恢复过来，他说："当然了，对那些不了解他们的人来说。"

七点钟大门打开了。妈妈要求见维多利亚嬷嬷。看门的去叫她了。

那些覆盖着壁画和塑像的高墙，以其淡淡的暗影一下子包围了我们。即使在这个不幸的时刻，我们也知道，这里没有修女的陪伴是不能进去的。

维多利亚嬷嬷在一群修女的陪同下出来了，立刻就有一种宁静围绕在妈妈身边，宁静中又不缺那些细微的礼节。看来这就是哀悼者到来时他们通常的表现。妈妈没有问在哪里或是该做什么之类的问题。仿佛哀悼仪式已经进入高潮。

很快我们就穿过了修道院的院子，漫步在忽明忽暗的走廊上。不是这里的死者而是有着催眠作用的宁静拖动着我们的双腿。我们来到了灵堂，进入狭窄的凹室，里面点满了焚香并装饰着许多花环，每个人的步子都是笔直的，没有一个人会走偏。棺材旁边坐着两个年迈的修女。她们坐在位子上一动不动。

特蕾莎在棺材中的脸庞上抹了一层栩栩如生的粉色胭脂，辫子搭在脖子上。她纯真而青春的肌体没有半点瑕疵。她的手指被精心地修剪过，双手合在胸前。宁静停留在她那双闭阖的眼睛上。妈妈靠近棺材，微微倾下头，仿佛注视着摇篮中的

婴儿。

正当我们还在疑惑她们要怎么做时，坐着的修女开始唱起了经文，她们念念有辞，字字重音，哀悼的经文听上去只有一个音调。妈妈的脸上没有哭出来，只是嘴角歪了一歪，就像嘴里尝到了酸味。

当仪式结束的时候，妈妈急速地、几乎可以说冷漠地转过身体，背对着棺材，抬眼看着维多利亚嬷嬷，似乎她是一个前来送葬的人。

“她去世的时候很平静，”维多利亚嬷嬷说。

“太突然了。”

“没有任何并发的症状。”

“感谢上帝。”妈妈说。

再也没有什么尴尬的表情和刺耳的声音，而只是让人感到仪式进行得很顺利，所有的细节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仪式就这样结束了，一种满意的感觉流露在所有人包括我们的脸上。我们回到门口。妈妈悄声问维多利亚嬷嬷，“是不是不需要我们再帮什么忙了？”听到妈妈的问话，嬷嬷的脸上现出释然的神情。“一切都安排好了。”她说。

“我们得走了，”爸爸说。似乎在其他地方还有什么别的要紧事等着我们去处理。

“我就来，”妈妈说。

“那就请你们自便吧，”维多利亚嬷嬷小心翼翼地说。

我想起了卡尔舅舅，最近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一个受人尊敬的文学奖项，当他指示要把自己的身体献给科学研究之用时，全家人都被他吓了一大跳。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最后遗愿未能得到满足，他的遗体在火葬场火化了；第二天在他的骨灰坛边举行了一个简朴的仪式，有诗歌和音乐。

我们没有询问葬礼何时何地举行就离开了。爸爸和艺术家施塔克紧紧抓着妈妈的胳膊，看上去妈妈并不需要这样的搀扶。

回家的行程同样奇怪。在车站，艺术家施塔克喝了几小杯满满的白兰地，看来是喝过了量，很快他就开始咿咿呀呀地学起了奥地利的土话和在军事寄宿学校里使用的切口。起初爸爸对他的信口开河还挺喜欢，后来又开始担心他口无遮拦引起人们的反感。妈妈也苦口婆心地使劲劝他，不要在公众场合出洋相。准时到来的快车把我们从困境中解救了出来。

一路上施塔克都对奥地利军队骂个不停。他脸色苍白，但眉宇间却是一副坚定的神情，充斥着一股奇怪的力量。爸爸一路上阻止了好几次争执，他说酒醉的人不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跟他吵也没有用。施塔克醉了，却不肯承认。

我们一回到家妈妈就赶紧忙着准备餐桌。施塔克的醉意消退了，尽管如此，爸爸还是认为，应该给他灌上一杯浓咖啡。妈妈把这当成一项重要的使命，她准备着这一切，各种动作既显得有备而来，又透出一种仪式般的庄重。午餐时妈妈端出了香肠和鸡蛋。

施塔克停止了对奥地利军队的咒骂。他讲起了关于他父亲的笑话，一个在奥地利军队里当了多年的下级军官，当他退役后，仍然习惯于自言自语地下命令，好像他的部队依然站在他面前。

下午他出门去找韦勒拉比了。爸爸认为他回归犹太教的努力是绝对的愚蠢，不过这次并没有去惹恼他。

到了晚上妈妈还是没有从她僵硬的动作中解脱出来。爸爸坐在客厅里翻看着一本书。家里完全陷入了沉寂。终于，妈妈问道，“要不要准备晚餐？”她只说了这几个字，除此之外什么也没说。

晚餐后妈妈脱掉鞋子坐到了地板上。脸上严肃的表情似乎开始舒展。爸爸试图劝说她不要这样。可是妈妈说，她这样坐在地板上很好。

当时我的脑子里正被三年级的代数考试弄得焦头烂额。考试很难，我不知道怎么才能从考试中安然脱身。爸爸竭尽全力想和我一起解开几道练习题。最后他撕掉了草稿纸，咒骂这种抽象的玩意儿毫无用处。妈妈坐在地板上，用探询的目光追踪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爸爸终于在椅子上睡着了。妈妈闭上眼睛，把头倚靠在柱子上。他们睡得很轻，就像是蜷缩在一处阴凉的土丘旁。我拉来两条毯子盖在他们身上。他们在睡梦中翱翔，两个人都沉沉地睡去，而我就像一下子被放逐到了一片被遗弃的海滩上。

第二天，家里的每个角落都被笼罩在特蕾莎之死所带来的阴影中，妈妈没有从地板上起来，爸爸弯下膝盖，递给她一杯咖啡。我留意到，一夜之间她的额头上长出了黄斑。

当我从学校放学回到家，艺术家施塔克已经坐在他常坐的扶手椅上了，他生气勃勃，略显醉态，他快活地、滔滔不绝地讲述着那个尊贵的男人，拉比韦勒，他跟着他学习了《圣经·旧约》和《米德拉西》①。爸爸并未被他的热情所触动，只是不经意地说了一句，这剂药水无法激活他这把干枯的老骨头。艺术家施塔克显然没听出爸爸话中有话，还在不停地说着，热情益发高涨。

我们的哀痛并没有终结。爸爸和艺术家施塔克之间的小小争执愈发激烈了。一天晚上，我正不屈不挠地啃着拉丁语课本，妈妈在衣柜旁抖落着衣服里的卫生球，我听到爸爸雷鸣般的怒吼："没人能够让这些犹太鬼魂复活，他们注定要灭绝。"那时所有的一切都让能人感觉到特蕾莎之死所带来的影响，甚至从家里的日常器具上也能感觉到。妈妈的一举一动都极为小心翼翼，似乎有意识地要达到某种目的，只有她自己清楚的目的。妈妈的举止让我觉得有些惊骇。

一天晚上艺术家施塔克出现了，高大、消瘦，他给我们带来

① 《米德拉西》：希伯来语音译，意为"解释、阐述"，是犹太教讲解《圣经》的布道书，是犹太人家庭教育的重要读物。

消息说，附近施密登的拉比法庭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审查艺术家施塔克的意向和认知，得出的结论认为，现在应准许他去维也纳的医院并在那里割去包皮。作为证明，他从胸前的口袋中抽出一张小纸片，上面盖着一个方形的印章。

爸爸并不高兴。裹挟着我们的哀伤似乎把我们裹挟得更紧了。施塔克徒劳地试图在我们身上唤起他先前的自信。冰冷的哀伤静静缠绕着我们，悲伤凝结在妈妈的眼中。

我们长时间地陷入了沉寂。最终还是爸爸的哀伤打破了沉寂，他讲述着无法医治的文学伤痛。又是那些法国人。只有那些缺乏热情的法国艺术家，司汤达，福楼拜，只有他们才是艺术家。我们就只会写写打油诗和通俗小说。爸爸似乎感觉到，痛楚即将淹没他的话语，他紧抱着一瓶白兰地，就像焦虑不安时需要抱住某个支撑物一样；他痛苦的内心因极度的怜悯而激动，他大声地嚷道，“你干嘛，库尔特，干嘛去招惹这种麻烦。你生来就是个自由人。甚至你身体的所有姿势都表明你是自由的，你的艺术遗产表明你是自由的。你的父亲，生下来就是一个奥地利人，给你留下了地产、健康和一双摆弄石头的巧手，可你却一步一步地用这样的自由和健康去换取这种陈腐而病态的信仰。你的自由，你的身体，多么可惜，上帝啊，别再让他犯任何愚蠢的错误了。把这些糟透了的想法从你的脑袋里清除出去。相信我，对我来说，你比我的亲兄弟还要亲。”

妈妈惊恐地从位子上站起来，想要阻止他那些淌血的语言。

可是爸爸借着酒劲就是不肯停下来："上帝可怜可怜你这双巧手吧，一双懂得摆弄花岗石和大理石的巧手。为什么那些拉比非要把这样的伤残强加到你漂亮的身体上?"

施塔克并没有去终止这滔滔不绝的一席话。他的上嘴唇抖动着，咬着舌头，嘴里发出含混不清的声音。爸爸的表情中有一种力量，怪异的力量。施塔克没有回应，两眼渐渐地盯住爸爸酒醉后舞动的双手，他的目光泛绿，却没有丝毫痛苦的表情，似乎他身上已经形成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理解力。

第二天七点钟，我们站在车站上为他送行。下起了大雨，车站门口聚集着一群群的士兵、卡车和载重的马匹。爸爸的手一直没有松开艺术家施塔克的手臂，他一直在埋怨我们没有带上雨衣。就在这叫人恼火的嘀咕声中，我们与施塔克道了别。

我们湿淋淋地回到家中。爸爸的样子怪怪的，光着脚，脱掉了上衣，咒骂着该死的列车时刻表。妈妈也光着脚站在阴冷的地板上，她的脚趾头都冻红了。爸爸突然敲着自己的脑袋说道："我怎么会让他走? 这真是罪过，我一想到他们会怎么对待他，就觉得身上在发抖。"爸爸的这些话已经显得软弱无力，只剩下毫无掩饰的痛苦。

10

施塔克的离去并没有给我们带来安宁。爸爸就像一头被困在笼中的野兽，从一个房间游荡到另一个房间，嘴里不停地嘀咕着："我怎么会让他走呢？"愤怒与裹挟着我们的哀痛混合在一起。从黎明到黄昏，爸爸一直在给他的老出版商们写各种信件、备忘录、快信和挂号信，他们不再给他寄支票来了。既然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受累给他回信，爸爸只好在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里站在窗前，绞尽脑汁地筹划着，牙齿咬得嘎吱做响，他伸出拳头跃跃欲试，脸上显出受辱后扭曲的表情。

风雨平静下来之后，我们出门去看望施塔克。施塔克走后的第二天爸爸就想要去看他，阻止他的企图，还打算通知他的家人，叫他们插手阻止他的疯狂行为。然而特蕾莎的死依然郁结在每个人的心头。妈妈坐在地板上，不把饭菜送到她的嘴边她不会站起来，爸爸居高临下地站在她身旁，半是威胁半是恳求地

说，“站起来。”

施塔克刚一离开，倾盆大雨就从天而降。妈妈不哭了。她陷入了自闭状态。大家什么话也不说，只要一说就会说起施塔克和那种要求从男人身体上割下一小块皮肤的野蛮风俗。

现在风停了，我们出发去看望施塔克。爸爸穿着户外运动的服装，妈妈围上了一条臃肿的羊毛围巾；爸爸就是穿着这样的衣服去跟诽谤他的人打官司的。我们急急赶路，中午时分已经站在了那所房子的门前。

这幢房子的外观表明从前它也曾见证过美好的时光。此刻，有几个身上盖着毛毯的老人坐在门廊前，把冷冷的阳光吸入他们的骨头中。对于爸爸的询问，他们证实道，这里就是名为保罗·古茨曼的救济院。进门处的楼梯，以及入口处本身看上去都是一副无人管理、寒气逼人的破败相。我们是在走廊里找到施塔克的，他和老人们在一起。一股来苏水混杂着药品的气味充斥着阴暗的空间，让人窒息。两个劲头十足的护士正在高声地谈笑。爸爸的脸突然变得扭曲，显出畏缩的表情。妈妈也缩在他身旁，仿佛置身于某个敬神的场所。壁架上燃着几支蜡烛，看上去的确像是敬神的蜡烛。

施塔克高兴地向我们伸出双手。只有从近处我们才发现他的变化。他的脸上布满灰白的胡须，头顶上戴着一顶破旧的犹太小帽，胸前披着一条小小的祷巾。只是他的眼里还闪耀着令人熟悉的光芒。爸爸大吃了一惊，他惊讶地说道：“我不明白。”

他扭头望着这个阴暗的空间，似乎想要在那里与罪人的目光相遇。

这个地方充斥着淡淡的灰暗色调。几个老人躺在床上，还有几个人凑在灯下玩牌。爸爸的目光似乎伤害了他们，他们纷纷从座位上退避开来。

这一切很容易就过去了，施塔克以抱歉的口吻说。剃去头发的脑袋和破旧的犹太小帽使他看上去就像一名被关押的政治犯。

“这就是你要来的地方，”爸爸急不择言地说道。施塔克似乎觉察到爸爸强忍着针对他的怒气，有意把声音放柔和了说道：“这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糟糕，这里有不少虔诚的人。”爸爸似乎意识到一切已无可挽回，于是说道：“我料到会是这样。”

妈妈坐在紧邻着施塔克床位的一张空床上，目光一刻也没有离开过那几支蜡烛。我们的到来似乎造成了某种效果。一个异族女人冲着走廊的另一头喊道，“是来看施塔克的。”听到这声通报后传来了一阵年轻人的笑声，笑声碎裂开来，变成了一块块带着嘲讽的细小碎片。

正当我们有些不知所措的时候，一个穿着条纹商务西服的老人走近床边，朝着爸爸鞠了个躬，显出一种老派的礼节。“请原谅，”那人请求道，“冒昧地打扰您，但这是出于必要，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没有什么不光彩的。不能这样。我在这里是违背我的意愿的。”男人开始用一种不乏戏剧化的语调说道。

“怎么回事?”爸爸诧异地问道。

“我儿子借口说这里有犹太气氛,就把我带到这里来了。请你看看吧,我的先生,这里的犹太气氛倒确实是很浓,从各方面来说都是:肮脏不堪,还有生意人的贪污腐败。独独缺乏的就是护理。医生一星期只来一次,有时候连一次也不来。护士们只管忙她们自己的事,如果客气一点地说。”

“为什么不离开这儿?”

“我的自由被剥夺了。我的儿子不愿意把自由还给我。自从我儿子剥夺了我的自由,我就无法离开这里了。”

“他这么做是什么道理?”

“道理我也弄不明白。是要惩罚我,如果让我猜的话。”

“就找不到更合适的地方了吗?”

“我想,有比这里更好的地方,可是我儿子出于对父亲的痛恨,硬要这样安排。他想尽一切办法把我留在这里,这里而不是其他任何地方。”

“我能帮上什么忙?”

“我不知道。我曾是个商人,富有的商人。在商人和顾客圈子里很有人缘。我对自己从来没有什么太多的要求,说真的,所有与犹太人有关的接触我都远远避开。我从来都对他们不感兴趣。”

“你儿子是虔诚的犹太教徒吗?”

“您怎么会这么想。他娶了个异族女人。”

“我不明白。”爸爸摊开双手说道。

“连我都不明白。除非他希望看到自己的父亲躺在犹太救济院里了却余生。”

那人挺了挺身子,没有再说一声就朝着前门方向走去。但立刻又折回来说道,“请原谅我,不该用我的事儿打扰您。请原谅我。痛苦有时候会让人忘乎所以。”

微弱的光线透过顶窗的过滤,反显明亮,如同探照灯光一般照亮了密集地靠墙排成两行的床铺。施塔克那张饱满而须发浓密的脸庞已荡然无存,只留下皮肤上的白斑、几处微红的粉刺和一粒淡淡的雀斑分布在额头上。爸爸两手紧紧抓着拱形的床栏,眼睛不停地随着走廊上的一道道光柱扫来扫去。

“那人说得对,”传来一个声音,“这儿的护理无论怎么批评都不过分。我们也是被骗了,跟我们许诺时说得天花乱坠,把我们哄得团团转,可现在甚至连午饭时的汤都喝不上。”

“这里谁负责?”爸爸大声咆哮着。

“是管理员,”从里头传出一个声音。

“这里没有大夫吗?”

“只是偶尔来一次,但也不固定。”

“我要见负责人,”爸爸说着就向昏暗的走廊拐角处走去。

光线重又黯淡下来。蜡烛在墙上映出一个个昏黄的光圈。妈妈不知怎么问起施塔克他是否需要什么。“这里什么都有。我正学着用我的一双新腿走路。我已经加入了十人祈祷组,上

升到读《托拉》[1]的程度，晚上还有《圣经》课。”妈妈虔敬地点了点头。

这里看不到一个美丽的身影，或是任何可以被解释具有宗教意图的表示。所有的一切都隐隐透出玩世不恭、疑虑重重和某种介于快乐和忧伤之间的感觉。盘腿坐在床上玩牌的那些人此刻呷着小杯的咖啡，用听上去似乎对神明不敬的语言互相打着趣。

妈妈还在费力地没话找话，传来了爸爸雷鸣般的声音："这儿的负责人在哪儿，他在哪儿?"

那雷鸣声由于没有得到回答而依然悬浮在空中。几扇前窗减弱了光照，浓密的黑暗从天花板上降落下来，壁架上的烛光延伸到角落里。坐在床上的人谁都没有动，一副牌局激战正酣。

“这里的负责人在哪儿，我在问呐。”又传来爸爸雷鸣般的声音。

“他还在找他，”一个老头边说边把一张牌甩到床单上。

“负责人要是还不立刻出来，我就要向卫生部投诉。这是一起公共丑闻。”

威胁并没有起到作用。在门口的亮光下，爸爸穿着紧身运动装的样子显得有些可笑。他朝着床边那些玩牌的人走去。那些人看了他一眼说："还没找到他?"

---

① 指《摩西五经》，《旧约》的首五卷。

“没有。”

“他肯定会来的。有什么可着急的。”

“这儿没有办公室吗?”

“我想有的,可是你问办公室干嘛,我的先生。”

“我想见见负责人。”

“别着急,他会来的。就算他拖拖拉拉,也还是会来的。”

“这里是怎么回事?”爸爸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

“他问,这里是怎么回事?”那家伙扭头对他的同伴说。

“犹太救济院,救济院。您对这样的机构一无所知吗?这是一家有着很深资历的机构。难道在奥地利没人知道这事儿吗。”

“那么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跟先生说说我们在这儿干什么。”

那个同伴正专注于手中的牌局,头也不抬地说道:“在这儿干什么。在这儿干什么。在这儿玩玩纸牌呗。这对谁都没什么坏处,对我们也是。”

这几句话在那些人当中传来传去,他们矫揉造作地传递着这些温和的话语,却流露出天生的邪恶语气,正在这时,一个高个子男人出现在前门口,一身黑衣,样子就像一个骄傲的穷人。

“瞧那就是他,你不是要跟他谈谈吗?”那家伙说着又把目光盯在纸牌上,再也不愿抬眼,那样子就好像碰上了一个讨厌鬼。

爸爸毫不迟疑就朝门口走去，他的急切与其说显示出威严，还不如说暴露出不确信的心态，爸爸对着那男人说："你就是负责此地的护理员吗？"

"您找谁？"高个子男人似乎被昏暗的光线迷了眼。

"我找负责人。"

"我就是，"男人说。

"我要告诉您，这是一起公共丑闻。这里是牲口棚而不是公共机构。我将要向卫生部投诉。"

"你干嘛生气？"那男人平静地说。

"就因为你在这里的职责。"

那老头张大双眼，平静的目光中没有任何不快，只有宽阔的视野，他用目光扫视着门廊，立刻就使床位间那些悄悄进行的小动作停止下来。

"你想从拉比那儿得到什么？他什么也不欠你的，"一个玩纸牌的人冲着爸爸说道，那架势就像面对一个凶恶的暴徒。

"我要求得到解释。"

"你是什么人，也许该自我介绍一下？"一个玩牌的家伙咋咋呼呼地打断了他。

"奥地利公民。难道这还不够吗？"

年迈的拉比那宽广的目光此时将门口所有在场的人都环视了一遍，最后他转向爸爸，好像是在说："你为什么要用如此粗暴的方式跟我们捣蛋？"

“你们对这个人做了什么?”爸爸用手指着施塔克反唇相讥道,他发出一种怪异的,舞台般夸张的声音,凶恶的声音。

“别去打扰拉比,别折磨他,”从里面传来一个声音。

“我对你们中的任何人都没有兴趣。看看你们是怎么对待这位大艺术家的,这位伟大的石雕艺术家,双手是由无价的纯金制成的艺术家。”

“放过拉比吧,他对这个人什么也没有做过。”

“我不会放过他。”

最后一句话点燃了火焰。从屋内最黑暗的部位像蜂群一般冒出一群人来,这些人瘦骨嶙峋,摩拳擦掌,与其说他们的可怕来自其力量,不如说来自愤怒,他们开始推推搡搡要把爸爸推出门外。

爸爸伸出双手紧紧地抓住墙壁。他们围着他站成一圈,仿佛一堵黑色的城墙,嘴里还发出低吟般的声音:“出去!”

“我们是犹太人,”拉比试图阻止他们。看来,他对他们具有某种控制力,但并非绝对的控制力。他们没有松手,而是协力把爸爸推到了门口。

“我的主啊,”妈妈喊道,“在这个神圣的地方还有人打人。”

爸爸的愤怒已经越过了可以控制的范围,他大声嚷道:“我不想要任何东西。我只想要艺术家施塔克,是你们用魔咒迷惑了他。我只在乎他。我对你们这些人没有兴趣。”

“闭嘴。”

“不害臊。”

“被同化的犹太人。”

施塔克从床上站起来，起身的动作证明他依然保持着运动员般行动敏捷的习惯，他握住爸爸的手说：“这个人是有名的作家。是最有名的作家之一。”

“他为什么侮辱拉比，就让他侮辱我们好了。可以有充分的理由侮辱我们，但是不能侮辱拉比。”

“他不是故意的，”施塔克尽力护着爸爸。

“如果是这样，他应该请求原谅。向拉比请求原谅。他不必向我们请求原谅，对我们来说这已经于事无补。可是拉比不一样。”

“也不必向我请求原谅，”拉比挥挥手表示算了。

“可是我们不能就这样算了。”有股力量就要冲出他们瘦削的身体，他们的骨头吱嘎作响，眼看就要蜂拥过来对爸爸进行审判。

“我不会为我没有犯下的罪请求原谅，”爸爸固执地说。

“你侮辱了拉比，”一个穿着条纹睡衣的瘦老头也顽固地坚持着。

“这侮辱会让你永远也得不到安宁。”

“我对你们遭人憎恶毫不奇怪，”爸爸冲着他们吼道。

“向拉比请求原谅。”

“没有必要向我请求原谅，让这个人平静下来吧，”拉比说

完转身面朝着走廊。那一圈不友好的人群似乎一下子就分崩离析了。那些人回到他们阴暗的床铺上。拉比把长长的双手伸向烟雾弥漫的空间,仿佛在尽力抓住一个看不见的身体。"没什么可说的。你只是在徒劳地浪费词藻而已,"那个穿着条纹睡衣的老头说道。壁架上的蜡烛升腾起一股浓烟。爸爸屈辱地简直要把脸埋到地板上。施塔克试图给他鼓劲,可是爸爸被他的痛楚缠绕着,一言不发。我们告辞的时候爸爸也没有说一声再见。施塔克送我们到门口。犹太小帽和那条小祷巾使他看上去就像一个身材高大却因不堪工作重负而压弯了腰的商人。

"给点施舍吧,"一个男人冲着妈妈说。妈妈递给他一张钞票,他吻了吻妈妈的手并祝福她。爸爸的双手,屈指可数的几个小时前还是活力十足的双手,此时无力地垂落下来。那个乞丐又盯上了我,问道:

"你知道《托拉》吗,小孩?"

"不知道。"

"可惜,"那乞丐说道。我不知道这是遗憾还是嘲弄。乞丐的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

一连好几个小时,我们在这座小城阴暗的巷子里迷失了方向。我们喝了咖啡,吃了三明治。最后我们终于坐在一家人满为患的小酒馆里,爸爸喝着啤酒。爸爸说:"啤酒能让我精神振作起来。"他用这样一种口吻说到自己让我感到很诧异。

提前到来的黑暗降临到家家户户的围栏上,窗户里的灯都

点亮了。有一处长长的影子，那是钟楼的影子，降落在铺筑过的街道上，又被这早来的黑暗所吞没。

"你看见了吗?"爸爸突然问道。

"什么?"

"他们就是那样。人们憎恨他们一点儿也没什么奇怪的。"

我们又在空旷的街道上迷了路，走在越积越厚的黑暗之中。爸爸的脸没有刮过——就像一个每天靠做工养家糊口的工人，经过一天的劳累之后踏上了回家的路。

后来在火车上，他也没有停止对犹太人的咒骂，说他们是在奥地利领土上东躲西窜的老鼠，说实话，真是无处不在。妈妈一直在试图让他安静下来。她的温情只是越发激起了他的怒火。施塔克在他眼中也不再是无辜的了。跑到这么一个兽穴中去的人，也不会比他们好多少。

一连好多天爸爸都处于一种忧郁状态。脸上布满了黄斑，嘴唇不停地颤抖。妈妈出门去探望那些被关在收容所里的病人和遭遇不幸的人，从中寻求慰藉。

爸爸从他的忧郁中振作起来后，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停地写，晚上他就读特蕾莎的来信。清澈晓畅的描述似乎让她又复活了。爸爸认为应该把这些信抄录下来并出版，作为真正的宗教感情的见证。

11

秋天来了,爸爸决定对渐渐包围我们的敌意做一个了结。当时我们已经是处境孤立,濒临破产,在这个阴郁的季节里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了。我依然去学校上学,准备功课,参加考试;可是我们周围的一切已经让我们产生了困惑的感觉,有夹杂着欢快的绝望情绪,也有末日来临时的痛苦滋味;还有我的功课,那些练习本和课本,成了渐渐包围我们的孤独感中的些许疯狂。青年男女在我们家旁边的俱乐部里一直闹腾到深夜。黎明时他们跑来敲打我们家的大门,嘴里喊着:“犹太人!”

这座小城,从前只懂得温和、平静和耐心的小城,如今却陷入了狂欢般的剧烈骚动。我们在这里仿佛被关进了笼子以供人观赏、遭人白眼,周围的敌意把我们隔离了起来。我们那么多朋友里面没有一个来帮助爸爸。犹太-基督联合会也关闭了它的办公室,多年来爸爸曾是它的积极会员,最后还成为其刊物的主

编。联合会的财产在公开拍卖中被出售，也不再有人邀请爸爸去市政委员会了。而那只从前经常收到出其不意的信件、杂志和书籍的邮箱变得空空如也，只是偶尔还会收到水电费账单和拖欠付费的催款单。

奇怪，爸爸竟然没有对那些抛弃他的朋友表示不满，也没有对那些他曾作为会员但却不再向他发出邀请的诸多协会发出怨言，让他忿忿不平的却是那些犹太小资产阶级。现在他一门心思在写一本关于犹太小资产阶级的小册子，这些家伙必须从这个世界上被清除出去，因为他们自私、浅薄，而且缺乏真情实感。这成了他这段时间来唯一的用语，犀利的用语。他写作时完全出自一种热情，可是已经没有人还在期待他的手稿了。

妈妈越来越把自己封闭在自己要做的事情之中。她让自己承担起一些小小的义务，并坚持不懈地履行着这些义务：每周去医院探访一次，为孤儿院收集衣物。现在这成了只属于她自己的秘密。但是她的善举却并没有带来任何慰藉。她就像是喂养着一个贪婪而苛刻的恶魔，这个恶魔不但榨取了她口袋里仅有的几个子儿，而且还夺走了她不在人前流露的情感。爸爸愤愤地说道："我不懂这些施舍有什么意义，你要做——就做好了，这有什么可保密的，为什么你要瞒着我?"妈妈猥琐地站在那里，样子就像一个行窃时被当场抓获的小偷。

于是爸爸决定没有必要再进行自我封闭了。我们必须走出门去。爸爸在蒂罗尔山区有个年轻时代的朋友，名叫多贝尔，出

身于奥地利贵族家庭。在他们的学生时代为改变奥地利文学的面貌做了很多事，出版刊物，组织聚会。多贝尔完成学业后，他的父母把他们在蒂罗尔的大庄园传给了他。开始几年他还涉猎一下文学，不过后来他越来越投身到生意场上，而且也还稍稍涉足政治。

爸爸毫无理由地做出了这个匆忙的决定。爸爸已经多年没有见过他。爸爸给他写过两封内容详尽的长信，但没有得到任何回音。尽管如此，爸爸还是认为我们应该走出家门，而且偏偏要去蒂罗尔山区的那个朋友那里。起初妈妈还试图劝阻他，但他的态度很坚决。妈妈别无选择，只好开始准备把行李装进那只绿色箱子。我留心到她的两手合在一起，距离身体很近，动作幅度很小，显得缩手缩脚；当她转头问道是否也要带上皮靴时，目光中充满了强烈的悲哀。爸爸醉心于他那暧昧的渴望，这种渴望的力量也猛烈地涤荡着我们。

火车站的售票处聚集着不少平民和士兵。两个女人站在那里高声谈笑着。爸爸站在那个阴暗角落里的样子很奇怪，他的嘴角掠过一丝酸楚的微笑，似乎明白自己是没有什么希望挤进里面去的，可是他又没有勇气说出“我们回去吧，有什么可着急的呢？”也许就是这个样子，我寻思着，死去的特蕾莎姨妈在接近于神志不清的状态下就是这样微笑的，一种类似于厌倦了思考的神情掠过唇边。自从她死后，我们所有人都在经历着她的生活，一个片断接着一个片断。正如这次匆忙的旅行，似乎也是

出自她神志不清时的召唤。

这时爸爸也被挤进了售票窗口旁的人堆里。我们从近处看到他在栅栏旁奋力挣扎着，有几次已经接近了窗口，甚至可以说非常接近了，他的身体连同他那伸向墙边的手却被一把推开，又一次陷入人流的漩涡之中。最后，他终于抓住栏杆，拿到了车票，这时有一个站在那里的人冲着他喊，但并没有直接面朝着他："我不能让他们进去。"爸爸弯腰拾起他掉在地上的帽子，踉跄了一下，当他站直了双腿，却看到那人盯着他提高了声音说："我说的就是你。"

我们只找到一个座位给了妈妈。我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坐三等车厢，里面充斥着烟雾和啤酒味儿，周围都是些穿着沾满油污的工装裤的人。我们紧挨着站在一起，暴露在那些酒鬼灼人的目光中。爸爸的奥地利口音和他插科打诨的笑话都不管用了，这时候人人都知道我们是犹太人，而且更糟的是，还是装扮成奥地利人的犹太人。妈妈坐在椅子上，茫然地睁着双眼，似乎已经不知道如何控制自己的双眸，只是把这一片嘈杂收入眼底，连睫毛也无力眨动一下。几个小时就在列车单调的行进中过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我们的兴趣似乎越发强烈。爸爸开始还试图否认我们那丢人的出身，最后还是承认我们的确是犹太人但并不是商人。

"犹太商人怎么啦，难道不应该让他们灭绝吗？"一个男人盯着他大声说道。

“我想请大家注意，这个人在谈论灭绝，”爸爸向车厢里的人求助。

“那么您认为呢，您认为应该怎么谈论犹太商人呢？”

“我，”爸爸前言不搭后语地说道，“是个奥地利作家。德语是我的母语，除此之外我没有用过其他的语言。我用德语创作了六部小说，六本故事选集和两本散文集。难道这不是我给奥地利带来的荣誉吗？”

出现了片刻的沉默。

“好啊。那你为什么不到犹太人那里，去为他们写作呢？他们肯定非常需要作家。我们对我们所拥有的已经很满足了。”

“我难道不是像你一样的奥地利人吗，难道我不是在这里上的学？不是从这里的中学毕业？不是在这儿上了大学？不是在这里出版了我的书吗？”爸爸倒出了他的一肚子苦水。

这时另一个男人插了进来，一个有着一副苦行僧般面孔的男人说：“这就是我说过的。他们控制的不光只有经济命脉。”

“是什么魂灵让你的脑子出毛病了？”

“如果这是犹太人的魂灵，它能毁掉一切。”

通往相邻车厢的门开着，从那儿传来一个声音：“别唠叨个没完了，有什么可说的？”那苦行僧般的男人酸溜溜地做了个鬼脸，红着脸说：“我没说什么，是他在说。”妈妈张开的眼睛似乎张得更大了，她僵直地坐在位子上。

大家不再说话了。人们喝着啤酒，哼唱起军歌、黄色小调和诅咒犹太人及其钱财的歌曲。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在他们的歌声中敲打着。爸爸的整个身体渐渐萎顿下来。他的右手紧紧抓住扶手，一副遭到羞辱之后的样子。歌声这时已经对犹太人做出了裁决。爸爸的脸不再因为恐惧而抽搐，只是显露出痛苦的表情；当火车停下来的时候，爸爸说："来吧，我们在这儿下车。"

天色昏暗，妈妈穿着那件我最喜欢的旧冬装站在那里，仿佛被剥夺了所有的愿望。爸爸把我们拽进一家小咖啡馆，仿佛外面正下着冰雹。

小咖啡馆里旧时家庭里的那种热气一下子把我们裹了起来。爸爸说着奥地利的俚语，咖啡馆老板热诚地和他打着招呼，急忙给我们端来了热咖啡和蘸黄油的面包圈。爸爸点着头说：我们走了很远的路。

去年爸爸收到过一封信，一封热情洋溢的来信，来自南美洲的一个远亲。信是用错误百出但还依然能看懂的德语写的。这个亲戚建议我们去他那里。"的确，"他写道，"这里的经济状况并不繁荣，但是有进取心的人不会因为吃不上面包而挨饿的。最主要的是，这里没有对犹太人的公开仇视。"这封信让爸爸很恼火。居然建议一位著名的奥地利作家去南美，就为了在那儿开一家杂货铺或是饮料店，这不是犹太人的厚颜无耻还是什么。就知道财富，就知道金钱。对于文学和音乐一窍不通。把满足生存的本能看得至高无上。

从那以来事情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可是爸爸留在奥地利的决心却越发坚定了。在这种时候出国,在这个恶灵肆虐横行的时候出国,无异于承认理性的消亡和文学的无用。爸爸拒绝离开,他的拒绝之中还包含了某种坚决的敌对态度:让那些商人走吧,让那些小资产阶级走吧。我再也无法容忍他们。我们将坚守在这里的岗位上。

形势越来越严峻了,可是爸爸还死死地抱住任何蛛丝马迹和凭空幻象不放。要是收到一封来自某个偏僻角落的读者来信,对他的某一本书表示赞许,他就会把信读上好几遍,从中找到情况好转的迹象,要是收到某个脱离了犹太教或是混血种的年少时期朋友的来信,表示赞同他的看法,他就会像在创作时写就了一个漂亮的段落一般开心。可是这样的来信几乎已经都停止了。因为没有继续打官司的钱了,爸爸只好时不时地到他的老朋友们那里去碰碰运气,可是他们却并没有给他好脸色看。于是他想到了那位蒂罗尔山区的朋友。

这时咖啡馆老板端来了面包圈、黄油和几杯热咖啡。这里有一种无拘无束的家庭氛围,让人心里升腾起对另一些日子的怀念。爸爸的声音又恢复了常态,心里也有了盘算:自由派的出版社,与恶灵相抗争的杂志,只有多贝尔能理解,他是一个战士,一个贵族,骨子里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有一个信念,只要我们到了多贝尔那里,事情的面貌就会改变了。

不过这时候我们不得不从这里转到另一个属于铁路主干线

上的车站。咖啡馆老板对路线和火车时刻一无所知。他那张平静的农人的脸庞上流露出的那种一辈子没有出过远门的人才有的略显鲁钝的诧异表情。

黑夜降临了,小小的车站空空荡荡,没有几个人。几家货栈都关了门,旁边的几条铁轨在打烊的货栈前分岔开来。爸爸试图用他的那几句陈词滥调让我们打起精神来,却没能驱赶走浸润在这片空落落的沉寂之中的一丝前途未卜之感。心里念叨着再过一会儿我们又得颠簸在气氛敌对的慢车上,实在是让人高兴不起来。

正当我们像漫无目的的迷路者一般看不到一丝亮光的时候,一列小火车出现了,停靠在车站上。已经很晚了,一群旅客横七竖八地躺倒在座椅上,嘴里散发出阵阵啤酒味。爸爸没有问这趟车开往哪里。旅客们睡着了,这一点令他颇为满意。可是他错了。一个醒着的家伙立刻发现了我们并大声宣告说:"犹太人到这条支线上来干什么?"他的喧哗并未惊醒睡着的旅客。这时我才第一次体会到猎人的目光。我们身上的什么地方,也许是那有些异样的金发和碧眼,把我们一下子暴露在这群猎手的目光之中。不走运的是,唯一的空座就在那个从第一眼就开始追踪我们的猎人身边。

"你怎么会这么肯定?"爸爸竭力装出一副镇定的样子。

"我可完全认得出他们,"那个旅客平静地说。似乎是在谈论一桩与我们毫不相干的遥不可及的事情。

“怎么能认得出来?”爸爸惊奇地问道。

“通过持久的观察。人们通过观察学到东西。人难道不就是这样学到东西的吗?”

“可是你从他们身上看出些什么标记呢?”

“有很多。不过我们先瞧瞧显而易见的地方。他们比较矮,不是吗?”

“难道说天生的奥地利人当中就没有矮个子吗?”

“有。当然也有,不过不是他们那种样子的矮。他们的肩膀是圆的。因为他们不习惯提重东西。像你这样的肩膀,比方说,就非常的犹太。我得说犹太得让人吃惊。”

“我倒没注意,”爸爸说,似乎产生了一股打破砂锅问到底的劲头,“就这些就够了吗?”

“不。仅仅抓住一个标记很可能会出错。你瞧,有时候会出现严重的错误,让人恼火。应该观察目光。目光会向你透露很多东西。”

“有意思,”爸爸说。

“他们的目光总是充满焦虑。”

“为什么会焦虑?”

“你在世界上找不出还有像犹太人那样为他们的后代而焦虑的生物了。”

“那奥地利人天生就不会焦虑吗?”

“奥地利人天生就是不会焦虑的生物。他的祖先是农民,

吸收了土地的精华而获得安宁。他的孩子们自己会长大。他不责怪任何人,也不责怪自己。"

"这些标记该足够了吧。"

"不。绝对不止。当然这对于初步的识别来说是足够了。不过这还不能做绝对的判断。他们身上还有一些怪相,我把它叫做代代传袭的根深蒂固的怪相。让我吃惊的是,在有些混血种人的身上我也发现了这种怪相。"

"你的观察真是太细致了。"

"这就叫做通过观察。人通过观察才学到东西,不是吗?"

他的声音里没有一点刻毒的成分,而只有一种就事论事般的耐心,看起来让爸爸一点儿也不感到害怕了。爸爸提问时的样子仿佛只是在问路或是讨教某个诀窍一般,而那个人回答时也是一副尽力想要把问题说明白的样子。

车厢里的人依然睡着,身上裹着衣服。在餐车里,有几个人坐在啤酒桶边,自顾自地喝着啤酒。

"你是干什么的?"

"你猜猜?"爸爸说。

"医生,要不就是律师?"

"差不太多。我是个作家。"

"你一定为报纸写作喽。"

"在杂志上写写。"

"换句话说,是个知识分子。"

大约两个小时以后，我们到达了中转站。没有别的人下车。爸爸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感激之情向那人道了别。冷冷的冬季的寒光流淌在空落落的站台上。真奇怪，我寻思着，为什么我们要经过这些陌生的地方，就像是一次对无名领地的提前侦察行动。

“一杯咖啡，我愿意用全世界所有的财富来换取一杯咖啡，”爸爸从自身的困扰中解脱了出来，以一种亲切而大方的口吻对我们说道。售货亭关门了，站长用温和的声音解释说，这儿所有的店铺都关门了。妈妈一言不发，似乎她对于周围的一切都漠不关心，只知道蜷着身子站在那里。她既非镇静自若，也不是怒气冲冲的样子，只是跟随着爸爸在黑夜中迷失了方向，而此时的爸爸除了想要一杯热咖啡之外已别无他求。我一下子害怕起来：从现在开始一直都将是这样吗，从一列火车转到另一列火车？

火车果然开来了。车厢里很空，连头等车厢也是空的。蓦地，一切宛如往日重现：舒适的、装了弹簧的座椅，绿色的窗帘，端到你面前的咖啡。仿佛噩梦醒来后有人送来了热情的慰藉。就连妈妈也从凝固的状态中被唤醒了，她说：“上帝，我们这是在哪儿？”爸爸半开玩笑地说道：“情况并不像想像的那么糟糕，总算还有人能乘坐的火车。”

然而这样的宽慰只不过持续了约一个小时。我们又站在一座小站上，一座只有孤零零的一所小屋的车站，既不能挡风，也没有灯光，要不是一块被人遗忘的牌子上还残留着多贝尔庄园

的字迹，这里就没有任何指示方向的标记了。爸爸发现这块牌子就像发现了战利品一样地高兴。“我们得坚持住，”爸爸说，“必须适应这种新的黑暗环境。”

我们已经进入了黑夜的最后阶段。一团团的阴影像黏稠的液体一般从一座座山丘上冒出来。阵阵雾气拍打在我们的脸上。这里没有任何住家的迹象，只有那种混杂着粪肥气味的耕地的湿气。我们徒步走了好久。爸爸把箱子扛在肩上，大步流星地走在我们前面。夜色更黑了，黑暗中看不清任何方向，我们在一棵树旁停下了脚步。

显然那庄园已经不远了。晨光把它暴露在我们面前。“这就对了，要是一个人失去了信仰，他就会迷了眼，”爸爸自言自语地说。

那所房子，更确切地说是那一群房子位于一座较高的山冈上，周围是一些低矮的山丘。晨光氤氲中，这些房子被包裹在稀薄的水汽和一道道浅红色的细细光芒之中。经过一夜的漂泊，这幅田园风光一下子把我们俘虏了。“我们来对地方了，”爸爸喊道，脸上又恢复了神采。我们就像一群错过了火车而决定步行走完全程的度假者。

在庄园门口，爸爸自我介绍说是少爷的一位老朋友，少年时的朋友，志同道合的伙伴。那个看门人对爸爸的奥地利口音印象颇深，他略显尴尬地说因为时间尚早，少爷还在睡觉。爸爸说：“要是听说我在这儿，他一定会答应起来的。我们上学时是

多年的同班同学。”

看门人起先有些犹豫，最后终于答应打个电话进去。女接线员说她得到过明确的指令，任何情况下她都不能违反指令，她只是答应，会把情况详细记录下来并尽早让少爷留意此事。爸爸笑着说：“他还在睡觉！”

看门人的屋子是一间木制小屋，此刻倒是暖融融的。他给我们端来了咖啡和农家的面包，爸爸不停地对他讲述起那些美好的日子，在维也纳的日子，当时他和少爷在一起上学。看门人对每个字都惊讶不已，还不断地打听着细节，爸爸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他所有的细节。妈妈脱下我的湿鞋子放在炉子旁烘干。

两个小时过去了，电话铃没有响起。爸爸要求再联系一下，女接线员也许忘记了，也许是女仆换班了。看门人又犹豫了一下，不过还是答应打个电话过去。

事情总有个轻重缓急，传来了女接线员的回答，这事儿她刚才已经记录下来了，她一得到回音就会跟我们联系的。这个答复中依然留存着某种希望，某种承诺，看门人也还依然保持着他殷勤的待客之礼，给我们端上了果脯。秋日凉爽而美好的阳光低低地将庄园锯开一道口子。湿润的气息让人想到刷得雪白的房间，轰鸣的炉子和热气腾腾的奶制品。

上午的时间过去了，地上的湿气消散了，中午的时间也过去了，仍然没有传来回音。现在已经到了有必要以一包瑞士巧克力来说服看门人答应与女接线员联系的时候了。女接线员的回

答明白无误:不要再为这件事而烦扰她了,她一有回音就会联系我们的。看门人连忙道歉,请求原谅并保证说,下回他一定会按照命令行事。

看门人的脸色变了。爸爸收拾起他残存的自尊说道:“我不会没完没了地等下去的。友情不是单方面的。我不会再拖下去了。人毕竟不是昆虫。请原谅,我们打扰了您。”爸爸以一种不同寻常的骑士风度向看门人说道。但那家伙没有吱声,生怕被卷入这桩麻烦事儿。

妈妈一言不发。我们向着车站的方向走去,紧紧跟上爸爸迅疾的步伐。除了我们之外,在这片被开垦的广阔山峦间看不到任何人。尽管发生的这一切都让人真切地感觉到灼人的疼痛,可我还是有种感觉,这不过是一阵绿色的妖风吹来让我们沉沉睡去之后所做的一场疯狂的噩梦。这一趟让人心力交瘁的远行也不过是捆住我们手脚的一次沉睡而已。

当我们抵达车站时,最后一道光线已经划过屋顶的瓦片。爸爸的上衣沾满了泥浆,他的脸上显出狂躁的表情:“我们坐第一班火车离开这里,”爸爸说,似乎还有其他的选择摆在他面前。

爸爸遭到羞辱的尊严在这空无一人,甚至连个值班员也没有的小站上显得很奇怪。气派考究的快速列车一列接一列地疾驰而过,没有一辆停下来,一列货车驶过,也没有停车。夜幕降临时,值班员来了,爸爸责怪起他来,就好像这家伙不是一个小

小的值班员，而是一个负责火车调度的大人物。那个瘦瘦的男人微笑着表示歉意，说他就只不过是个值班员。如果我们的耐心在九点之前还未耗尽的话，就会有一列火车把我们送回家的。爸爸摆出和解的姿态，重新恢复了和缓的神情。

“你们打哪儿来，要上哪儿去？”值班员用乡下口音问道。

“去拜访多贝尔庄园。”

鉴于这位值班员对待他态度谦恭，而且对他发的那一通火也并不计较，爸爸也以一包巧克力表示对他的尊重，作为回报值班员说道，已经好些日子没人来用过这座边缘小站了。车站离开村子有点远。多贝尔庄园有自己的交通工具。妈妈想要喝水，那人递给她一个旧茶壶。值班员对巧克力表示了感谢，倒出了一肚子怨言，新的条令、货币贬值和那些有伤风化的年轻姑娘，这全是因为城里头邪风劲吹。爸爸重又专心致志地倾听他的讲述；当爸爸问他能不能来一杯咖啡时，值班员抱歉地说道，当初他在这儿有张桌子和全套咖啡器具，每个客人都包管能喝个够。看得出他说的不是实话，不过爸爸并不在意，他很高兴能有这一通闲扯，这表明这个人依然把他当作一位尊敬的先生看待。

九点钟火车到站了。值班员把箱子搬上车厢。爸爸和他告别的样子就像在和一个可靠的仆人告别一样。

火车驶入了黑暗的夜色中。疲惫的人们把自己用衣服埋起来躺倒在椅子角上。昏暗的灯光从拱形的天花板上流淌下来。

忧愁又降临到爸爸的身上，他的脸上覆盖了一层新的网状阴影。突然间我意识到：我们永远也无法完全摆脱这个夜晚了。

坐在我们身旁的女人问道："我们离克诺斯芬是不是还很远？"爸爸把自己从忧郁的状态中拉了回来，仿佛有一只柔软的手把他唤醒了。"不远，夫人，不远。"

这是一个年轻的女人。夜色在她的脸上刻画出几条好看的痕迹。她问爸爸是不是认识路，从沉郁中被唤醒的爸爸充满深情地细致而又流畅地讲起了那些散布的小市镇。哪里有好酒、最棒的烤肉和真正的乡村风光。

女人的脸上显出娇媚的表情，笑了起来，似乎爸爸告诉她的并不是人人熟知的情况，而是让她轻松悦耳的奇闻逸事。而当告诉她他就是作家 P. A 时，她大张着嘴，抓着他的手说："真不敢相信。"原来，她读过爸爸写的书，读到过对他的那些批评文章，而且还看过斯蒂芬·茨威格那篇著名的关于爸爸的报道。

"现在他们正在对我进行造谣诽谤，"爸爸轻柔地说道。

"会有他们后悔的时候，"她说。

爸爸重又被唤醒了。他笑着讲起了一段段小插曲。讲起斯蒂芬·茨威格，讲起瓦色尔曼和施尼策尔，讲到布拉格派和维也纳派，还讲到那位可称为伟大的作家——弗朗茨·卡夫卡。爸爸简直被这番对话弄得神魂颠倒。仿佛我们这次旅行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遇上这个女人，以便让她向他献上少许女性的倾慕。我和妈妈似乎已经被他忘到了脑后；随着列车渐行渐远，我感觉

到:爸爸对这个女人的喜爱也越发强烈。他跟她说话的时候就像一个小伙子一样忘乎所以起来。

他没有告诉她多贝尔庄园的事儿,只是说他急着赶路是为了要完成新书中的几个章节。他竭力使自己的声音听上去就像一个成功男人一样轻松自如。有时候他这样的作家需要隐姓埋名的偶遇,他说,“做个无名大众,有时候富有启迪的偶遇就发生在夜里。”

妈妈僵硬的面孔从凝固的神情中苏醒过来,她冷冷地看着爸爸,似乎那并不是她的丈夫,而是一个正在试图讨取女人欢心的陌生男人。

余下的路途我们都没有言语。爸爸睡着了。他疲惫的脸颊靠在椅背上,露出一种奇怪的幸福神情,如同一个人喝醉后脸上的神情。只有他的左手,还在随着车厢阴郁的节奏而左右晃动,仿佛已经脱离了他那松弛的身体。

从火车站到家我们是一路走着回去的。爸爸的脸上容光焕发,他迈开长长的大步,就像他要去参加委员会的会议时一样。我觉得,我们此时成了附着在他身上的繁茂而沉重的枝丫。没有我们可以让他觉得更为轻松。

回到家后,我们之间笼罩上了一层尴尬的气氛。爸爸急急忙忙地脱下鞋子,与此同时大声地说出下面这几句话:“多贝尔会后悔的。我永远不会原谅他。还是有人依然欣赏我。”他所遭受的羞辱这时已被一种轻快而愚蠢的自以为是所覆盖。

当晨光初露的时候，屋子里已经吹拂着我们从路途中带来的那种新的疏离感；白色的、庄重的、沉默的疏离。谁都没有惊异于这疏离感来自何方，如何而来。这时妈妈嘴唇上部的一条细纹以一种如同正在努力合拢的裂缝般的节奏跳动着。尽管我们刚刚度过了一个漂泊的夜晚，妈妈依然板着面孔说道："你怎么不去上学，你还有拉丁语考试。"我知道，她不想要我在这个艰难时刻待在家里。当我背上书包站到门口，我才发觉：此刻，在她的伤口上生长出了隐隐的自负。

12

那是我们在家里的最后日子，我们并不知道这是最后的日子，那段时间我们家的大门总是敞开着，陌生的人们就像穿过公共走廊一样从我们家的大门进进出出。妈妈待在厨房里准备三明治。这些人是些惊魂未定的犹太商人，行程中在我们家找寻临时的庇护所。还来了一些刚刚成年、被人追踪的女孩，愁眉苦脸的样子再加上擦脸粉的印痕使她们的脸蛋如同边缘斑驳凋零的花朵。也有带着小孩子的女人，以及各种各样失落无望的面孔，已被火车的煤灰沾染得污迹斑斑，还有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老人。在他们的眼中，这个地方如同一座尚未被灾难的巨浪所席卷的小岛。奇怪，没有一个人想到如何讲述自己所经历的遭遇。是怎么到的这里，实际上又打算去哪里继续漂泊。有些人依然穿着整齐，而另外一些人的衣服上已经开始散发出汗味和油脂味。正如任何发散出灾难气息的地方一样，这里的人们也

热衷于以物易物的买卖，只不过他们交换的是各种道听途说的传言和苦涩的玩笑而已。

即使在这个时候爸爸也没有停止他的幻想。他写作，又狂乱地把手稿磨得发亮。他把所有的怒火都发泄到自己身上，发泄到他那些并不完美的精神产品上。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没日没夜地工作，他就这样与那些恶灵抗争着，自从这个夏天开始，恶灵就不停地敲打着我们家的大门。

当这一切正吵吵嚷嚷地走向一场灾难的时候，从维也纳来的两封信在爸爸的心中激起了新的希望。这些信看来是来自冯·德罗克男爵夫人，爸爸年轻时的一位朋友，她曾重建了文学沙龙，并因出版杂志而获得了一大笔资金。

妈妈并不高兴，似乎她知道这些不过是愚弄爸爸并使他产生错觉的秋日幻像。她还是勤勤恳恳地做着她的工作：每天探访医院，每星期探访孤儿院，给那些不停前来的惊慌失措的商人准备三明治。妈妈越来越把自己封闭在她的这些活动中。甚至不肯放弃其中的任何一件事。她做这些事并不是出于高兴，而只是出于某种孜孜不倦的坚持，而且这种坚持似乎是由外界强加于她的。爸爸不再跟我们待在一起了。他渐渐落入了黑暗之手的掌控，使他完全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

城里原本有一个老人居住区，年久失修，随着岁月的流逝更是被人彻底遗忘了。老人们有时候会流落到街头请求施舍。这是些倔强而自尊的老人，市政厅的巡查员与他们进行着艰苦的

斗争。一个寒冷的秋日，来了好多货运马车，把老人们集中起来运走了。马车队列就像巡游车队一般驶过哈布斯堡大街。老人们挥舞着他们嶙峋的双手，他们的双手传达的是那样一种幸灾乐祸般的兴奋。显然有人向他们许诺在别处有更好的条件，而他们也相信了这些许诺。车队缓缓地朝着火车站的方向行进。妈妈站在门口目送着车队，直到它们消失在视野中。没有人知道这样的迁移意味着什么，不过妈妈似乎猜到了什么，因为自从这次转移行动以后，她就没有停止过分发衣物和准备三明治的举动。她所有的一举一动都沾染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忘我的虔敬，就好像一个人明知对自己很苛刻却依然要让自己承担起这种苦行。

一天晚上她把夏尔加带到了家里。这是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孩，是从本地的收容所里带来的。那个机构正做着转移前的准备，妈妈自作主张决定收养她。这个女孩并非特别漂亮或是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地方。她的脸上邋里邋遢，微微皱着眉头。不过除了这些也没什么了。于是她就这样也加入了这最后日子里的骚动。谁也没有预料到这是最后的日子，只有妈妈的慈善义举传递出某种气息，不知道为什么妈妈坚持认为，她的善行终将会被完成，也会被众人认识到。她会责备那些流浪的商人，就好像他们不是陌生人而是她的亲骨肉一般，必须让他们醒悟到自己的错误。她倾其所有献出了一切，但这份奉献对她来说却并非轻而易举之事。

在最后的骚动中，我的学业并没有中止：双曲线和抛物线，有两个未知数的方程式，还有那些永恒的水桶，因为有两个龙头永远也不可能排空。一周一次和两周一次的考试，为的是即使在这样的时刻，也不丢下任何一门课程。妈妈对我的功课要求很严。

夜里夏尔加对我讲述了那个被叫做收容所的令人羡慕的奇妙世界，那被称为宿舍的长长的卧房，偶尔也会被用作庆典的食堂，愁眉苦脸的收容所嬷嬷，还有那个老是盯着女孩子不放的洗衣工。她简简单单地讲述着，就像一个人讲述着寻常的生活琐事。有时候狡黠的笑容堆积在她的脸上，似乎成了一个知晓多少秘密的小女孩。不过让她最感害怕的一件事就是念书，如果说她心里还有什么希望的话，那就是总有一天她会摆脱念书这门苦差事，现在她知道，至少在这方面，任何事情都不会改变。午后她会帮着妈妈准备三明治或是分发衣物。在她短短的人生中，在从一家收容所转到另一家收容所的过程中，她学会了适应一切，在这儿她只是尽力显出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

有一天，夏尔加在偷窃时被当场抓获。只是几枚硬币，充其量也就够买块奶油夹心糖。可是妈妈却对她很严厉。我记得她是这样对她说的："我们并不富裕，但对于保持某种程度的清白却很在意，这一点任何人都不能让我们改变。"

夏尔加哭了，拍着自己的脑袋，发誓说永远不会再拿不属于她的东西了。夜里夏尔加对我说不是她偷的，而是附在她身上

的魔鬼，有时候能够控制她的魔鬼，是魔鬼在偷，她不是小偷。她知道不可以偷窃。她谈论自己的方式真是奇怪。有一次她问我，我们是不是犹太人。

“你是怎么猜出来的?”

“就这样猜的。犹太人是被宠坏了的，不是吗?”

“你从哪儿听来的?”

“我们那儿就是这么说的。”

“还说些什么?”

她咯咯笑着说:“这说出来不好听。”

“那你呢，你也是犹太人吗?”

“我不知道，”她说着又笑了起来。“我们是收容所里的孩子，没有父母，不知道自己是谁的孩子。”

我立刻明白了她有一些属于她自己的词汇，一些让她感到可笑的词汇，一些在她的唇间跳跃的狡黠词汇。妈妈一点儿也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夜里坐在她身边，看着她在练习本上写写算算。她的字迹粗笨厚重，仿佛这些字母是被她刻在纸上的。

骚动还在不断加剧:慌里慌张的商人，失去了丈夫的女人，被紧追不舍的姑娘和在厨房里准备三明治的妈妈。爸爸叫我到他的房间里去。爸爸那时候很奇怪，样子很吓人。他说到他的作品，说到那些不可原谅的缺陷。他情绪激动，焦躁不安，还想把我拖进他黑暗的隧道之中。他谈到了卡夫卡，谈到隐藏的核心，所有的艺术家都在寻找这个核心，而只有卡夫卡发现了它。

从此所有的作品都成了一种冒犯。我知道，他跟我说的是他发过的誓言，那是他对他的青春岁月以及那个不肯放手的迂腐的恶魔所立下的誓言。他突然停下不说了，似乎一下子就没词了，而我还沉浸在他刚才的话语中。

城里的精神病院和收留瘫痪病人的慈善机构一家接一家地停业了。原先转移老人的马车现在用来转移精神病人和瘫痪病人。车队从我们家门前经过，他们失落的脸上流露出的那种宁静在这里延续了几个小时。夜里，秋意开始渗入家家户户的墙壁之中。

夏尔加一遍又一遍地问我：犹太人是否有秘密，如果有，是些什么秘密。她会保守秘密，不告诉任何人。她的声音很老成，就像一个已经懂得生活中存在许多秘密的女孩子。现在她穿着一件紧身的府绸裙子，那是妈妈根据她的身材而改窄的。裙子倒确实很合她的身。

可她还是不停地折磨着我。“把秘密告诉我吧，告诉我。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没有什么秘密。”

“你干吗骗我？”

“没有什么秘密。就算有，我也不知道。”

“可是一定会有一些的。你怎么没问过。”

她机敏的反应和咯咯笑起来的样子让我惊诧不已。要是不算上算术和拉丁文，你不能说她笨。只有练习本和书本让她感

到恐惧。她老是催着我说:“你肯定知道些什么。干吗不告诉我？难道我们不是朋友吗?”

“你们相信上帝吗?”她给我来了个突然袭击。

“不信。”

她轻轻笑着说:“现在我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了?”

“真相。”

“什么真相?”

她笑了,是那种窃笑,样子很难看。

我知道,在这座小城我们每走一步都会遭人非议。就连妈妈的慈善义举,她的东奔西忙,都会被说成是不光彩的举动。更别提爸爸了,这个一天到晚坐在房间里写了又写的男人。尽管如此,那桩针对我们的诉讼依然在某种私密的状态下进行。

一天夏尔加从学校回来,身上伤痕累累,书包也被撕破了,头发乱糟糟的。她跟那些管她叫犹太佬的女孩子打了一架。

“你对她们说了什么?”妈妈问道。

“我揍了她们。”

“她们干了什么?”

“她们骂人还打人。”

就这样我们所背负的烦恼也延及到了她的身上。她用她那微薄的力量为自己的生存进行着斗争。可是毫无用处。她在我这里找寻的秘密已经印刻在她自己的身上。她也许自己对此还

一无所知。跟我们在一起的这几个月里，她有了变化。但她还是偷东西，迟回家，在街上打架。不过现在，她会立刻供认，请求原谅，还为自己犯下的小小罪过而哭泣。妈妈不会轻易地接受她的坦白，也不会轻易地原谅她；有一次妈妈还对她说："这样的行为是不可以的，夏尔加，在我们这里不可以有这样的行为。"

有时我觉得，总有一天她会逃走或是把诬蔑诽谤之词加到我们头上。何况妈妈对她的功课管得那么紧，背课文，还有学校布置的其他各种练习，以前她都是漫不经心地完成的。可是她并没有逃走。似乎她的命运已经注定要和我们捆绑在一起。她不再做那些事了，克制了手上的动作，手指头变白了，一种异样的，纤细的微笑，刻在她那瘦骨嶙峋的脸上。晚上她坐在那里倾听着，似乎被引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她也不再问那些问题了，妈妈对她讲起了另外一些日子，那时候一切都与现在不同，做一个犹太人不会被认为是一种耻辱。

夏尔加没有说："我在这儿挺好的。我想留在这儿。"妈妈也没有说："留在这儿对你有好处。"决定权，如果说还有决定权的话，依然保留在她的手中。有好几次看上去已经很明显了，她准备离开我们，去任何只要不用念书的地方，找一家餐馆或是到火车站做清洁工。可是她最终还是没有离开我们，也许是因为和我们在一起让她失去了什么东西，丧失了那种使人变成勇猛无畏的生灵的生机与活力。

爸爸有时会走出他的房间尖叫道："够了，别再折磨这个小女孩了。一个人没学过代数和拉丁语也能活上一辈子。"这些话是从他的嘴唇里用力挤出来的。他完全沉浸在对冯·德罗克男爵夫人的巨大幻觉中：奥地利文学将会面貌一新，杂志、书籍、大众图书馆，都会携起手来与那些恶灵搏斗。

就这样，一切依然悬而未决，而那些沉重的日子就降落到了我们头上，潮湿的、暴风雨来临之前的日子。没有人想得到暴风雨已经上路了。秋天的阳光无比壮丽，是那种清冷的、透明的阳光，商人们进进出出，妈妈没有放弃任何一次对那些依然保留下来的慈善机构的拜访。她严格按照日程表前去拜访。现金家里已所剩无几，不过衣物倒还是绰绰有余。

一天晚上，一个从前的老朋友，犹太—基督教协会的鲍姆医生出现了，他是一个高个子男人，举止颇有些拿腔拿调。有好几个星期了，我们家里没有见到过一位基督徒朋友。爸爸高兴地欢迎他的到来，那人坐在他常坐的位子上，没有做任何开场白就滔滔不绝地念起了自由派的请愿书：有各种各样的犹太人，并非所有的犹太人都是商人。应该整理出一份对奥地利文化做出过贡献的犹太知识分子的名单。应该用尽各种法律手段来对付所有那些寄生分子，把他们送上法庭或者根据需要把他们驱逐出去。

爸爸坐在位子上读着这些段落。一想到还有人并没有抛弃他，他一下子觉得高兴起来，说道："那些罪犯会被送上法庭，这

我懂。"我知道那上面写的是我们的罪状，而这个动作装腔作势的男人正是其中的一名法官。那个人坐了一小会儿，他的目光，那种北方人了无生气的目光，令我不寒而栗。

那天夜里我们没有睡觉。夜里夏尔加感到剧烈的牙疼，她嚎叫着在地上打滚，寻死觅活。妈妈一家一家地去敲诊所的门，可是没有人准备在这个时间为她出诊。第二天牙医拔掉了她的两颗门牙。夏尔加躺在摆放在客厅的床上，嘴唇上敷着纱布。

我们对于如此接近的末日竟然是那样的一无所知，接踵而至的现实将会见证我们的无知。爸爸为去维也纳恢复冯·德罗克男爵夫人的文学沙龙做好了一切准备，妈妈为了给下肢瘫痪病人建立一个新的居所和为流浪者建一个免费提供膳食的厨房而任劳任怨地忙碌着。爸爸和妈妈之间的争吵从没有停止。没有一件事情能让他们达成一致。那种以前浸润在家里的时浓时淡的宁静氛围，此刻已荡然无存，就像从未存在过一般。混杂着旧书霉味的樟脑味弥漫在秋天的房间里，让人窒息。没有人再去关注旁人的情感。夏尔加因为没有了门牙而显得可怜巴巴的。这段时间她好像着了魔一般沉迷在她的练习本之中，一直学习到深夜。可是这些努力却未能结出果实。她的分数现在依然叫人汗颜。我的学习成绩很好，但没人为此夸奖过我一句。似乎人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我非得门门功课都突出，起码每门都能过关。

因为没有人知道这是最后的日子，在这个家里，在这条街

上，在这扇不断在人行道上投下潮湿阴影的格子窗边度过的最后的日子，因为没有人知道，每个人都埋头于各自的事情，仿佛这样的生活永远也没有尽头。爸爸的文学幻想依然没有松懈，即使是一切已经到了如临深渊的时刻。他不停地把句子和段落改了一遍又一遍，仿佛那不是写下来的句子，而是一个个不得不受惩罚的罪犯。妈妈也一点不知道怜惜自己。她从早到晚地干活，夜里还要坐在夏尔加身旁监督她的功课。没有人关注旁人的情感。只有可怜的夏尔加受到我们所有人的关爱，这似乎也只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13

“带上那件雨衣，”这是妈妈对我父亲说的最后一句话。苦涩的怒火没能阻止她从嘴里说出这句话来。爸爸没有注意听她的话就匆匆跃入夜色之中。没有人出来阻止他，他的脚步被吞没在阴湿的黑暗中，只听到如同眨眼般的沙沙声。我坐在客厅里做着代数功课，我的被收养的姐妹夏尔加坐在钢琴旁。一切都发生在瞬息之间，就如同一阵雷电将旧家具劈开，并把它们烧成了焦黑。第二天妈妈坐在客厅里，睡袍的扣子一直系到脖子上，脸上没有上妆，身旁放着一杯咖啡和烤面包片。睡袍映衬出的蓝光在她的下巴颏上刻出了一道道厚重的印痕。我和我被收养的姐妹夏尔加，如同遭到了训斥一般，灰溜溜地走出家门上学去。上宗教课的是毛贝尔教士。我们读阿维拉的圣特雷萨①的

① 圣特雷萨（1515—1582），西班牙天主教修女，神秘主义者，在阿维拉建立圣约瑟女隐修院，著有《到达完美之路》、灵修自传《生活》等。

《到达完美之路》。突然间我仿佛看到我的父亲，光着脚，陌生的样子，攀登在一座山坡上，步履蹒跚地攀登着。

我放学后一切依然还是老样子。厚实的秋光嵌入地毯之中。妈妈脱掉蓝色睡袍，穿上了外套。我一声不吭地做着功课。五点钟文学作品赞助会在客厅里聚集开会，爸爸曾是该会的会员。爸爸紧挨主席的位置一直空着。他们就某篇手稿展开了讨论，如果不是有几段色情描写，这篇作品原本是可以得到赞助的。有些平淡无奇的意见分歧。主席坚持遵照章程的第一条款，那里明明白白地写着："为了培养审美情趣和高雅品位。"会议决定推迟做出最终裁决。主席在会议记录上签了字，并让所有与会者也签了字。妈妈给他们端上了咖啡和乳酪蛋糕。

谁也没有提起爸爸的匆匆离去。一切都按着熟悉的程序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按时开饭，爸爸在桌首的座位依然保留着。妈妈不再和我们一起吃饭。星期六那天来了一封署名寄给我的信。我认出是爸爸的笔迹，他问我好，也问夏尔加好。他要我把放在写字台上的书通过邮局寄给他，还要我把他的手稿装在分开的包裹里寄。他还附上了一张授权证明，全权委托我接收所有以他的名字为收件人的邮件。信封背面的地址是：维也纳，马萨里克五号。我觉得妈妈不会愿意读到这封信的。夜里夏尔加问我想不想去维也纳，去爸爸那儿。她似乎并不怎么明白我们所处的困境。

天气越来越冷了，后面房间里的百叶窗都关上了。屋子里

一整天都是薄薄的暗影。没有人问出了什么事或是为什么会这样。似乎我们达成了一致,对此只字不提。关于离婚的可怕谣言不时从外面传到我们家里。我们的小小灾祸就像让我们裹上了一件湿漉漉的羊毛上衣,浑身难受。

从爸爸那儿又来了一封信,还是写给我的。还是只字不提妈妈,也没有问起她的情况。夏尔加从学校里带回来一些恶毒的传言。女孩子们告诉她说,他在维也纳有一位男爵夫人。另一些女孩更是不着边际地说,那是个品行可疑的女歌剧演员。夏尔加大声笑着,她的笑声刺痛了我。

我的十三岁成人礼越来越近了,妈妈问,是否有必要去向拉比讨教一下。我很惊讶,她的双脚可是从来也没有踏入过那所举行宗教仪式的房子的。为什么是现在。我什么也没说就顺从了她的意愿。第二天我们步行去拉比的工作室。大街上一片萧瑟。这座受人宠爱的小城,被几片潮湿的乌云弄得灰蒙蒙的。雨淅淅沥沥地下着。我们匆匆穿过几条街道。妈妈忍住忧伤说到夏尔加那糟糕的成绩。连钢琴老师也对她颇有怨言。

拉比问了我们家的姓氏,态度有些勉强,似乎觉得我们有些可疑。妈妈提到了她娘家的名字,以前她可从没提起过。拉比从他的抽屉里抽出一张卡片,问了很多细节。最后终于抬起眼扫视了我们一遍,他的眼睛是那种偏黑的天蓝色。看来我们的话并没有打动他的心。他说:“不遵守宗教戒律,也不为男孩子行割礼的家庭不能被叫做犹太家庭。”妈妈起身,那种遭到羞辱

后的自负达到了最高点，她站在那里说道："就算没有拉比的认可，我们也还是犹太人。"拉比把那张表格放入卡片索引中，说："如果是这样，你为什么还要来呢?"妈妈一边把围巾从脖子上摘下来一边说道："来确认一下我们这地方没有假冒的教士。"

这次拜访刺痛了她的心。从那以后一直到她临终的那天，我都再也没有在她脸上看到过一条柔软的线条。她不停地做事，她的奉献精神不知道在哪里才有个尽头。她仿佛变成了一个失去了自己的世界而只知奉献的女人。十二月份，我们的必需品越来越少了。妈妈站在洗涤槽旁，烧煮食物，擦洗碗碟，清洗衣物。夏尔加的学业没有任何进步，妈妈陪着她坐上好几个小时，帮着她做完功课。十二月份又有几个协会在我们家召集了几次会议。以我叔叔的名字命名的文学作品赞助会没有批准把资助金发放给那个年轻作家。最后这些协会也终于不再在我们家开会了。妈妈的爱并不温柔，但她却是属于我们的，仿佛她从来就未曾属于过我们似的。爸爸每个星期都会来信，写着我的名字。在其中一封信里他要求问问妈妈，是否愿意允许他来看看妈妈。我没敢去问她。

我们庆祝了我的十三岁生日，没有举行仪式。我们在城里没有亲属。家里的朋友都疏远了我们。夏尔加准备了蛋糕，还穿上了节日的衣服。妈妈为了助兴演奏了几首莫扎特的奏鸣曲。那些出版社接二连三地退回了爸爸的手稿。从美国收到的信件也是否定的回答。其中的一封复信上还这样明明白白地写

着："奥地利需要的是另一种文学，健康的文学。"

期末考试很容易。我的成绩单上闪耀着一个个令人赞叹的分数。妈妈甚至没有亲吻我的脸颊。她这时候担心的是夏尔加。夏尔加的算术和拉丁语依然是老大难，句法分析更是让她费尽了心血。

有时候偶然会有个老朋友或是以前的女仆前来。妈妈现在把衣物却分送给了慈善机构。那些上等人家的房间似乎都主动地撤空了。我给爸爸写信，把期末成绩单抄了一遍。

夏尔加又带来了新的流言蜚语：爸爸住在冯·德罗克男爵夫人那里，恢复了文学沙龙。有人看见他和男爵夫人在一起，头上还戴着插着羽毛的帽子。我知道，这些谣言具有一丝真实的成分，尽管如此，我还是对夏尔加不计后果、喋喋不休地散布这种流言感到火冒三丈。

坏日子缓慢但却确凿无疑地来临了。我被学校毫无理由地剥夺了学籍。夏尔加带回来一份糟透了的成绩单，边上写着一条严重警告，如果通不过补考，那么她的学业也就到此为止了，不会再有第二次警告了。

冬天比往年提前降临了。我们的生活空间缩小到了两间前屋。夏尔加的手上再也没有离开过课本。妈妈一遍又一遍地帮她背公式，直到深夜。数学和拉丁语两门补考就像是躲在身后要对她进行伏击的死神。可怜的夏尔加用拳头敲打着自己的脑袋。二月初我们陪夏尔加去学校。大雪纷飞，我们像贼一样飞

快地穿过街道。我们等在外面，浑身发抖。大约一个小时以后，夏尔加迈着轻快的步子翩然而出。她通过了考试，证书就在她手里。

当天夜里妈妈为夏尔加缝制了一条百褶裙。夏尔加喋喋不休的样子很奇怪。终于她疲惫地睡着了。而我和妈妈一直坐到夜深时分。

第二天我们收到了一封署名为拉比办公室的来信，里面是一份通知，要求教区会众必须在星期二五点钟到会堂前的广场报到。

“我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妈妈故意冷冷地问道。

一整天我们都有意对这份通知视而不见。仿佛我们根本就没有收到这样一份东西。妈妈熨好衣服，烤了乳酪蛋糕。似乎在为即将到来的某种场面做着准备。星期二我们穿上节日盛装出了门。我们不知道从我们家到会堂的路是那么近。

会堂的大门敞开着，门前的空地上聚集着一些穿着冬装的人，手里都拿着伞，就像是一群批发市场门前的商贩。他们的站相没有任何尊严可言，只有某种焦虑从他们的双腿上传达出来。这些人我们一个也不认识。夏尔加问是否要在这里举行仪式，妈妈似乎漫不经心地说，她对此一无所知。

整五点的时候，拉比来了。他穿着深色的罩衫，修剪得方方正正的白胡须与他挺直的身材很相配。他走近会堂大门，示意大家进去。人们走进会堂，步子缓慢，很不情愿。从顶上的窗户

透进来的亮光使会堂里笼罩着一层冷冷的庄严气氛。拉比走近约柜，面对着约柜无言地站立了片刻。

“我们在这里要干什么？”一个男人似乎有些诧异地低声问道。

没有人回答他的问题。拉比脱下罩衫，走近前面的讲经台，用一种有备而来的动作推动了一下台子，似乎这是他手上惯常的动作。他在讲经台上坐了下来。几个女人站在门口，在黑暗中打量着。她们小心翼翼地走了进来，仪式似乎渐渐进入了高潮。夏尔加在发抖，妈妈紧紧抓住她颤抖的手。“你为什么发抖？”妈妈说，“考试已经全被你摆脱了。”

大约一个小时以后，会堂的大门被关上了。顶棚上的几支蜡烛被点燃了。拉比仿佛是得到了信号一般从座位上站起身来。他走近约柜开口处的那张大讲经台，点燃两根蜡烛。

他不紧不慢地开始了演说，危难时刻的犹太人将巩固自身的团结。这些话如同欢唱般有节奏地从他的嘴里吐出。我们仿佛不是被那一封封正式签署的信件召唤而来，而是自愿来到这里隔绝尘世与造物主同在。

他的演说持续了很长时间。他的声音，苍老的男性的声音，时而苦苦恳求，时而谆谆告诫，有力地回荡着。突然会堂的前门被打开了，一个穿着体面的女人被一把推了进来。她大张着嘴像是要喊出声来，可是当她看到拉比在讲台上，已到了嘴边的话一下子又被凝结住了，她俯下身子，伏在地板上，四肢着地爬向

后排的座椅。人们都惊呆了。妈妈连忙跑去帮助那个女人。女人站起身,恼怒地抬起手,把妈妈从面前推开。

拉比对发生的这一幕视而不见,继续着他的演说。此刻他的话语仿佛是从嘴里咆哮而出。他讲到往昔的岁月,讲到目前的萧条,讲到将要彻底改变我们的命中注定的答案。

一个接一个的人被扔了进来。有些人受了伤,有些人还穿着家里的睡袍。有两个背着书包的孩子。拉比走下讲台,缩回到他的角落里。从上面照射下来的烛光把我们变得很渺小。可是没有人跑去敲打大门。怒火被引向前方,引向前排的座椅,似乎是由他们引起了这场灾难。

"拉比在哪儿?那个罪犯在哪儿?"一个男人嚷道。

妈妈站在我们身旁,高大,骄傲,透出一种冷冷的平静,仿佛恐惧再也无法控制她。

接着是一阵犹如笼中困兽般的骚动。一些陈旧的,曾可用于各种不同需要的词语,如同褪了色的煤烟一般飘荡在空中。怒火被指向了拉比。拉比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似乎明白此刻即将做出对他的判决。

顶棚上的蜡烛一支支地熄灭了,只剩下讲经台上的两支蜡烛把火苗投射到黑暗之中。这时,人们的目光,敌对的目光在烛光中显露出来,那是已经了解了真相的目光,但又是不愿妥协的目光。

"我一辈子从来都没来过这里,"一个女人痛苦地嚎啕大哭

起来，“为什么我要来这儿，为什么？”

“因为你是犹太人，不为别的。”一个男人轻轻地嘘了一声。

大门在我们面前砰地一声锁上了，我们成了这所我们从未涉足过的会堂中的囚徒。夏尔加哭了，妈妈并没有去抚慰她。在那些痛苦的话语之中，也有些话是针对我们的，说到我们那隐秘的灾祸，如同钉子扎进了我们的心头。有人知道爸爸抛弃我们和维也纳的男爵夫人住在一起。有人甚至叫得出那个男爵夫人的名字。还有人添油加醋地强调说：“肯定是这样。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些放荡的家伙，因为那些颓废派的艺术家。”

一个女人尖声说道：“别忘了，我们中间还有个小女杂种。”

妈妈举起伞高声叫道：“你们这些小商贩。”

这些声音慢慢也就成了一些心不在焉的话语。针对拉比的怒火却是越来越强烈了。不再有任何疑问了，今晚就将是对他的审判。

拉比并没有乞求饶命。他裹着祷巾坐在角落里，这更加激起了人们的愤怒和怨恨。蜡烛熄灭了，浓密的夜色从天花板的窗户上倾泻下来。我们坐在地板上，妈妈、夏尔加和我紧紧挨在一起。我们看到那些商贩向着约柜爬去。拉比没有叫喊。整整一夜人们都在折磨拷打着他；嘶哑的声音锯开夜色，如同一把用钝的锯子。

当光线从天窗上照进来时，拉比已经被扔在地板上，血迹斑斑，重重地喘着粗气。那些拷打者退到角落里，盘腿坐了下来。

拉比既没有叫喊也没有怪罪任何人。雪花飘落在天窗上。光线越来越黯淡。妈妈脱下裘皮外衣,裹在我们身上。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某种平静的感觉把人们压在地板上无法动弹。没有人再说什么,你是谁或者你如何如何。没有人再来触摸我们隐秘的伤口。敌视的目光渐渐黯淡,似乎色彩已经溶化在他们的瞳孔中。这个陌生的空间充满了人们呼出的水汽。有人点燃了一支烟,手像一个犯人一样颤抖着。一个女人在呕吐。拉比的面孔通红,就像被人用火烫出的烙印。没有一只手去靠近他请求他的原谅。那些拷打者坐在自己的腿上,黯淡的目光没有从他们的受害者身上移开过。

第二天我们已经被囚禁在一列向着南方飞驰的货运列车里。

第二部

多年以后，当一切都已结束

1

四月底布鲁诺回到了他的城市，他出生的城市。从维也纳到施塔尔海姆的火车坐满了人。一个矮个子的犹太人，戴着黑色的犹太小帽，坐在他身旁，嘴里用德语嘀咕着，口音很奇怪。布鲁诺试图不去理会他，这种有意的回避反而让陌生人的话更多了。这个人说到他自己、他的生意、他的妻子和他的几个女儿。

火车向着北方奔驰而去。那个人嘴里吃着东西，一边向他打着招呼，一边在几张窄窄的纸条上计算着账目。最后他又开始嘀咕起来，仿佛布鲁诺是他生意上的下属合伙人，或许也可以说是与他共患难的合作者。车厢里的人都注视着他那奇怪的样子，但人们的目光似乎并没有惊扰他。他大声地说话，一边说一边似乎还在咀嚼玩味着词藻。布鲁诺忍不住说道："我不明白。"

“不要紧,”那人咧嘴笑了笑说,“这条路我走了二十多年了,从战争结束就开始走了。到现在我还从没在这条线上碰到过一个犹太人。这是一条很偏僻的线路。”

“难道我欠您一份关于我的活动报告吗?”布鲁诺生气地责问。

陌生人把脑袋耷拉在肩膀上说道:“我不是这个意思。请原谅。我不会去干涉别人的闲事儿。”临近包厢里的人喝得醉醺醺的。一个醉鬼站在车厢门口唱着下流的小曲儿。车窗是开着的,可是啤酒的味道依然不散。而那些当地的土话,布鲁诺深知其意味的土话,也与啤酒的气味混杂在一起,从人们的嘴里源源不断地冒出来。

回到家乡,身旁还坐着一个实实在在的犹太人,头上戴着黑色的犹太小帽,他的存在整个就是为了表现:自满,粗俗和丑恶,就算在最可怕的噩梦中他也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场景。黄色小调并不令人悦耳,可是旁边坐着的犹太人却更让他心烦。要不是这么拥挤,他早就换个位子了。那个生意人掏出一本祈祷书开始做起祈祷。

“我不是故意要伤害您,”生意人喃喃说道。

“我明白,”布鲁诺说,“我并没有责怪您。”

“我很高兴,”那人说,绷紧的脸上显出沾沾自喜的神情,令人生厌。

火车疾速奔驰在乡间。一片片阴影不断地在车窗上一闪而

过。他的脑中没有萌生任何回忆。一种隐隐的空虚感啄痛着他，心头仿佛成了一只被啄穿的软木塞。他的双手随着相邻包厢里倾泻而来的歌声而敲打着节拍。

多年来他一直在心里精心培育着这次旅行，可现实中的这一切显然完全不同。似乎并不是他自己，而是某种急迫感控制着他，把他带到了这里。除了身边那个丑陋到令人恐惧的犹太人，这次的旅程仿佛并不真实。那个犹太人，看来觉察到了布鲁诺强忍的敌意，把身子朝他那只蹩脚的行李箱边缩了缩，合上祈祷书，似乎有些害怕这个陌生人富于洞察力的目光。

“您从哪儿来，”那犹太人还是无法克服他的好奇心。

“耶路撒冷，”布鲁诺一字一顿地说。

“您在说什么，”犹太人大张着嘴，仿佛被当场揭穿了谎言，或者更严重——买卖中做的手脚被人当场识破。“我永远也不会相信，”他喃喃说道。愚蠢的笑容浮现在他的脸上，他又说道：“我，这可真是我的悲哀，已经深陷此地。我的生意做得很好。我没有勇气放弃它。这挺可笑，可就是这么回事儿。就是这么回事儿，没别的。”

布鲁诺没有回答。

那人又说：“人只不过是些爬虫。为了这碗毫无滋味的菜汤，人们准备出卖的不仅仅只是自己的肉体，还有灵魂。我的朋友比我好。他们选择了劳苦。”最后几句话他说得很清晰，字斟句酌，也许是故意想让布鲁诺有所回应。布鲁诺依然没有答话。

“我在这里留了下来。我老婆要求留在这里。我并不怪她。可我，我没有足够的勇气。的确，有那么一刻，一九四八年，我还记得很清楚，我对我老婆说：我要收拾行李。我们上以色列去。可是我心里还有些，怎么说呢，还有不同的想法。我不想责怪我老婆。一个人只是微不足道的。”

火车减缓了速度。绿色的树林中隐隐现出施塔尔海姆的矮房子。那些熟悉的影子并没有让他感到激动。那个生意人折叠好他的黑色外套，抓起他那只蹩脚的行李箱，也没有说一声我要下车了，就站到了下车的门旁。他的轮廓变得柔和了，他的行李箱也和那隐去的隔间渐渐融为一体。仿佛这里并无其人而只是一个迷途的影子寻觅着一堵可让自己伸展的墙面。布鲁诺想要朝他伸出手去，可是这只手却似乎已经剥离了他的身体。那种不停地在他的太阳穴上跳动的急迫感此刻如同一只疾速转动的水泵敲打着他的头颅。只有下了车，在站台上，那个犹太生意人才重新成为一个现实的存在；一只向前伸展开肢体的巨大昆虫。他站立了片刻，立刻开始穿行并消失在三三两两的旅客中。与这个生意人的相逢在布鲁诺心头留下了一种酸楚的不适感。

餐车里挤满了人，空气中散发着浓重的啤酒味儿。女招待站在柜台旁大声地咯咯笑着：“瞧瞧他对我做了什么，你根本就不在乎。”显然她这番话是冲着她的丈夫说的，可那家伙却只专注于一只冒着浓密蒸汽的沸腾罐子。

经过了一个又一个车站。平原消失了。火车穿过窄窄的峡

谷，爬上了高地。旅客渐渐稀少，空荡荡的车厢像个酒鬼一般东摇西晃。相邻包厢里一个打着盹的男人醒来问道："我们离克诺斯芬还远吗？"他那灌满了啤酒的红色脸庞就像一只烂西瓜般一下子撑了开来。从这里往后延展着一片片有山坡的草地，草地上有斑驳的奶牛和笨重的马匹。火车越驶越近了，那些农舍，经过多少代人才在这片肥沃的绿色田野扎下根来的农舍，依然矗立着，四周被红色的攀援植物所包围。布鲁诺就像熟悉自己身上的疤痕一样熟悉这些农舍。光线愈来愈暗了，火车放慢了速度。绿色的影子侵入车内，车厢陷入一种沉闷的震动声中，列车刹车停止了前行。"克诺斯芬。"传来了列车员的声音。安在车厢柱子上的信号牌随着这一声呼唤而掉落下来。

车站上空空荡荡。钟楼的影子长长地平卧在空旷的地面上，把地面拦腰截开。布鲁诺拖着他的皮箱走过站台，停下了脚步。直到这时，事情才开始明晰起来，如果说还算不上绝对明晰的话。他的双脚依然跟随着列车行驶的节奏。地面的石块依然是按照他熟悉的式样整齐排列着，只是被磨得更加平滑了。甚至连主货栈的大门也如同从前那些陈旧而牢固的大门一样懒洋洋地敞开着。只是缺少了一些声音，让这熟悉的场景产生了一种冷冷的、清醒的感觉。

布鲁诺笑了笑。似乎很高兴他的双脚依然支撑着他。墨绿色的天竺葵花依然在那里，如同往常一样显得不合时宜，矫揉造作，一团廉价的景致。是这个样子吗，还是那样的？他不知为什

么说了一声。因为激动和兴奋，他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只剩下疲惫的感觉。他的背上仿佛生出了一层铠甲。突然他似乎恍然大悟，不用那么急急匆匆。他心里有种愿望，想要向货栈里面窥视一番，触摸一下那扇邋里邋遢的旧大门，可是他抑制住了这个小小的欲念，因为另一个念头要他朝着车站出口的方向移动脚步。

从这里进城的路他们一直都是坐马车经过的。一片青翠的乡村地带将车站和城市分隔开。栖息在此的大自然用果实和蔬菜，尤其是土地的生息养育了这座小城。对于布鲁诺来说，这里却是一个未知的地带。他很高兴现在还不必让自己遭遇到令人激动的会面。“乡间的夜晚，”他自言自语地说，这是童年时代他经常听到的说法。乡间的夜晚，没有什么比之更让你心旷神怡了。

机车鸣笛上路了。几节脱钩的货车车厢遗留在铁轨上。布鲁诺又扫视了一遍渐渐消失的钟楼的影子。薄薄的暮色宛如一道透明的帘幕徐徐降落。乡村从车站后面延伸出去：绿色的田野被有意分割成四四方方的草地和农庄。那条同样穿越城市的河流流经这里，水声潺潺，让人感觉清凉而舒爽。远处可以隐隐地看到克诺斯芬，掩映在一片葱翠和橡树林中。

这里一直持续到夏夜很晚时分的蒙胧光线渐渐暗淡。一家乡村旅店旁站立着一匹马，狗在门口打着盹，一幅在廉价的卡通明信片上常见的乡村画面。然而布鲁诺却觉得，这里的一切都

蕴涵着令人困惑而惊奇的疑问。

“这儿有没有给陌生人的床位?”他用当地口音问道。

“正如您所愿,”一个女人答道,“先生是坐夜班火车到的吗?”

“坐慢车来的。”

这些简单熟悉的词语,多年未曾使用过的词语,犹如一股清凉的水流触动了他。旅店的客人很少。脚下的硬木地板柔韧而有弹性,如同踩在地毯上。房间很宽敞,正对着花园,屋子中央放着一张宽大的床铺,墙上覆盖着从杂志上剪裁下来的图片,桌子上放着一只开瓶的酒钻和一把有好几种刀刃的折刀。夜里蒙眬的暗影摇曳在屋角。

“来做生意的?”女人不顾礼节,像问当地人一般地问道。

“那是自然。”

“女歌手今晚要出场,会有很多乐子。”

“那女歌手叫什么来着?”他试图让这场对话持续下去。

“鬼才知道。她会脱个精光,就像刚生出来的时候那样。从小伙子到老头儿都被她迷得团团转。”

她就这么平平淡淡地和他说着话,没有夸张的表情和动作,就像面对一个旅店的熟客。她告诉他有那么个色鬼怎么一把抓住裸体女歌手,怎么把她拽出社区活动中心,又怎么拉着她走了好几条街。她嘴里骂骂咧咧,丝毫也不觉得羞耻。布鲁诺觉得,自从他离开这里,时间并没有过去很多年,只不过经历了一个短

暂的假期，就像是短短地睡了一觉——而现在正是夏天。

外面已经有很多人聚集在活动中心的门口。女歌手的马车在有斜坡的街道上滑行。年轻人爬上阳台和电线杆，齐声叫道："莉莲！莉莲！"四匹经过精心修饰的马套在车前，为她开出一条通道。马车夫抽打着鞭子，可是人群依然没有移动。

马车慢慢滑动，停在活动中心门前。马车夫跳下车，用他的大手为她开出一条路。年轻人高声叫喊。马车夫倾尽全力为她保驾，样子就像一位训练狗熊的驯兽师。女歌手下了车，叫喊声越来越集中，汇合成一声如雷般的大吼："莉莲！"马车夫关上了身后的铁门。

可是立刻人群又开始了持续的狂喊、跺脚，并发出不满的口哨声，似乎要把锁上的铁门砸开。与此同时人们冲开了后门，一大群人——小伙子和成年男人——从缺口冲了进去。马车夫看到又一次无法阻止的人流，垂下了手臂，两扇大门顿时开启。

夜色降临。售货亭旁聚集着几个孩子。剧院门口坐着一个无事可干的引座员，老人们在啤酒窖里畅饮着大杯啤酒。布鲁诺努力回忆着，却什么也想不起来。那种最初的亲近感逐渐离他而去，一种冰凉的感觉，仿佛有一条湿乎乎的绷带，缠绕在他的肩头。他知道，除了墙上长出的一层蕨类植物，这里的一切都是他所熟知的。那些树，他曾明明白白地看到过。他从未在梦中看见过树，可恰恰是这些树如同真实存在的影子和晃动的光芒一般跃现在眼前，剧院旁边的那颗胡桃树和大道上成排的

栗树。

“干吗不进来看看第一场演出，价钱有优惠。”引座员冲着他说。

“我走路走得累了，”布鲁诺就像在对一个熟人表示歉意。

“那个女歌手让男人都发狂了，就连那些老头也发狂了，”引座员愠怒地说着，关上了灯。显然，剧场里空无一人。

夜色越来越浓，布鲁诺依然站在原地。胡桃树的影子投射在石子地面上，从山上吹来一阵潮湿的风。从这个角度可以打量夜色是如何循环向上的。从这儿到克诺斯芬有多远——一刻钟，不超过一刻钟。还在他小的时候，有一年春天下着大雪，一家人从维也纳回来，说好了马车会在这里等他们，可是却迟迟不来。他父亲穿着皮外套，情绪颇为怪异，伸手指着大路说道："从这儿到克诺斯芬有多远——一刻钟，不超过一刻钟。"与其说那是一个真实的声音，不如说是一种惊叹。

熟悉的声音把他从疲惫中唤醒。那个声音又被尘封，记忆也随之滑落。他拖着自己的双腿回到旅店。马被拴入了马厩，狗还在打着盹。旅店女主人站在门廊上说道："上天赐福的美好夜晚。"

那间装饰着玫瑰花的小餐厅里浸润着一种廉价的温婉气息。旅店女主人并没有为他拿来菜单，而是一个个地报出本地的菜名。与此同时，嘴里还在不停地咒骂着那个败坏了年轻人的女歌手。两个女招待叽叽喳喳地大声谈笑着。布鲁诺追踪着

她们闪躲的身影。她们也许正期待着一声轻松的口哨，或是一声召唤，可是既然召唤迟迟不来，她们的谈笑声也就更响了。旅店女主人问他是否想要来点儿音乐，布鲁诺点了点头。

当他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依然能听到活动中心里传来的喧闹声，喧闹声正渐渐平息下来。他脱下衣服，舒展开双腿。那种列车飞驰摇晃的节奏，一直陪伴着他来到这里的摇晃节奏，又一次抓住了他。他的眼前只有一个场景，一颗硕大而通红的头颅，灌满了啤酒和香肠，像一只烂西瓜般在一瞬间爆裂开来。

2

第二天的见面并不令人激动。他走过狭窄而整齐的街道，两所著名的白色小教堂矗立在那里，如同两处永恒的栖息地。天空中没有一丝云彩，阳光从高空中舒缓地流淌下来。哈布斯堡公园一角的那棵洋槐树，乱蓬蓬的枝叶已经伸出了公园的范围，一切都没有改变。还是那么高，树干也还是那么粗。正是枝繁叶茂的时候。

他往前走去。不知为什么他选择了这条上学时就喜欢走的近路。在离家不远的地方他停下了脚步，似乎意识到自己已经走得太远。他脱下外套，目光渐渐停留在并排立着的两棵相同高度的木桩上。这是两棵新砍下来供人坐的木桩，被刷成了暗绿色。树皮上还有几滴洒落的油漆。这是这个角落里唯一的变化，除此之外，其他的一切依然保留在原位：围栏，孤零零的铁皮长椅。

几个学生站在学校门口。布鲁诺记起，今天是星期二，现在是十二点。拉丁语课下课了。现在所有人都在体操馆里。那两个站在纪念碑前的学生，一定是因为健康原因而不用去做操。他们正从冬天的疾病中慢慢康复，或许他们从小就受着软骨病的折磨。

他转向了一旁的“花束”咖啡馆。当时这里曾是每年夏天来这里度假的知识分子们会面的地方，不过他们更多的是进行激烈的争论。自然，他们中大多数是犹太人，只要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不会有太平。此刻，咖啡馆里空荡荡的，没有什么顾客。圆桌上竖立着蓝色的花瓶，泛出幽幽的绿光。有两个人站在后门口，正在争论着保险公司的保险条款。他们大声地说着话。布鲁诺站在离窗口一段距离的地方。无论如何，有些东西是改变了，他沉思着。曾经穿过宽阔地板的斜射光线，的确还是依照同样的角度穿过地板，可是光束却变宽了不少，那是因为重修加宽了后窗的缘故。地板看上去似乎没有任何变化，依然是那种镶木地板。

空中满是苹果树的花瓣。树叶飘落在两个坐在街边吸着烟斗的老头脚边。肉感丰满的年轻女人把脖颈暴露在阳光中。勃兰登堡公园里，几只大狗放肆地嬉闹着，可是园丁并没有去干涉它们的吵闹。上学的时候他常常在这里流连徘徊，勃兰登堡公园从来不是以壮丽的景色而著称。公园里有几株金雀花灌木攀上了墙沿，秋天里摇摆的枝条显露出一种淡淡的伤感。有时候

他会在这里遇到希尔策，一个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女孩儿，她在学校里并没有呆多久，因为拉丁语，因为算术，更主要的是因为她的父亲，一个每天干着苦力活的严厉的工人，他总是用镐柄揍他的老婆和三个女儿。还在学校里时，她那丰满而骚动的身体就已经让她变得疯狂，自打她离开了学校的课桌，经常可以在勃兰登堡公园的花园里遇到她，身边聚集着一群叼着烟卷的男人。

他重又站在学校的大门旁边。光滑的大理石台阶上已经没有别的人了。身穿蓝色制服的门卫沿着大门踱着步子，眼睛里闪烁着下午五点的疲乏和沉闷。布鲁诺回想起，这个时刻，正是理论学习部的图书室开放的时间，年迈的拉丁语老师正在那里上文献练习课。一张张面孔从他眼前掠过，可是他一个人也不认识。"真是物是人非了，"他不假思索地脱口说道，似乎这现成的词汇正可用于他的自言自语。

当他依然站在那里打量着光线的流动时，突然发现了对面的那所房子，那正是罗森博格家的那所楼房，新长出了爬山虎，是酒红色的，那扇天窗被刷成了某种暗绿色泽。这熟悉的场景似一股暖流淹没了他。走到近处，再仔细一看，他才发现，楼房的高度也还是有了些变化。加盖了屋顶层，爬山虎从周围巧妙地把它掩藏了起来。房前的外墙进行过装修，贴上了几行瓷砖。

退休以前，罗森博格大夫是本地的兽医。每天他和妻子都会来到"花束"喝上一杯午后咖啡。他们的个子都很高，举止中显示出某种严谨而刻板的作派。他们从来不与人交谈，即使他

们两人之间话也很少。在驱逐前的最后一天，他们吊死在墙上，就是那堵现在装饰着瓷砖的墙上。尸体挂了一整天，直到晚上消防队员才来切断了绳子。

布鲁诺又转身朝着公园的方向走去。他的脚下渗出丝丝凉意。罗森博格夫妇就是在这条路上迈着齐整的步伐，沉默无言地走向"花束"的；当他们到达了目的地，罗森博格就会举起他的手杖——一个已为人所接受的信号，意思是到了该给他们上咖啡的时候了。除了他们的面容，此时他还回忆起他们走路的步伐。此刻他的脚下也沾染上了那种有节奏的僵硬的步伐。他紧紧抓住自己的记忆，自言自语道："他曾是个兽医，退休后靠着退休金度日，就在那面墙上，现在贴着瓷砖的墙上，结束了他们的生命。"

"亨利埃塔"酒吧的招牌上已经装饰了夜光灯。暮色更加灰暗了；布鲁诺显然忘记了：这个季节的天色变化无常，几乎每个小时都在改变，有时候移动的云层只要在城市上空稍做停留，天色就会立刻暗淡下来。酒吧似乎是提早开门营业了，因为里面的桌子都已经收拾好了。他闻到一股吸收了啤酒的木头气味。他欠了欠身，站在昏暗的门口。"来得正是时候，"里面传来一个声音，"请进来吧。"这是一个女人尖细的声音，声音中不乏家人般的亲切。立刻出现了一个年轻姑娘，她伸出手来，就像对着一个一直期待的客人。布鲁诺扫视了一遍顶层楼座和底下的座位，又转向那个姑娘，目光中仍未拿定主意。

“我会建议您选择左首角落里的位子，是为那些讲究品位的人保留的。”她个子不高，有些孩子气，脸上没有任何可称得上漂亮或是光彩照人的地方。她用熟悉的口音说着，说话时有意选择那些像她那样的少女刚刚学来的词汇。

“是外乡人?”她问。

“对!”

“不过我觉得您看上去很像本地人。”布鲁诺对“本地人”一词的新用法一时有些诧异，于是说：“我从远方来。”姑娘没有任何惊讶的表情。她端来了黑啤酒和椒盐卷饼，说道：“希望您在我们这里玩得愉快。有新节目，来自新加坡的小矮人。两对可爱的宝贝儿。”

布鲁诺喝了一口啤酒又问道：“女歌手在哪儿?”

“我就是，”姑娘说道，“我在幕间串场，我还给小矮人们写了一首歌。”

多年没有使用过的词语浮上他的唇边，他很高兴自己依然保留着这些旧的用词。

酒吧里渐渐坐满了人。细小的、窃窃私语般的声音给这个地方填满了嘈杂，还有崭新衣装的气息和窸窣声。

“我坐上火车，就这样来到了这里，”他心不在焉地自言自语道。

歌手从幕布后面出现在台上。他们是四个皮肤黝黑的侏儒，身穿蓝色的制服。他们在舞台上站好位置。暗淡的灯光让

他们的身形更显矮小。萨克斯风开始吹出一段长长的幽怨的旋律，侏儒们跟着节奏踩出统一的步子。

“他们不是很可爱吗？”女招待问道。萨克斯风悠扬的曲调越发哀怨。侏儒们又分散开来，嘴里还发出歌声；一台小聚光灯跟随着他们的身影移动。他渐渐发现，这家酒吧并不像从前门看进去那么小。角落里都坐满了人。

“对不起，我以前是不是见过您？”

“不可能，不可能。”

“可我明明觉得，我们至少见过一次。也许是我记错了。”

布鲁诺笑道：“许多年前我就离开这个地方了。”

“如果是这样，那一定是我记错了，”她蒙住脸说，“我老是弄错。”

“我们谁都会犯错，”布鲁诺试图稍稍安抚一下她的窘境。

“可是我在这方面特别突出。”这略显坦率的话语颇有几分妩媚。

“您从哪儿来？”她又试探着问道。

“从耶路撒冷来。这是否能告诉你点儿什么？”

“等等，”少女说，“等等。我脑子里想起什么了。那么说你是，怎么说来着——”

“简单地说，是犹太人。”

姑娘大张着嘴说：“我知道了。”那尖细的笑声在她的嘴边裂成了碎片。

“你知道了什么？”

“我感觉到了，”她抓住他的手说，“我也是，怎么说来着，我的祖母也是个犹太人，她叫雷吉娜。你是否愿意和我另找个地方度过今晚？”

“当然愿意。”

“还有两首歌，我这儿的活儿就完了。那些矮人，我看他们劲头很足。就让他们把本事都拿出来吧。酒吧老板给他们灌得太多了。昨晚上他们还懒洋洋的呢。酒吧老板治得了他们。”

侏儒们的表演更加狂放。客人们大声笑着把糖果和硬币朝他们扔过去；最后他们爬上房梁顶，还在那里唱起了色情小调。“奇怪，这么短时间他们就学会了德语。”

“你在这儿干了几年了？”

“我想差不多有六年了。我没上过学。我爸爸认为我不是念书的料。事实上，在这方面我也没怎么太努力。您是不是认为这对我来说是个缺憾？”

喧闹的旋律接近了尾声。姑娘跳上舞台，唱了一首关于爱情和百合花的歌曲。侏儒们从房梁上滑下来，挤在角落里，重重地喘着粗气。酒吧老板给他们拿来了插着吸管的饮料，他们坐在那里一本正经地吸着饮料，一边还擦拭着从他们小小额头上冒出的汗水。

第一场早场演出结束了。姑娘穿上紧身外套朝着门口走去。布鲁诺已经感到有些迷迷糊糊，反应迟钝。挥发后的酒精

在他的脑袋里盘旋。晴朗的夜晚，苹果树的花瓣像雪花一般轻轻飘落。什么也没有改变，他沉思着，就连这些树木也依然像从前一样微微倾向南方。

“您住哪儿？”

“在车站那儿，那家叫‘快乐之马’的旅馆。”

“离这儿太远了。我到现在还没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我正在攒钱。这几年房子涨得很厉害；而我多么需要一间独门独户的房间。真遗憾，今晚我没有自己的房间。我喜欢有犹太血统的人。”

“他们有什么不一样？”

“我不知道。那些天生的奥地利人性情很粗鲁。不是吗？”

“这里有很多犹太混血吗？”布鲁诺好奇地问道。

“有一些。一个月前我就发现了一个。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性格孤僻内向到了让人担忧的程度。他喝了好多白兰地，一看到那些侏儒上台，他一下子就失去了控制，打了酒吧老板。丑闻，真正的丑闻；从外表看他并不像个混血，可是我知道他就是个混血。天生的奥地利人不会像他那样喝酒。岁月能让你学会怎么分辨。那么我们去哪儿呢？”

“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吧。”

“要是让我来决定，我想沿着河边走走。我已经好久没有去河边走了。我记得学校里管这叫游历大自然。我说错了吗？要是我说错了你就纠正我。”

“从那时起吗?”

“从那时起我就没有去什么地方游玩过。这里的男人都不喜欢欣赏风景。”

“那也没有度假者来这儿吗?”

“很少有。除了我们的酒吧,就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了。你说到耶路撒冷,对吧。我记得,人们管它叫圣城。我是不是说错了? 要是我说错了你就纠正我。我的历史从来就学不好。”

“你说得对,完全正确。”

“我的祖母雷吉娜说过,犹太人对自己的同胞很友善。这个戒指就是我从她那里继承下来的。顺便问一声,你叫什么?”

“布鲁诺。”

“我的名字叫布伦希尔达。喜欢我的人都叫我希尔。这个时间还能有什么比那条河更美的地方? 我的祖母雷吉娜是一个非常富有的女人。所有的犹太人都很有钱。要是我说错了你就纠正我。爸爸说过我们不可以炫耀奶奶的财富。难道有钱是件可耻的事情吗? 要是我说错了你就纠正我。”

“你说得对。”

“我真高兴。可是为什么你看上去那么愁眉苦脸的呢?”

“我累了,”布鲁诺说着伸出手搂住了她。希尔偎依在他的外衣里,亲吻着他的脖颈。

“犹太混血都很忧伤,不过我喜欢他们。我的祖母雷吉娜是个很特别的女人。她说过,人必须开阔自己的眼界。我们这

里没有人会用这样的词儿。我爸爸说，雷吉娜奶奶有属于她自己的词汇。请你原谅我。”

“原谅你什么？”

“原谅我没有自己的房间。”

“那有什么？我们去散散步。”

“我想要对你表示感谢。”

“感谢什么？”

布鲁诺很了解她们：愚蠢、天真和狡黠一古脑儿隐藏在女性娇柔的外表之下。

“我不明白，”希尔说道，“您是专程到这儿来看看的吗？”

“某种程度上说是的，你瞧，我出生在这里。”

“多么令人愉快的惊喜。”

这其中的错综复杂她并不完全理解。她伸出手，似乎想要抓住什么正要往下掉落的熟悉的东西。她抚平裙子，说道：“你一定会在这儿碰到许多小时候就认识的人。这难道不令人激动吗？”

“我是个犹太人，”布鲁诺略显做作地说。

“那么说你是个有钱人，你一定去过很多国家。”

“全世界都去过，”布鲁诺笑了。

“太棒了。我知道，犹太人总是会成功。他们是聪明人。”

船只从河上驶过，夜色笼罩在开阔的草坪上。希尔把身体埋入他的衣服，就像她们这些女孩习惯的那样，表现出过度的亲

昵。尽管如此,他还是感觉到有一种奇怪的激动渗入他的内心。

“我想要让你认识一下我的姐姐,伊芙琳。她上过两年学。她有文凭的。”显然,和这个陌生男人的接触让她略有些不自在。她搜寻着周围可以抓得住的依靠,她的姐姐。

已经过了午夜时分。希尔在酒吧里还有个小小的任务,一首午夜歌曲。希尔抱歉地说道,从现在开始她再也不接这么晚的活儿了。他们抄近路往回走,经过那个著名的精心培植的玫瑰园。那两对侏儒在灯光照亮的舞台上跟随着萨克斯风的节拍踩着舞步。侏儒们的脸因劳累而涨得通红。

“今晚你没从我这儿得到任何好处。不过我会为你保留一个美好的夜晚的,你真的一点儿都不怪我?”

“不。这是个美好的夜晚。”

“我很幸福。”她又把她所知道的词汇都用上了。

他知道,她的用词并不丰富,她对所有人用的都是那几个词儿;他正要把手伸进口袋,准备付钱,希尔已经一下子溜进了门廊。她挥起右手做了一个他不常见到的动作;似乎是说——不必了。布鲁诺站在原地说道:“明天吧。”

疲惫的感觉控制了他的双腿,但他的脑子却很清醒,明晰无痕。他在教堂边站了片刻,穿过狭窄的街道,还没觉得走了多远,双脚就已经站在了旅店门前。

“玩得开心吗?”旅店女主人用当地土话问道。

“非常开心。”

“很高兴听您这么说。那帮年轻人一晚上都聚在这儿。剧院里打破了两块窗格玻璃。活动中心里真是挤得要命。都是因为那个放荡的女歌手。你去城里真是去对了。那里,至少,还有点文化。”

3

第二天，春天的阳光流淌在宽阔的大街上。高大的树木将带着湿气的阴影投射在围栏上，清晨的宁静冷冷地停留在家家户户的门前。到这里已经有两天了。同样的阳光，同样的阴影，以同样的角度挨家挨户地经过门前，仿佛是用精确的几何尺丈量过一般。甚至那些爬满了绿常春藤的老屋顶，依然以同样的钝角竖立着。只是在门脚处，停留着一层薄薄的新雾。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改变，没有一棵树被拔离原来的位置。甚至那些石制的路桩，标着过去的界限，也依然立在原地没有动过。要不是那阳光和那带着寒意的真实感，这就像是一个清晰的梦境，细致而精确，点点滴滴，历历在目，可是那种寒冷的真实感却是清楚而明确的。你在这里，布鲁诺，你就在这里。

面包房旁边站着两个老妇人。她们手上的新鲜面包散发着某种旧日芬芳的恬静气息。"罂粟籽面包卷还没出炉呢，"布鲁

诺清楚地听到了她们的对话,这些话语就像经过一道厚厚的水幕的过滤传入他的耳中。“今天迟了。面包师昨晚喝醉了,”传来一声清晰的回答。老妇人走入了小巷,拖走了她们瘦小的影子。街上毫无动静,只有鲜明的阳光和影子。就像好多年前一样。

当他还在为那些细微的、精确的影子而出神的时候,突然发现十字路口站着一个男人,背部微微有些前倾,手里拄着一根手杖。乍一看那男人似乎陷入了沉思,显然他并不打算挪动脚步。布鲁诺向前走近一些。那个男人站立的姿势,那种僵立的姿势,并没有在他的脑中唤起任何记忆,他正准备转身,转向南面——那里晨光正渐渐扩散成两道宽阔的彩虹,他就这样转过身去。突然间他意识到:这是布劳姆,不是别人正是布劳姆。

那男人背向布鲁诺,身后的影子也随之略微变换了角度。布鲁诺向前挪了挪脚步。毫无疑问:这就是那个人。宽阔的前额,他的双眉,布满整个面颊的胡须,他甚至依然穿着那件系着扣子的大衣,大衣下摆露出他的高筒靴。

在那些痛苦的日子里,在被驱逐前的最后一年里,在那一阵可怕的混乱之中,人们改变宗教信仰,变卖店铺,抛弃心爱的女人,像饮酒一般喝下毒药,在那些痛苦的日子里——布劳姆和家中的女仆结了婚。仅仅几个星期之内,奇迹就发生了:瘦子布劳姆,禁欲者布劳姆,变成了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布劳姆。他的个子蹿高了,肩膀变宽了,脸上长出了浓密的胡须;他和新婚妻子坐

在“白马”酒窖里喝着啤酒。从来都是一声不吭的他那时却和妻子高声交谈着,仿佛他面对的是一个聋人。即使在那些痛苦的日子里,他们在城里的出现也成了一种奇观。布鲁诺的父亲曾说,你们能相信么。他们一天又一天地从窗口经过,平静而坦然地向酒窖的方向走去,向着啤酒泉眼走去。谁能料想,偏偏是这样一个感情脆弱而病态的男人,这个打了多年光棍的男人,却完成了不可能做到的事。竟然在他的生命历程中,转世再生为一个奥地利养牛人的形象,所有那些松弛的细纹都消失了,仿佛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他做到了,以最完美的方式。即使是后来,当危难逐渐加深,当廉价的音乐和邪恶的企图在街头骚动的时候,他还是一天又一天地和她一起迈着平静而坦然的步子走向“白马”。似乎以前的他从未存在过。奇怪。谁也没有阻拦他们的脚步。似乎人人都明白那个原先的布劳姆已经死了。而这个新人已经不是布劳姆了。

“布劳姆先生,”布鲁诺稍稍提高声音叫了一声。那人略微转动了一下上半身,目光盯着布鲁诺说道:“您认错人了,先生。”那目光在布鲁诺的脸上又停留了片刻才又垂了下来。布鲁诺做出抱歉的神态,向那人欠了欠身就挪向一边。一股让人灼痛的寒意穿过他的手指,就像摸到了什么放在室外的物体,将夜晚的冰霜吸入了身体,尽管如此,他还是鼓起勇气转过头来。那人依然站在原地,手里拄着手杖,以同样的角度倾斜着。这时候他觉得那个人似乎正要弯下腰去。那人轻盈地移动了一下手

杖，就从阴影中闪了出来，并投入了另一圈阴影之中，几乎让人毫无察觉。

布鲁诺不经意间走进了紧挨着十字路口的那家“花束”咖啡馆。布劳姆那生硬的声音似乎一下子缠住了他，让他无法摆脱。他走进咖啡馆，如同找到了一处避难所。这里也是同样的寂静，那种只有在旧木房里才会有的寂静。布鲁诺不知怎么脱下了帽子，混合着菊苣味咖啡的香气涤荡着他的鼻孔。

每个星期二午后刚过的时候，他和妈妈都会来到这里。那是在上完了乏味的拉丁语课之后，他的脑袋已经缩成了一团乱麻。那是一些短暂而难以忘怀的漫步，大部分情况下什么都不会发生，但却总是留下一些甜蜜的印记和菊苣的气味一起潜入他的睡梦。星期二的午后，坐在这里的大部分是依靠养老金生活的退休者，沉浸在他们骄傲的孤独之中；不过这里的老板娘——隆卡，却给这个地方带来了魔力，她和她的斯拉夫口音，在干巴巴的带着小资产阶级腔调的对话中听上去充满了一种活力。“小伙子喝过咖啡了吗？”隆卡会这样问道。“咖啡，多加点儿奶，”妈妈会温柔地说道。隆卡就会用双手拢住他的头说道：“一张多棒的犹太人的脸，我所喜欢的脸。”“干吗在大家面前出这孩子的洋相，”妈妈会眨着眼睛低声说道。“夫人，”隆卡会说，“犹太人是人类中的佼佼者，我就是在一群犹太学生当中长大的。”——“如果这算是理由，那我只能别无选择，投降了，”妈妈也被她拉了过去。隆卡就会说：“我对犹太人的欲望，夫人，

您不知道那可真是没边了。”

他张开眼睛，高兴地看到什么都没有改变。宽大的前窗上有精心装饰的蓝色花束，如同往常一样，显示出自然的朴实无华。咖啡的香味飘荡在一缕细细的、几乎看不见的水汽之中。这里就像所有的老咖啡馆一样，有着明亮的或是半明半暗的角落。在装饰着蓝色花束的前窗旁，他和他的母亲就是坐在那里，他们会坐上几个小时，听着音乐。

当他还站在那里发愣的时候，一个老妇人出现在面前，她嗓门很高，就像聋子说话时的样子：“先生想来点什么？”这是隆卡。她那一头棕色的又长又粗的头发不见了，只剩下一团细细的、蓬松的灰白头发。她的耳朵露在外面，嘴唇翕动着，仿佛有什么沉重的话语卡在喉头即将喷发而出。

“请给我一杯加菊苣的咖啡，”布鲁诺说。

“愿意为您效劳，”那老妇人说着向里面的小厨房挪动着脚步。这个时候没有别人坐在桌前。春天的日光深深地照进屋内；后面的位子上曾经坐着父亲和萨洛舅舅，不是争得不可开交就是沉默不言；这块阴暗的处所是属于他的一个可疑的隐秘之处，那扇装饰着蓝色花朵的宽大前窗，有着属于他和妈妈之间的秘密。

“加菊苣的咖啡，”老妇人喃喃地说道，用颤抖的双手端住托盘，样子就像那些手捧着圣像走向礼拜堂的老妪。

在那些青春而灿烂的岁月里，那时的隆卡年轻而健壮，头上

顶着一丛乱发。眼里闪烁着调皮的目光,是那种在小酒馆里长大的姑娘调皮的目光。一有来自布拉格的客人,她就会青春焕发,如同挣脱了束缚盛开的鲜花一般。那些奥地利人根本就没有被她放在眼里。她的丈夫,一个奥地利人,引诱她来到了这里。她一直不能原谅他。

星期天,当她丈夫出门去河滨的那些乡村酒馆,和他从小到大的伙伴相聚——那都是些农夫和工厂的工人——的时候,她就会让自己得到某种程度的自由。她坐在学生们中间,给他们讲起布拉格学生的生活。她的父亲在大学边上有家小酒馆,那些大学生会在那儿一直胡闹到深夜。她经常使用的一些词汇就是在那里学来的。她丈夫无法忍受她的回忆,他会以不屑的口气说道:"这些可怜的布拉格记忆。"在那些片刻的自由时间,她曾对布鲁诺的母亲透露说,要不是被那个奥地利人,也就是她的丈夫所勾引,她会嫁给一个犹太人。关于犹太人的事她是悄悄告诉她的,一脸神神秘秘的表情。

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有一年寒冬,隆卡多喝了几杯,手舞足蹈地大叫大嚷:"大捷克共和国万岁,向可敬的亲爱的犹太大学生们致敬,他们把温柔而隐秘的爱情献给了捷克姑娘!"

当时人们都惊呆了,她的小叔子,也就是她丈夫的兄弟,试图抓住她的胳膊让她动弹不得,可她酒劲上来后,即使已经被锁在厕所里却还在继续叫喊。情况很糟。布鲁诺的母亲试图插手,但那个小叔子抬高了嗓门,把一根绳子系在门把手上,赌咒

发誓说,她再也别想出来。自从发生了这件事情以后,隆卡的脸色有了很大的变化。她不再经常露面了,而由她丈夫站在柜台旁,颐指气使地高声招呼着顾客。

“再来一杯?”老妇人大声问道。

“好的,再来一杯。”

4

已经在这儿待了两天了。明亮的光线让他的眼睛不堪承受。所以他并没有走远。他坐在市中心，但即使是市中心一切也都还是老样子，那种让他熟悉到骨髓里的样子。那时候这里还没有夜总会。只有咖啡馆和小酒馆。学校的学生们涌向城南居住区，在那里搜寻着他们最初的猎物，乡村女孩。第二天，他们会从那里带来一丝傲慢的目光和对于犹太人的强烈憎恶。在每周两次的宗教课上，他们的提问总是把教士弄得下不了台，直到他大叫一声："你们这些堕落的小坏蛋！"

有几次他们也试图拖上他。可因为这是邪恶而堕落的引诱，布鲁诺并不理会他们在火车站旁举行的这种肮脏的晚间聚会。当然，他也为这种不合群而受到了惩罚，很快他就获得了胆小鬼犹太人这个称号。确实，他们的个子比他高，可是他比他们更灵活，在体操课上他展示了令人惊叹的爬绳梯的本领。

这些细枝末节，好多年都没有浮现在脑中了，这时却都从隐秘处迸了出来。它们不再是被遗忘的细节，而是变成了鲜活的感觉。在那痛苦的最后几个月里，他被赶出了学校，他们穿着棕色的制服，一群群地聚在青年俱乐部门前，而他则一连几个小时坐在房间里，奋力与艰难的拉丁语课文进行着抗争。混乱的局面非常可怕，但她母亲却并没有放弃："人毕竟不是动物。"就这样，当一切都表明一场大地震正越来越接近的时候，他却被纠缠在代数练习和复杂长句的分析之中。这就是母亲的愿望。

他站起身。突然想要告诉隆卡自己是谁，可是立刻又想到：隆卡已经很老了。何必这把年纪再去惊动她呢。"咖啡好极了，"他说。

"我真高兴，"她边说边朝里走去，看都没有多看他一眼。

四月的阳光垂直地照射下来，洒落在街道上。白色的花瓣在空气中散发出凉爽而清幽的芬芳气息。他又看到了布劳姆。浓密的胡须盖住了整个面颊，下巴却刮得干干净净，看上去他似乎已经在周围转悠够了，正坐在一张椅子上。这时他已经不再怀疑这就是布劳姆了。可是怎么跟他搭话呢。布劳姆，他准备向那个人恳求。我叫布鲁诺·A，是作家 A 的儿子。你难道一点也不想和我说话吗。我想，这里除了你没有人认识我。我真惊讶，这里依然保留了那么多熟悉的景象。

布劳姆坐在椅子上，把头倚靠在手杖上，直直的目光，宁静

而不带有任何感情，然而他脚上的靴子却传递出更多的信息，那里面有一种老年人的忧郁。

布鲁诺转过身。那些矮矮的、精心打理的房子并未显出任何铺张招摇之处。外省特有的恬静栖息在房子的屋顶上。完全就是他记忆中的样子。时光荏苒，它们却没有改变。只有灿烂的阳光是崭新的。这次奇怪的归来并不是他自己决定的，他的到来是另有原因的，出于某种实际的原因，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

一九六五年，他收到了两封来自两家著名出版社的信件，他们第一次告诉他，人们对他父亲的作品又重新产生了兴趣。这来自被遗忘的远方的消息并没有让他感到高兴。再加上那段时间他正和妻子处于分居状态。这是漫长的，令人痛苦的分居，导致分居的理由有很多，但其中却没有一个确切的理由。有好几个月，他的生活摇摆在原有的痛苦和全新的、尚未明朗的期望之间，在找不到出路的情况下，他请了假，收拾起行装，来到了维也纳。又从维也纳来到了这里。

这次回来并不是他自己决定的。他内心中的一种虔诚与忍耐将情感世界中所有的区域封闭了起来。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学会了在没有情感的情况下生活。就像是一个习惯了肢体麻痹的人。突然间两封来自远方的信件在旧伤疤上又引起了新的疼痛：他的父亲。他的父亲。那是他不敢触及的耻辱。这些年来却一直悄悄地渗入他的伤口。人们告诉他，父亲在精神错乱中

死于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1]。还说，在这之前他还曾试图改宗。另一种传言是说他并没有被流放到特莱西恩施塔特，而是被送到了明斯克附近。那里有人在屠宰场看到过他几次。关于父亲的谣传一直不断。几乎每年都会有些只言片语传入他的耳中，揭开他隐秘的伤口。这种耻辱又包含着很多方面。羞耻、愤恨和有意的忘却。对于父亲他没有给予过丝毫的信赖；可是最近这些年，也许是因为他自己已经接近父亲当年的年龄，他感到原来的那种痛楚和耻辱，在他身上以另一种形式膨胀着，不再有愤恨，而是变成某种令人惊异的疏离感。

此刻他正站在他和父亲当年站过的地方。现在他已经到了父亲的年龄，或许甚至比那时的父亲还要大上几岁。也同样经历着他的痛苦——不美满的婚姻。现在他来到了自己最初的所在，没有一个亲人，他只是站在那里看着这个奇怪的叫做布劳姆的生灵。他怀疑那个人是否还记得自己叫布劳姆，不过他，布鲁诺，却还记得他的名字叫做布劳姆。

布劳姆站起身，用手杖敲打着人行道，向着两旁围着矮墙的牧人巷走去。小巷被拦腰截断，药房后面花园里亮起的几盏灯光映出了房屋坡顶墙面上的黄斑。此刻他觉得，这个角落是他完全所熟悉的。在这个角落里他和他快乐的萨洛舅舅曾逗留过

① 位于布拉格城郊的小市镇，1941 年至 1945 年期间，纳粹在此设“犹太人自治区”集中营，环境优美，内设咖啡馆、花园等诸多设施，后又改为灭绝营的中转站。

片刻。舅舅是为了浏览一下报纸,而他则舔着冰淇淋。每次在这儿停留的时间都不长,可是恰恰就是这稍纵即逝的片刻,这专注于自己小小感官的时刻,只为了用力吸取冰淇淋的滋味,却给他留下了最为清晰的印象,也许就是因为那种简单而快乐的感觉。

他从一棵又一棵树旁经过,但并没有走远。这里有许多熟悉的地方,此刻他已经记不起名字了。沉重的双腿像灌满了东西。他徒劳地试图回想起什么。既然什么也想不起来,他只好把双脚不断地从这棵树拖到那棵树旁,从这张长椅拖到那张长椅上。下午的时光转瞬即逝,公园的角落里,第一缕暮色已经渐渐降临了。

夜里他又回到希尔的那个窝里。希尔不在。她感冒了,他们说。这地方人很多,但却并不拥挤。那些侏儒坐在柜台上唱着悲伤的异国歌曲。他们看上去就像成年人一样,忧伤的表情使他们脸色憔悴。邻座的年轻日本人看来是喝多了,正在随心所欲地倾吐着心里话。看来他也希望找到女歌手希尔,在期待希尔的过程中他喝多了。

他已经在克诺斯芬附近的技术学院学习了两年了。他拿到了奖学金。可是对日本的思念快要让他的脑袋发疯了;这样他很难再学下去,也很难达到优异的成绩。这里的食品不合他的口味。他常常去喝酒。日本即使已经成了一个现代化国家,可还是有不少漂亮而舒适的角落。人的生死由不得自己,但在岁

月之中，那似有若无的小小自由却赋予了此生和来世些许意义。此刻他被困在这里，困在异国他乡的奥地利，除了啤酒和拙劣的音乐什么也没有。

他说的德语中夹杂着不少英语词汇。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奇怪的旋律，不知道为什么让布鲁诺疲惫的耳朵听上去觉得很舒服。侏儒们还在继续唱着歌，可那日本人连看都不看他们一眼。他们确实是来自亚洲，可他们的歌却是假冒的。他们是厂商的奴隶。布鲁诺也喝了一杯。酒精饮料使他的感觉变得迟钝，可是他的头脑，似乎故意在和他作对，却依然清醒。四月晴朗的天气让他的头脑保持着清醒。他难以摆脱这种清醒状态。

醉醺醺的日本人不断地想要说服他相信，在日本依然有着真正的生活；美国人确实破坏了很多东西，可是破坏不了鲜活的生命组织。

“你是从哪儿来的，”日本人突然怀疑地问道，“你是本地人？”

“从耶路撒冷来，”布鲁诺说。

“瞧瞧今晚有什么奇迹发生在我头上，”日本人叫了起来。“我坐在这里，想着我在日本的小村庄，这时却走过来一个人逗我说，他是从那片圣土来的。”

“从耶路撒冷，”布鲁诺说着把自己的护照递给了他。

“毫无疑问，今晚有人想要跟我说说话，”日本人低下头。“一开始我以为只有一些讨厌的家伙在这儿围着我，可现在你

说你从耶路撒冷来。从圣城来到这里。你能相信吗。"

"相信。"

"你是我的兄弟。兄弟。在这个异国他乡。上帝从没涉足过这里。那些讨厌的家伙看来就喜欢啤酒。奥地利啤酒很合他们的口味。整个晚上我都在坐着思考:上帝究竟想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他想要我做什么,在这个时刻,这个异乡的城市,这个疯狂的酒吧,这群我不认识的陌生人身边?如果是他把我带到这里,那一定是有什么目的。要不然我不会来到这里。你瞧。你是从耶路撒冷来的,一定很清楚我指的是什么。他们对你说了些什么,告诉我。"

"什么也没对我说。"布鲁诺说。

"不可能,"日本人说。"我来自日本而你来自耶路撒冷。难道我们会毫无目的地来到这里?我们注定是要碰面的。"

"也许吧,"布鲁诺说。

"你还有怀疑?"

"不是,"布鲁诺说,"让我想想看。"

"我们需要见面已经有好多年了。因为我们曾经会过面。你相信灵魂转世吗?"

"让我想想。"

"这是伟大的信仰。真正的信仰。"

布鲁诺起身说道:"我认识一个人。名叫布劳姆。一个瘦高个子男人,只是偶尔才会从嘴里发出点儿响声,突然间他变成

了另一个人。现在叫他的名字他不会答应。我叫他他根本就不答应自己的名字。”

“当然了，”日本人说道，“他变成了另一个人，没办法答应，他不记得了。”

布鲁诺忍住眩晕想要站稳。“我得走了。”

“可是我的朋友，”日本人说。“我们可不能错过这个机会。谁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

“我向你保证，”布鲁诺说，“我们不会错过下一次见面的。”

日本人用忧伤的目光盯着他说：“多么难得的会面啊。总是刚一开始就马上结束了。然后就又是一团漆黑。我在这讨厌的奥地利干什么呢。”

布鲁诺逃离了这魔咒，走出酒吧。

夜色浓郁。从院子里吹来洋槐树淡淡的气息中混杂着锯木屑味。河上漂浮着几只渔船，水中传来孤寂的声音，只是增添了几分寂静。在那最后一年的春天，也许是前一年，他记得，特蕾莎姨妈站在这棵树旁，说了一句奇怪的关于耶稣蒙难的话。他父亲，痛恨一切宗教仪式，尤其是基督教的典礼，发表了一句大为不敬的评语，特蕾莎没有回答。他们一声不吭地往前走了一段距离；突然特蕾莎爆发出痛苦的哭泣声。一直没有插嘴的妈妈走近她的妹妹，把她的头揽入怀中，用充满爱怜的声音说道：“你想要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他们才不会懂。”后来他们走过整条街道都没有再说过一句话。母亲和特蕾莎走在前面，相隔

一段距离是他和父亲，就像刚被灼伤后那样疼痛。

记忆正如潮水般涌来的时候，他发现在教堂后面站着一个人。有那么一会儿，那个人看起来在找寻着大门，可一听到有脚步声接近，就靠墙蜷缩了起来。不过那人的动作很不小心，脸还露在外面。这是布劳姆，另一种姿态的布劳姆，小了一号的布劳姆。自从第一次看到他以后，他似乎矮了半截。布鲁诺停下脚步，下面的话一下子从他嘴里吐了出来："你为什么看到我就要逃？"他的声音似乎凝固了。布鲁诺接着说道："我就是布鲁诺·A，作家A的儿子。我记得你。你来过我们家。你难道一点儿都不想看到我吗？"

布劳姆的影子从教堂的廊柱下闪现出来，两条紧绷绷的胳膊影子无声无息地伸了出来，不知道为什么看上去就像戴上了一副黑眼罩。布鲁诺继续说道："我在这儿已经待了两天了。这里我一个人也不认识，我去过隆卡的咖啡店。她老了很多。你一点儿也不记得我了吗，布劳姆？你还给过我裹着巧克力的杏仁。"

布劳姆拎起手杖，以一种怪异的颇显做作的姿势挤出几句话来，里面混杂着奴仆的粗话和律师夸夸其谈的词藻——他一下子就把这些话给甩了出来。

"你想要什么？我不懂你的话，"布鲁诺用求神问卜般的语气问道。

"我恨你，"布劳姆冲着他把脸高高地抬起。

“我不告诉任何人,这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布鲁诺绝望地缠住他。

布劳姆似乎被布鲁诺的意图给吓坏了,他举起手杖说道:“你别想靠近我。我要打人啦。”

5

已经在这个熟悉的异乡待了一个星期了，什么事儿也没干。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他都是坐在长椅上，测量着教堂尖顶影子的移动；一次又一次地确认，除了他，这里的一切都没有改变，只有他已经到了他父亲的年纪。

当他数影子数累了的时候，就会沿着哈布斯堡大街漫步，这里也没有任何变化。似乎童年的场景被抹上了一层防腐剂，印刻在最为细微的光影差异之中：从头上的顶篷到脚下的铺路石。中间是这个季节从河上升腾起的混合着苹果花瓣的潮湿的和风。甚至那些犹太人的商店也依然保持着原有的外观，就如那家劳费尔夫妇的布店。他们都已经不在人世了，可是他们的商店却依然以与从前完全一样的角度矗立着，一切都保存完好，甚至那些天竺葵花盆也还保留着。现在店里坐着的是另一个男人和另一个女人。奇怪：他们看上去并不像杀人凶手。

对于劳费尔的妻子，他的记忆已经很模糊了，但劳费尔本人，直到现在他还清楚地记得。在那可怕的最后一夜，在上了锁的会堂里，劳费尔四肢着地爬向约柜，爬向拉比。瘦削的脸庞显出一种受伤的动物一般可怕的面貌；在他爬行的整个过程中，嘴里还在不停地诅咒着拉比。就是因为他，这种厄运才会降临到人们头上。要不是他，他的布道，他不断地要求施舍和行动，没有人会知道谁是犹太人。看看，他就是个告密者。拉比就像在向一群强盗苦苦哀求，但劳费尔还是不肯放过他。此时，除了他们，所有的一切依然完好无损地遗留在这同一个舒适的角落，沐浴在这熟悉的、每年以外省特有的平和节奏周而复始的同一片阳光下。这里那里能看到几个优雅的伤残者，冷冷地、带着几分骄傲的神情展示着他们身体的残疾，但即使是他们，也同样吸收了这座按照季节的音律而生活的小城的宁静。当他走出市中心，绿色的地平线展现在眼前，他一下子忘记了自己是在这里，在他自己的城市里，在一群布满了城市各个角落的陌生人中间。小的时候他们来这里上过自然课。观察小鸟，辨认野花。那个修女教师，白色的头巾遮住了她的面庞，会伸出细长的手指说：你们看，孩子们，这是三色堇。那白嫩、笔直而具有穿透力的手指似乎依然尖尖地指向同一个方向，就像她第一次在他眼前伸出手指时一样。

几年以后，他已经上了中学一年级，功课的重负压得他动弹不得：拉丁语和代数习题。那时他和母亲也来过这里。他们会

站上很长时间。母亲的脸色一下子沉静下来，似乎只想这样静静地站下去。他觉得那个时刻似乎有着某种宗教性的顺从；突然一种恐惧感，那是一种他从来无法用言语形容的恐惧感，让他感到万分惊恐。显然，这只是城市的天穹溢出的蓝光。可是他，不知为什么，每次看到这溢出的蓝光和妈妈谦恭的表情都会让他感到惊恐不已。

然后，在他们走回家的路上，长长的影子拖在身后，一直跟随他们到家。厚重的大门截断了影子，把影子留在了屋外。那时正是春天。更准确地说是初春时节。世界的秩序突然以鲜明的色度光谱来展现。每天会有一些小小的欢乐，每天又会有觉察不到的离别。那时候隐秘的死神已经栖身在家中。那是一个彬彬有礼的死神，只有在忧愁而感伤的日落时分才能感觉到它的显现。有时候，夜里，他躺在床上，被截断的影子升起来，恭敬地爬上窗户，带着脆弱的忧伤潜入他的睡梦。

他痴痴地站在这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看到一个女人走近前来。她看上去很老，也很胖——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在人行道上；不过他很快发现，她的头上戴着四角帽。老年妇女不会戴这种四角帽，除非她是在培养女教师的神学院学习过或是曾经栖身于修道院，只有在这些地方呆过的女人，即使上了年纪，也依然习惯戴着四角帽。当她走近跟前，他站在她的对面，感觉到有一股热气吹拂着他的脖子。露易斯，他从身体里发出了这一声叫喊。那老妇人大吃一惊，向后退了退，脸上拒斥的目光似乎是

要把他打发走,可他却像抓住了战利品一样一把抓住她的胳膊。“露易斯,你不认识我了吗? 我是布鲁诺。”他被自己的声音都吓了一跳。

“不。”

他到她面前低下头,一副无助的样子。

她把脸朝后转去,就像一个被推到一处狭窄的角落正欲寻求帮助的人。不过她马上又把头转了回来,目光直视着他说:“你是说布鲁诺,不会的。”

“是的。”

“天哪! 你是布鲁诺。”

“露易斯,你想起来了,”他抓住自己的手不断地扭动着。

露易斯。女性身体柔软的接触,乡村姑娘细巧的步子,形成了她在镶木地板上最初的足迹。他还记得她到来时的情景,不知所措地站在门口的样子和她从乡下带来的树木的清香。她个子不高,身材瘦小,包着一条色彩鲜明的乡村头巾。仿佛乡间那绿色的田野就附着在她的身后。她的名字就已经蕴涵着羞涩的纤纤少女甜蜜的魔力。在她刚来不久的那些夜晚,当爸爸妈妈出去听音乐会的时候,露易斯就会坐在他身边给他讲乡下的事儿。她的声音里有着粗粝的来自旷野的喉音。他渐渐了解到,她所在的村子坐落在一道山梁上,山梁下面有一条河。这是一条强劲的河流,每年春天湍急的洪水至少会淹死一个人。因为春天总是会发大水。他依然记得当她告诉他这些时脸上的表

情。她本人，也就像她决然离开的那一道山梁一般。就这样，那些遥远的乡村，连同乡村的宁静，通过她，进入了他的睡梦。坦率真诚、毫无遮掩，似乎这就是露易斯脸上的表情。偶尔故事会一直讲到夜深人静的时分。他第一次听说了马夫，关于租借土地的争吵，钉了马掌的马，犁过的能有好收成的土地，横扫田野和坡地的洪水。她说话时的声音一成不变，娓娓道来，这一定就像乡下人讲话的方式，没有多余的表达。那些不温不火的词语宛如自然流出的泉水般细腻温柔。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露易斯一起度过的夜晚变得更长了。在她所住的村庄里发生的不光只有鸡毛蒜皮的争吵，还有怨恨、背信弃义和阴暗的报复性行为。于是，他才第一次留意到她的单纯并非纯粹的单纯，但也许那是由于他自己变了的缘故。

可是那种魔力并没有受到损害，魔力一天天地延续，犹如童话故事中的一个个章节。在他十岁的时候，父母出门去度长假，他第一次和露易斯两个人留在家里。他们睡在客厅里。她睡沙发，而他睡折叠椅。现在轮到她来提很多问题了。关于犹太人她知道一些，但不太多。在她的村子里，人们讲起过关于神奇而可怕的犹太人的故事。讲到一个被犹太人勾引的姑娘，那犹太人是个艺术家。起先她逃到了维也纳，又从那儿跑到美国。好多年都杳无音讯。有一天她寄来了一张明信片，上面说，她改宗了，不再是天主教徒了。她父亲，一个富有的农夫，得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就像被悬崖上的石块击中了。从此以后，露易斯说

道,犹太人就有了胆大妄为的勾引者的名声,要留神他们。说着说着她笑了起来。她从枕头之间发出的笑声这时候听上去有些不一样,也许是因为她吸收了家里的轻声细语让她的声音也变得协调合拍了。

一个个短暂的假日随着一次又一次的音乐会而来临。他会和露易斯一起埋在她的枕头里或者在地板上玩赌牌游戏。于是他清楚地留意到露易斯的身上发生了某种变化。她变得更加漂亮,头发也变长了,可是那率真的眼神,那能够映照出河水的眼神,却似乎变得模糊了。她曾经问道:“犹太人信什么?他们是不是也信耶稣和圣母?”这些问题把他难倒了。在不知所措的情况下,他会笑着说,“他们也喜欢魔鬼撒旦。”她就会用乡下人那种诧异的眼神盯着他,一言不发。然而那个秘密却在不断地延续。那就是露易斯的存在,她的腰肢,她滑动在镶木地板上的大腿。不过最主要的是她的笑声,她那薄薄的、性感的嘴唇轻轻一噘,齿间就会传出富有韵律的笑声。有时他从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被她用胳膊搂在怀中。那时候她睡觉时依然穿着从乡下带来的睡衣,一件亚麻布的衬衣。亚麻布的气味和她身上搽的廉价科隆香水味儿稍微减轻了他的睡意,睡眠变成了某种飘飘然的瞌睡状态。这个秘密他没有告诉过任何人。他的父母度假一回来,那张细细的纤维网也就被毁坏了。露易斯退回到厨房里,他也退回到了课本中。这样一直到即将来临的下一次音乐会。

有时候他们会一起出去漫步。露易斯会说：

“你很娇气,不是吗?”

“为什么这么说?”

“你这个年龄的男孩,在乡下,已经能干活了。”

“在哪儿干活?”

“在地里帮着父母干活。”

“你会带我去乡下吗?”

“乡下有什么好去的,”她笑着说道。

在她来做女佣的第三个年头,那年春天,他的父母出门去度短假。他们一走,那种甜蜜的寂静又从其藏身之处现出身来。他正要准备倾听空寥的家中传来的细语,一个高个子的小伙子出现在门口,样子就像那些夏季度假地的服务生,他的目光盯着露易斯,露易斯的面颊罩上了一层红晕。他每天晚上都会过来,一直坐到很晚。有时候他也会参加到赌牌游戏中来,一边哼着华尔兹舞曲一边说:“这孩子真有头脑,犹太人的头脑,你永远也骗不了他。”

于是他第一次体验到了遭人背叛的苦涩滋味。他还不懂得这就叫做背叛。不过他的双手已经懂了。一天夜里他注意到,露易斯穿上了一件粉色的睡衣,睡衣的前胸还绣着两朵玫瑰。当布鲁诺问她时她告诉他,这是那个小伙子作为礼物送给她的。伴随着这种感觉的还有剧烈的疼痛。

一九三七年的艰难岁月到来了,假日减少了,他们即使出门

也会带上他一起去。他们吵得很厉害。没有一天不在吵架。夜里他埋头于练习本,做习题或是抄写的时候,露易斯就会穿上她的新衣服出门去玩。他在睡梦中听到她回来的声音,听到她上锁并闩好外面的大门。显然她陷入了麻烦。母亲曾把她送到一个外地医生那里。她脸上的那种乡土气息渐渐消失了。她一遍又一遍地发誓说绝不再让那些色鬼碰她的身体。可是她并没有遵守她的誓言。然后是又一次出事,脸上又是一副出事之后的神情,羞愧、无辜和狡黠交织在一起。每次去看过医生之后,她的脸色就会变得更为平和,一道道忧伤的皱纹延伸到前额上。随着那一次紧接着一次的出事,她那种乡下人的表情不见了,她已经变得跟布鲁诺家里人非常相像了,连口音也是。母亲把自己的衣服给她穿。有时候,她看上去就像一个年轻的女学生,愁眉苦脸一副厌学的神情。那些经常到家里来的年轻的叔叔舅舅们说,露易斯最近变得很漂亮。这种说法的真正含义令他困惑,不知怎么这让他觉得很难过。

在那痛苦而混乱的最后一年,当家里已开始难以忍受的时候,露易斯也在学校的秘书课程和那些小伙子之间拿不定主意。不过这并没有持续太久。有一天她偷了他们的冬装和首饰逃走了。苦难的日子使人忘却了对她的记忆,这么多年来,她的名字几乎从他的脑海中完全消失了。

他们走进附近的咖啡馆。她又矮又胖。要不是头上戴着四角帽,他不会认出这就是露易斯,那顶四角帽成了她风韵尚存的

最后遗迹。而她自己——简直成了一只圆滚滚的水桶，堆积的脂肪直往下陷。她的上嘴唇要比下唇更为厚实，她叫布鲁诺的名字时，发音就像一个乡下人。而且——她又加了一句，“感谢上帝。”就像一个星期天常去教堂的女人。

她说：“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已经有一个星期了，”布鲁诺并没有把这句话说完。

这是一家让人匆匆吃饱就走的快餐式小咖啡馆，没有什么华丽的布置，架子上的半导体收音机不停地播放着吵闹的音乐。几个工人坐在吧台边喝着啤酒。两个老头在玩多米诺骨牌。桌上的茶炊散发出浓重的阴郁气息。此刻他从近处看到：她的头发变得稀疏了，太阳穴上刻满了深深的网状皱纹。她的鼻子上有一条浅浅的疤痕和两条突起的毛细血管。“我结过两次婚，但是婚姻并不美满。一个儿子在维也纳，一个儿子在法兰克福，”她简短地概括道。他竭力想在她身上找到熟悉的痕迹。对于她的双眸，他已经没有任何记忆，眼前看到的是嵌入灰白的脂肪层中的一双小眼。她说起了她那个在维也纳的儿子：他在酒吧里工作，以体面的方式谋生。现在他才完全明白。原来那个露易斯已经完全消失了，站在他对面的只是一个年迈的奥地利老妇。她的两个丈夫贪婪地吞噬了她的肉体。现在她不得不承受自己那病态的身形。

就在他一边说着“我很高兴”，一边似乎要站起身来的时候，她突然噘了噘嘴唇，一只手捋了捋自己花白的头发，她那种

乡下人的表情从脸上消失了：那种焦虑的样子，他是多么地熟悉，焦虑延伸到她的手上。就像当时在家里，那一次又一次的惊恐之间的样子。她说："驱逐发生以后，萨洛舅舅曾出现过，喝得醉醺醺的，要求我把他藏在我这里，可我非常害怕，怕让他进我的家门。愿上帝宽恕我。我应该让他进我家的。可是我很害怕。"奇怪，布鲁诺沉思着：这事压得她抬不起头来。

她又接着说道："我喜欢萨洛，胜过其他所有男人，"她轻轻笑了一声，仿佛回想起旧日的荒唐行径。"他从维也纳给我带来透明丝袜和最贵的科隆香水。我还很清楚地记得你家。你家里有善待女人的倾向，男人从来不会向女人举起干草叉子。而我，"她边说边撩起裙子，"我知道大腿上挨上一叉的滋味，你瞧。"

"可这是因为什么，因为什么？"

"因为我的第一个丈夫曾说，我被犹太人家里的礼节给宠坏了。犹太男人从来不会用叉子叉女人的大腿。犹太男人爱女人。"

布鲁诺笑了："为爱而生的犹太男人。"

"是的，我亲爱的，他们是有品位的男人。他们会给女人应该得的东西。女人，说到底，也是造物主创造出来的。上帝在创造她时给了她需求和欲望。我也爱你的母亲。要是我听她的话，也就不会这样沉沦了。可我年轻的时候身上就是有股邪气。魔鬼知道。"

“你认识我们全家人的。”

“你的舅舅都是些非常英俊而又和善的男士。今天我还能回想起我的罪过。”

那种丑陋似乎一下子脱离了她的身体，她默默地坐在那里，自顾自地沉思着。布鲁诺想到那些夏日里常来常往的舅舅们，他们也对露易斯颇为偏爱，这个隐秘的想法此时让他产生了一种愉悦的心情，仿佛收到了一份来自远方的问候。

“我很高兴，”他说。

“我也是，”她说，“我的脑子里想起了许多美好的回忆。”

她并没有问起谁以及谁现在还在世。她脸上微弱的光芒渐渐暗淡，双眼又嵌入了灰白的脂肪层。她的两手在桌子上不住地颤抖，显露出年迈的征兆。

“有那么多要问的，我都不知道从哪儿开始了，”他道歉般地说道。

他的脑子里想不出任何问题。他不同寻常地跟她讲述着这次长途旅行中冗长乏味的细节，讲到那趟慢车和那些醉鬼。他用带有当地口音的德语喋喋不休地说着，仿佛他刚从一次令人厌倦的毫无乐趣的度假行程中归来。当她站起身说她得走了的时候，他也起身说道，他有太多的事想问，而大多数问题他还没来得及问，他很激动，因为这里的一切是那么熟悉，那么美好。他还想接着详细描述一下那趟带他来到这里的火车，但露易斯已经伸出手说道，“我像以前一样，被我的主人管着，我现在在

做清洁工。"布鲁诺朝她欠了欠身,右手在空中做了一个奇怪的,代表胜利的手势。

露易斯渐渐走远,消失在街道的阴影中,他还呆呆地站立良久,心里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种陌生的愉快的感觉,令他不知所措。南面的光线已经发生了转变,冷冰冰的影子滑过住宅前的围栏和教堂的墙壁。露易斯,他不停地自言自语道,你用身体认识了他们所有人。似乎直到此刻他才意识到自己是在这里,在他出生的城市,他熟悉这城市里的每一个阴影,这里一丝一毫的风吹草动都有着如同河水流动一般的韵律。

陌生的快感渐渐消退,一种赤裸裸的忧伤,吮吸着他的肉体,紧紧抓住了他的胸膛。即使当他坐在小酒馆里用白兰地把自己灌得渐渐失去知觉时,那种索然无味的感觉依然没有消散。苦涩的白兰地冲刷着他的喉咙。几个醉鬼坐在他身旁,一边大笑一边哼哼唧唧地发出欢快的咒骂声。

"你能喝多少?"一个醉鬼转头问他。

"一天六杯,"布鲁诺平静地说道。

"那是你一半的工钱,不是吗?"

"那又怎么样?"

"你从没去过戒酒中心吗?"

"我从不去这些地方,"布鲁诺趁着酒劲装出一副老酒鬼的样子。

"那你老婆不会叫救济署的人来抓你吗?"那醉鬼来了

兴致。

“不会，”布鲁诺像本地人那样简短地答道。

“我嘛，”那醉鬼说道，“昨晚我打我老婆一直打到她叫来了救济署的检查员，他们想把我拖到他们那个狗窝里头去。”

“我明白你的意思，”布鲁诺说道，他对自己的舌头又能应付自如颇为自得，“我也不会答应的。”

“我才不在乎那些救济署的检查员呢。可是对她我不会马上原谅。算在我账上，请你喝一杯，为了友谊。”

“我已经灌足了一天的量了，”布鲁诺说。

“你是拒绝喽。”

“不是，绝对不是，我的肚子已经撑死了。”

“我就饶了你了，”那醉鬼说道，“不过有个条件，明天的第一杯——算在我账上。”

“我起誓，”布鲁诺说。

白天渐渐逝去，细长的影子爬入屋内，在地板上展开。与那个醉鬼的一通闲扯也只是在他忧伤的源头上隔靴搔痒。他沿着大街走着，呼吸着傍晚的空气。白兰地填满了他肚子里的空隙，他觉得有些饱胀。两个身穿超短裙的妓女站在街角。她们看上去似乎对自己暴露的穿着有些羞涩。

光线越来越昏暗，从树丛间可以看到商店已经拉上了百叶窗。有人问了一声几点了，一个女人答道，七点。华灯初上的夜晚，散乱的碎步，两个害羞的妓女——让他这时候觉得有几分愉

悦,仿佛一下子忘却了一场刚刚经历的灾难。他算了算,发现到旅馆大约还有半个小时的路。等回到旅馆他要坐上一会儿,喝一杯咖啡,还要浏览一下报纸。

他想起了露易斯,想起刚才提到那些被人遗忘的名字时,她那突然张开而又重新陷入病态的脂肪层中的脸颊。此时他仿佛只看到她那颤抖的上唇,就像面对着什么可怕的动物。咖啡馆里的蛋糕,她是用两只手切开的。好像那不是蛋糕,而是什么坚硬得打不开来的东西。回到旅馆他既没有喝咖啡,也没有看报纸。疲惫的感觉征服了他。蒙胧中他只听到女佣们在厕所里的窃窃私语声和她们时不时脱口而出的粗话。

6

已经有两个星期了。早上他离开旅馆，直到晚上才回来；他把头靠在枕头上，客房女佣的低语声将他送入渴求的梦乡。当他从睡梦中醒来时，却连梦中的一个场景都回想不起来。他再一次站在广场上，步行走过哈布斯堡大街，在公园的长椅上坐下。他坐在那里，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当雨点突然降落到这个城市时，他离开长椅，靠墙根站着。

这个季节的空气纯净而又让人困乏，不过他忍住倦意，沙沙作响的树丛间任何一丝微小的动静都没有逃过他的眼睛。中午他走进隆卡的"花束"咖啡馆。隆卡已经那么老了，身体也是那么虚弱，甚至连客人点了什么都记不住。当他告诉她要一杯加菊苣的咖啡时，她大声地重复着"加菊苣的咖啡"，生怕在去厨房的路上就会忘记。中午时分没有一个人走进这里。他坐上一两个小时，一边呷着咖啡一边追踪着那些细长的影子，从他童年

时起,那些影子倾斜着进入窗口的样子没有丝毫变化。当影子逐渐消失后,他凝神注视着门口,期待着一个熟悉的脚步。那扇牢固的大门没有发出一丝声响。光线越来越暗,褐色的大门在他的眼中越发显出棕黑的色泽。

可是昨天他明明发现了一丝细微的、出人意料的动静。那棵栗树的影子猛地横扫到长椅腿上,又立刻卷起来退回到树干上。这个微小的动静重复了好几次,于是他看到那棵栗树旁站着一个人。由于那人是背朝着他站在那里,他还以为那是疯子布劳姆,可是马上他就发现那不是他。那个人似乎是一个熟悉的人,但还没有熟悉到让布鲁诺有勇气上前打招呼的程度。那人一动不动。宽大的上衣让他的影子在周身飘动。他站立了许久才把身体转向一边。

这个迟缓的动作唤起了布鲁诺某种不平静的感觉,但还只是外在的不平静。稍过了片刻,出现了两个穿着老派的女人。她们在议论着某个行将解体的机构,不过布鲁诺觉得她们是想转移他的注意力。他站起身,她们仍在继续谈论着刚才的话题。等他走远后才清楚地听到:她们谈论的是一度被学校家长联谊会接收的植物园。他母亲曾在联谊会里当过两年的会员。现在由于管理不善造成了冲突,联谊会想要摆脱这个责任。布鲁诺笑了,仿佛一阵怡人的清风吹拂在他的身上。

他离开公园,步入小巷。已经是晚上了。那些低矮的被爬山虎所覆盖的房子里,家庭的嘈杂声伴随着刚刚煮好的咖啡热

气升腾起来。此时,他才第一次感觉到这里的一切,即使是夜晚那细微的动静,也让他觉得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他泰然自若地注视着这些响动,就像一个在风平浪静的季节中注视着熟悉的河流的人。他有了一种冲动,想要去敲开某一家的大门并说:“我在这里。你们一点儿也想不起我了吗?”

奇怪。他小的时候就曾时时做过这样的梦,他回到故乡的城市,却没有一个人认识他,他只能惶恐地四处游荡,因为那种无声无息的拒绝承认其存在的疏离感。关于这些梦,他后来花了很多时间进行思考,这些梦境是如此的不合情理,只有在那些最荒唐的噩梦中才会出现。

这里还残留着一些好几代以前就改宗了的人。在刚刚入夜的此时去找他们的话,他觉得,不知为什么,似乎更是一种不智之举。就这样,他冷不丁地发现自己又来到了希尔的那个洞穴。希尔不在。廉价、粘腻而悦耳的旋律从扩音器里倾泻出来。一种空虚的感觉混合着烟草的酸味驻留在这个昏暗的空间。

第一杯酒下肚后立时让他放松了下来。他准备再要上第二杯。他刚转过头来就看到:希尔来了,身后还跟着一群年轻人。要不是那两个姑娘,他们的出现不会给人留下任何印象。像这样一群年轻人,你可以在任何一家酒吧里见到。他们走向右面的一个角落。那里放着一张长椅子。

“坐吧,弟兄们,坐,”希尔用女招待的口气说道。

他们故意横七竖八、漫不经心地朝椅子上坐去,希尔一下子

发现了他——就朝着他走过来说：

“你在这儿。我带了一群年轻人过来，一群不成熟的年轻人。你一点儿也不想认识他们吗?”

“他们是谁?”他吃了一惊。

“我们是一伙的，”希尔用酒吧女郎的殷勤口气说道，“一群最讨人喜欢的混血儿。”希尔兴致勃勃地大声宣告：“来认识一下，从耶路撒冷来的布鲁诺。”这一声招呼并没有引起任何反响。他们是来庆祝埃尔文的生日的，正沉浸在他们的欢乐之中。不过一个不修边幅、身材瘦小、额头上闪耀着褐色汗珠的姑娘，说了一句：

“多有意思，从耶路撒冷来。”

没有问一声是否允许，她就坐到了他的身旁。她窄窄的脸盘上没有一点光彩照人之处。架在鼻梁上的金属框眼镜只是更加突出了她的一双小眼。

“耶路撒冷，”她说，连头也没有转向他，“那儿有什么?”

“一座和所有的城市一样的城市，”布鲁诺冷冷地说道。

“那么它的荣光和神圣又体现在哪里呢，”她漫不经心地问道。

“就这样存活在那里。”

“要是这样你又怎么会到这里来？如果可以问的话。”

“这是我出生的城市，我来看看这座城市。”

“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由同样的泥土构成的，不是吗?”

“那你呢?”

“我是个平平常常的混血儿。一点儿不掺假的混血。”她轻轻地发出一声哂笑,圆圆的镜片在她的脸上泛着光。显然:她细心地包藏着自己的秘密,并不想认真地谈论它。

这时候,酒吧里逐渐罩上了一层欢快的光晕。

吧台边站着那几个侏儒,正在调试着他们的演奏乐器。他们的样子就像是遭到大人训斥的孩子。

“你见到了不少熟人吧,”她用一种似乎无意提问的语气问道。

“没有,”布鲁诺说,“我离开这里的这些年,一切都改变了。”

“你叫什么,要是可以问的话?”

“布鲁诺·A。这对你是否有什么意义?”

“没有。毫无意义。”

她的伙伴们已经聚集在白兰地酒瓶周围,他们七嘴八舌的话语从远处听上去似乎只有一个声音。那姑娘把目光转向他们。显然,她对自己此刻能够隔开一段距离观察她的同伴颇为欣赏。

“苏茜,过来看,有个新来的男人,”她朝那个胖胖的女孩喊道。

胖女孩拿腔作势地转过身体,说:

“谁在叫我?有谁还在关心我的存在?”

“是我,”那姑娘说。“这儿有个新来的男人。从耶路撒冷来。这是否对你有什么意义?”

胖女孩的目光盯着他说道:

“我叫苏茜。一看到我的身材就能认出我了。这个人,你说是从耶路撒冷来的。有意思。真有意思。不过说到底,为什么呀?”

“你在说些什么?”另一个姑娘问。

“我忘了,”苏茜用开玩笑的口气说道,“有这样的城市,也有那样的城市。”

“这个人也是在本地出生的,和我们同属一个种族,要是我没说错的话,他是个不掺杂质的纯种。”

“如果是这样,我要向他致敬,”苏茜说着敬了个礼,“请原谅我们的低贱。我们只是些混血,充斥着不完美之处。”

那姑娘起劲地笑了起来。苏茜问道,“你笑什么?”

“什么意思嘛,瞧你真是越来越会说话了。”

同一时刻埃尔文的手里已经揽着两个姑娘,正忙不迭地亲着他的脸。那一群人怂恿着她们,她们也就一次又一次亲吻着他,并发出响亮的声音。

他觉得肚子里泛起一股胃酸。现在看来来到这里是一个更不明智的举动。这些寻欢作乐到荒唐可笑地步的人,并没有让他高兴起来。白兰地让他有点头晕目眩,他的右手不听指挥地随着音乐的节奏而挥动。

“你到这里来干嘛?”苏茜问道。她的声音里带着暧昧的气息。

“什么也不干。”

“我们可得好好照顾他,”苏茜扭头对她的朋友说。“要不然,他会给我们的城市带来坏名声,他会说,这里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欢庆的气氛越发强烈。酒精的作用似乎显现了出来。一个高个小伙子说出各种各样的广告词儿,所有人跟着回应,同时两腿还在地板上做出像马一样奔跑的样子。侏儒乐队这时演奏着悦耳的曲子。苏茜做了个鬼脸,似乎尝到了什么难吃的东西。

“也许你们可以结束了吧,”她恳求道。“这种过分的感情宣泄快要让我发疯了。”

布鲁诺站起身。音乐声压迫着他的太阳穴。他想再一次一个人独处。昨晚上在这里有多好,没有一个人来这儿。昨晚上酒精舒缓地渗入他的体内,他能感觉到酒精在他全身器官中的运动。在回旅馆的路上的确有一个老妓女死缠着他,毁坏了他软绵绵脑袋里的细小血管。他冲她发火,对她说了粗话。无聊的粗话也没能让他平静下来,一路上他一直想吐。

他的脑子还在无序地运转着,他看到了苏茜的脸上不断变幻的灯光,她用双手捂着脸,绷紧了皮肤,音乐似乎让她感到不耐烦,她的脸上又做出厌恶的表情。她的表情中有着某种让他熟悉到心痛的东西。

“等等，”布鲁诺说，仿佛有一堆挡住视线的障碍物正从眼前移开。“我真的一点都不认识你吗？”他对自己的勇气也一下子吃了一惊。

苏茜转过头来。那熟悉的表情消失了。她那不太雅观的丑模样突显出来。“也许吧，”她说。“我在大陆旅馆做过服务员。夜里还在酒吧里做女招待。我还在厨房干过一阵，不过后来他们就升了我的职。我就再也没有屈尊跟那些厨娘们为伍了。你也许会觉得，我怎么在这么多杂七杂八的地方干过。”

“可你叫什么名字？”他直视着她的双眼。

“苏茜。我告诉过你。一个单调乏味、平淡无奇的名字。对我毫无意义。真是可恶。”

“我指的是你家里姓什么。”

“我看你是想要盘问我了。干吗不？我对接受盘问早就习以为常了。那么，我就告诉你我姓什么。你得知道我可有两个姓氏。我会告诉你我那个保密的名字。我那个秘密的名字叫做苏珊·考夫曼。我的父辈和父辈的父辈都是商人，经销没药、乳香和藏红花的商人。可爱的商人，机敏的商人，从遥远的地方运来商品的商人，就像人们在书上说的那样。拥有漂亮女人的商人。优雅的商人。你笑什么？怎么，这让你觉得很可笑吗？”苏茜一口气说道。她把想到的溢美之词都堆砌了出来，最后说道，“这样的商人正是每个女人所向往的。”

布鲁诺低下头。这些话简直就像狠狠给了他当头一棒。虽

然还只是隐隐约约地猜测，站在他面前的就是萨洛舅舅的私生女，但在他心头已经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让他在团团迷雾中确信这就是事实。

“怎么你知道这个名字，了解它的历史，或许你也对这些名字感到恶心？”她继续咄咄逼人地说道。

“我认识一个叫考夫曼的男人。”布鲁诺抬起头。

“这么说你认识我父亲。他是犹太人。和你一样的犹太人。有两个女人的犹太人。因为他喜欢女人。我是他的情妇生的。”

萨洛舅舅。许多年来，对于他的记忆和对于父亲的记忆已经一起被埋藏于北方那些寂静、阴冷而潮湿的地窖中。那个快活的，嘴里总是滔滔不绝的舅舅，在女人堆里混熟了的舅舅，每年都会闹出些丑闻的舅舅。

苏茜又用双手遮住了脸，这样的姿势却能让人看到她修长的手指。

“我母亲把这个秘密保守了很多年，”苏茜把脸转向她的女友。

“这让你觉得吃惊了吗？”那姑娘问道。

“有一点儿。我一直就觉得奇怪。现在我明白了，现在我是个聪明人了。”

“有意思。他们怎么对你说的？”

“一开始他们对我说我父亲在战争中死了。”

“他们对我说,”那另一个姑娘说道,“我父亲是在河里淹死的。”

“你生气吗?”

“生气? 干吗要生气?”

“我嘛,”苏茜说,“我可是怒不可遏。我有一年时间没和妈妈说过话。”

侏儒乐队坐在角落里静静地演奏着。布鲁诺对姑娘们产生了一种饱含悲哀的亲近感。苏茜依然绷紧着脸。

“你在哪儿认识的考夫曼? 原谅我这么问你。毕竟,我是他的女儿。就算不是合法的又怎么样,我不还是他的骨肉吗?”

“他是我舅舅,”布鲁诺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苏茜瞪大了双眼,抬起她的右手,然后又把手放到桌子上。某种冷静而又惊异的表情从她脸上一闪而过,她说:“难以置信。”不过马上,似乎是担心自己会失态,她把头扭向那个欢笑的角落大声宣布:“我有一个爆炸性的新闻。”

沉浸在欢乐之中的埃尔文已经有些醉意,他听到了声音问道:“什么? 什么新闻?”

“我找到了失散的表兄。”

“是哪方面失散的?”

“是我身上的犹太血统那一部分失散的。”

所有人都站了起来,以轻巧的步子绕着桌子转了起来。埃尔文说道:

“你为什么不亲亲他?”苏茜毫不迟疑地靠近布鲁诺,双手抱住他的脸亲了一下,说道:“我的亲骨肉,我的表兄,我的精神骨肉。我可以这么说吗?”

“你疯了,”那另一个姑娘说。

埃尔文还不罢休,又命令道:“现在你该起誓,起誓忠诚于你精神中的一部分,那神秘的一部分。”

“你想要她怎么样?”

“宣告她的信仰,”那醉鬼用力地说道。

苏茜卷起她的裙子,露出她那丰满的大腿,说道:“我的腿上没有任何一个部分继承了犹太人的神秘。”

他们端来了酒瓶,倒满酒杯,就喝了起来。没有人问几点了或是怎么回事。苏茜从两个杯子里轮流一口接一口地喝着,立刻又开始滔滔不绝起来。她又回到了刚才的话题,像表演儿童剧一般讲述着她的先辈们的故事,他们是一些身材高大、皮肤黝黑、举止高雅的商人,从东方国家带来名贵的女士香水。

埃尔文说:“我有个秘密的名字叫霍夫曼。也就是说我的先人是王公贵族出身。”

种种千奇百怪、生疏新鲜的醉语飘荡在空气中,与忧伤的气氛展开了搏斗。布鲁诺能听懂这些醉话,就像有人能听懂夜里噩梦中的暗示一般。骚动加剧到了顶点,另外有个人站了起来,他的脸上布满了尖利的线条,他说他厌恶参加这种仪式。无论如何,他也不会出于简单的生物因素而搞这种神秘的宗教膜拜。

他那细长的鹰钩鼻子下弯,表明他具有相当的辩论能力。

苏茜吃了一惊,靠近他说道:“是什么让你觉得不顺眼?”

“这种顶礼膜拜的样子,”那人平静地说道。

“我,”苏茜说道,“我要当着大家的面公开宣布,我那未曾谋面的父亲是我最亲的亲人,比所有的奥地利人都要亲。我要朝他行跪拜之礼。就像这样。”说着就立刻跪了下来。

“我不会这样。”那个瘦子说。“我不。”

“我,”苏茜说,“要伏下我的整个身体,就像这样。我要说我失散的父亲,那个爱着很多女人的父亲——他是我永远爱的人。”

“我不。”那个瘦子重复着他的话。

“你想要她怎么样?”另外那个姑娘打断了他。

“我不会向任何人顶礼膜拜的。”

“我,”苏茜歇斯底里地说,“我宣布流在我的血管里的犹太人的鲜血,那是鲜活的血,是美丽的血,是我所热爱的血。”

起初并未干预的酒吧老板冲着这个角落说道:“这里不是动物园里的笼子。请保持平静。”

柜台那边传来的警告只是起到了煽风点火的效果。飘浮在空中的醉话此时变得愈发疯狂了。那个姑娘的苦苦哀求毫无用处,“你们要把埃尔文的生日聚会搞砸了。”那两个女孩已经从埃尔文身上下来了,没有了她们他显得有些笨嘴拙舌。苏茜双膝跪地,不停地俯倒在地,一边还大声宣告着:“我在向失散的

父亲跪拜。”

由于酒吧老板一次次的警告不起作用,出来了两个身强力壮的服务生,一言不发地把他们赶到了门口。他们并未抵抗就走了出来。

布鲁诺被丢弃在原地。时间已经是七点了,酒吧里笼罩着一种空虚的寂静。从酒吧外面传来的只言片语只是增加了空虚的感觉。白兰地留给他的淡淡忧伤逐渐散去。而另一种忧伤,迟缓而笨重,倾泻到他体内的各个器官。

希尔走近他身旁说道:“一个惊喜。不是吗?”

“不同寻常的惊喜,”布鲁诺说道。

“混血儿就是像他们那样的。你没办法改变他们,”希尔用细细的带着歉意的女性声调说道,“不过他们还是挺讨人喜欢的。”

“你跟他们很熟吗?”

“什么很熟?我们是一起长大的。我们自己发现了自己。这种联系从那时候起一直保持到今天。”

“那苏茜呢?”

“我们一起长大的。就像乡下人常说的,我们是吸着同一头奶牛的奶长大的。”

酒吧老板示意她到麦克风前来,她一路蹦蹦跳跳地跑向吧台。

那种迟滞的忧伤还在折磨着他，他感觉到有一段微弱的旋律渐渐向他靠近。他套上外衣，没有跟希尔打声招呼——就走了出去。刚刚入夜的灯光默默地从窗户里流淌出来。除了流淌的光线，没有一丝动静。他穿过一条又一条街道，直到他站在背教者菲尔斯特亮着灯光的商店门前。菲尔斯特健壮的爷爷还在弗朗茨·约瑟夫统治时期那些平静而轻松的日子里就改变了信仰。尽管忠诚于新的信仰，但他并未中断与犹太人的联系。他的儿子们也依然跟犹太人见面。人们总说菲尔斯特一家仍然保持着某种犹太特性。现在那个孙子就坐在宽敞的烟草店中吸着烟斗，就像那些饱食终日的奥地利人一样，纵容自己的肉体尽情享用酒精饮料和烟草。商店里空荡荡的。

"我要进去，"布鲁诺说着走了进去。

大门上方的铃铛发出声响，就像过去的老商店一样。浓重的酒精和烟草气息扑面而来，"先生，我能给您推荐什么吗？"老人问道。

"伊甸园烟叶，"布鲁诺学着他父亲的样子说道。

"已经好多年没货了。您从哪儿来。"

"这里是我出生的城市。三十年前我离开了这里。"

"让我想一想看。"

"我叫布鲁诺·A。我的父亲是……"

"请到我跟前来，让我再仔细看看您。"

"犹太人，"布鲁诺把这个词抛入了这个静止的空间。

“我明白，”老人说道，苍老的眼神一下子凝固了，仿佛有人在柜台上扔下了一只活的怪兽。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他一边说着，双手一边在柜台上颤抖。

“我经过店门口，有股烟草味扑面而来。”

“我的兄弟。我的兄弟。”老人喊道。“是我自己没有勇气。”他嗫嚅着说道，似乎整个身体就要跪倒下去。不过他还是站住了。直挺挺地站住了。

“我没有故意要打扰您的意思，”布鲁诺说道，“就在刚才我见到了我的表妹。我的萨洛舅舅的私生女。我的萨洛舅舅，你一定还记得他。”老人大张着嘴，似乎准备把所有的信息都从嘴里吸收进去。布鲁诺继续说道:“是个多好的姑娘。看外表一点儿也不像他，不过她的手指倒确实跟他一模一样。”

老人颤栗着。这样的噩梦他一定没有预料到。

“是我自己没有勇气。我不想请求怜悯。可是我自己就是没有勇气。”

老人做了个奇怪的动作，似乎是要弯腰鞠躬的样子，不过他只是抓起一个烟草盒子，并把它放到货架上。“我到这里已经有两个星期了，”布鲁诺说，他的视线一直没有离开老人颤抖的双手。“已经两个星期了。见到舅舅的女儿我有多么高兴。尽管她长得并不像她的父亲，可是你瞧，她身上的一切又都那么像他。”

老人的脸色释然了，一丝微笑隐隐地展现在他的脸上，不过这微笑转瞬即逝。因为他立刻就腾出一只还在颤抖的手来，挥手击打着自己的前额。“这就是那只卑鄙的爬虫。他的名字叫奥古斯特。这就是那只卑鄙的爬虫。他的名字叫奥古斯特。”布鲁诺有一刹那想要靠近他并对他说抱歉。但是老人觉察到了他的意图，说道：“不。”布鲁诺走出了店门。

菲尔斯特一家都是些正直的人。不同寻常的正直。病态的正直。在那些糟糕的日子里，他们与所有的被驱逐者站在同一个队伍里。他们淡然地站在封闭的会堂里的样子，最后一次让那些形容枯槁的人们心中激起了敬佩。他们有四个人，在去明斯克的整个路途中他们一直没有摘下头上的帽子。并不是所有菲尔斯特家的人都拥有这样的力量。奥古斯特留在了他的店里。一直到现在他依然坐在店里。每天夜里那四个背教者的身影都无法从他的面前消失，他们直挺挺地站在会堂中，仿佛遭受训诫的士兵。在那以后，即使是在严寒和接近死亡的时刻，他们的嘴里再也没有发出过一点声音。

7

以后的几天都差不多一样，天也没有下过雨。树木褪去了茂盛的枝叶，飘零的树叶如同薄薄的雪花覆盖在地面上，可是布鲁诺自己已经失去了平静的心情。从河上吹来的湿润的微风也无法缓解他紧张的心绪。他会一连站上几个小时看着菲尔斯特商店的店门。奇怪，恰恰就是这扇店门，这扇不为人注意的未经装饰的店门，此刻吸引着他的视线。有好几次他已经准备走进去请求老人的原谅，可是却总也迈不开步子，正因为他一直没能走进去，这扇店门像一块磁石一样吸引着他。仿佛他的秘密就被埋藏在那里的阴影之中。大部分背教者都过世了，只有那些资格最老的人依然还活着。难道他们一点儿也不再怀念他们失去的根基。说这些已经毫无意义。他知道，只有菲尔斯特一家人，只有他们是堂堂正正、大张着眼睛走向了死亡。其他的人只求活命，完全被活命的思想吞噬了。

在希尔的洞穴里他又一次见到了苏茜。她高兴地冲着他大呼小叫："我失散的表兄，我亲爱的表兄，"说着就在他的脸上亲了起来，让他不知所措。她那张丰满的，环绕着一副银色眼镜的脸庞，显出酒吧女郎的那种轻佻的神情。她的女伴坐在她身旁，细声细气地笑着。就像有人在她耳边轻轻地说了什么淫词浪语。现在是午后时分，酒吧里空荡荡的。苏茜的女伴把两腿搁在邻座的椅子上，述说着小时候她以为杂种这个称谓是一种表示喜爱的称谓。当有人问她："谁在那儿?"她就会答道，"那个杂种。"学校里的孩子都喜欢她，因为她游泳很棒。后来他们就管她叫杂种鱼。"我还记得，"苏茜说道，"我也管你叫杂种鱼来着。"她们聊了很长时间。布鲁诺没有插话。冰凉的啤酒消除了他的饥渴，他的感觉也变得迟钝起来。脑子里也不再有任何想法打转。

突然，苏茜的女伴转身问他："你怎么不说话?"

"不为什么，"布鲁诺说，吃了一惊。

"你在打什么主意?"

"没什么。什么也没有。"

"要是那样的话，你怎么一句话都不说?"

"因为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你给人的印象就是个心怀鬼胎的家伙。"

"别在意，"苏茜打断了她，"她在做梦。"

"我没有做梦。我绝对清醒。"

"你想要他怎么样。"

"他让我觉得不顺眼,"她还是固执己见。

"他什么事也没做过,"苏茜试图让她安静下来。

"要是那样,他为什么会出现在没有人期待他出现的地方。犹太人应该更加谦虚谨慎。"

"你在说些什么?"

"我说的是我心里想要说的话。我受不了犹太人。他们总是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

苏茜双膝跪地,双手抱住她的身体:"镇静些,"她小声说着,"镇静些。"

布鲁诺站起身。此刻,叶片宽大的吊扇发出的嗡嗡声如同一只被捕获的昆虫。他示意付账单。苏茜做了个奇怪的动作,用手指向出去的大门。"傲慢的家伙,"那个声音依旧尾随着他,还有那急促的喘息声。奇怪的是,那声音并没有让他觉得受到了伤害。他走出门口来到了大街上。五点了,低低的、斑驳的阳光铺洒在人行道上。从河里传来几处零落的声响,之后便轻而易举地消散了。远远地他看到露易斯迈着沉重的步子走过来,刹那间他想迎着她走去,可又想起上次碰到她时她问的那句话:"你还在这儿?"

他站在那里的时候,那些居民们一对对接二连三地出现了。显然现在是他们走出家门去咖啡馆的时刻。瞧,这是施特尔茨,那是法克曼,布鲁诺有些激动,他们是一起上的学。他们从他面

前走过。他们那温和的、拉家常般的声音压在这一片沉寂之上。

不过布劳姆完全认出了他。他坐在长椅上，舒适地靠在他的手杖上，平静的目光远远地追踪着什么。一抹微笑从他的胡须上溢出。他们的目光刹那间相遇随即又分开。

夜里他回到了希尔的洞穴。希尔嗓音嘶哑，面容憔悴，小小的脸上布满了忧郁的青筋。脸上仿佛被人剥去了一层皮。布鲁诺把发生的事告诉了她。希尔说，她们俩总是紧紧相连，谁也离不开谁，已经好多年了。苏茜充满活力，而她的女伴却有抑郁的倾向。她们合住在一间租来的房子里，女房东每个星期都要说她们的坏话。有什么办法。她们就是这样纠缠在一起。难道这是什么重罪吗？

希尔把手搁在桌子上。手指比她的面部传达出更多的东西。疲惫的手指。此时此刻，布鲁诺对她产生了一种温暖的亲近感，不带有情欲，他们默默地喝着酒，希尔突然说道，“我们是不是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只有这里了？”

“你脑子里想到什么别的地方了吗？”布鲁诺问。

“我不知道。我太需要一个能把我冲刷得干干净净的地方了。就是那种没有欲望、也没有什么有组织的娱乐的地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在试着理解。”

“有这样的地方存在吗？一定存在的。只不过不是为我而存在。有时候我觉得，有个犹太魔鬼正折磨着我。我可以这么

说吗?”

“你相信有魔鬼?”

“不相信。我祖母说过犹太人总是忍受痛苦,所以他们能与人为善。我的姐姐伊芙琳比我混得好。她也算不上完全成功。结过婚又离婚。现在她在施蒂夫特街上有一家香水店。她比我有勇气。”

“现在你告诉我。我祖母说过:眼里看多了人间的苦难,却不肯给人以施舍的人。到他临死的时候人们不会说,正义会把他从死神手中拯救回来。你能理解这话吗?每次她都重复这几句话。我记得,她还说过,父辈吃了没有成熟的果子,儿子们的牙齿就会钝了,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们一直坐到很晚。希尔讲,而布鲁诺则一言不发。她的声音一点一点地穿透了他。她的脸色渐渐暗淡,又暴露出清癯的面容。她站起身说道,“说得够多了,我要去睡了。”

当他站到门口,她又问道:“你有硬币吗?我连一个子儿也不剩了。也许你可以借给我一个硬币。”布鲁诺掏出一张五十马克的钞票给了她,她没有表示感谢,只是说了一声,这太多了。

当天夜里,他躺在床上意识到,他在这里的逗留行将进入尾声。一片绿色水域的光芒紧紧抓住了他的睡梦,他在水中费力地漂流。水底下,在那些棕色的植物丛中,躺着又长又重的布劳姆。一只褐色的眼睛,警醒地睁着,不停地追踪着布鲁诺的身影。我只要轻轻推一下,就能让自己远远地离开他好几里,布鲁

诺自言自语道。他确实想这样推一下，但在他尝试着想要移动上肢的时候却感觉到，他的一双手如同扎下了根，再也无法轻易地拔出来了。

8

接下来的几天一直是雾蒙蒙的。坐在公共长椅上已经开始让他觉得不太舒服了。宽阔的影子在树丛间游荡，令他心绪不宁；尽管没有一个人向他打招呼，不过他觉得，现在谁都认识他了。他时不时觉察到有目光停留在他的上衣而又随即滑过。

在面包房前他遇见了露易斯。她问："你还在这儿？"她那种惊讶的表情也许并非有心要伤害他，不过还是刺痛了他。她就像一个经过了多年的腐朽城市生活洗礼的农妇，城市生活在她身上打上了几处丑陋的印记，不过这不包括她走路的姿势。她走起路来依然迈着农民式的重重的步子。她没有问，你在干什么或是你打算要干什么。显然他的出现并没有让她动心。不过他和布劳姆还是进行了几次颇有启发的谈话。布劳姆没有完全恢复平静，不过他坐在那里就表明他还是具有某种对话的意愿。几天前他在磨坊巷遇到他，那是一条狭窄而美丽的巷子，充

满了爬山虎的气息，这个季节开着的紫花使巷子里充满了静谧。布劳姆坐在酒馆门口的椅子上。这是傍晚的时候，漫无目的的游走让布鲁诺疲惫不堪。说实话，他正准备结束一天的活动赶快回到旅店。

“你好，布劳姆先生，见到你很高兴，”布鲁诺直截了当地冲着他说道。

“你好，”布劳姆说着，脸上露出一丝羞怯的笑容。宽及整个面部的胡须不知道为什么看上去有些稀疏。

“你还认识我吗？”

“当然，”布劳姆说。“你是作家 A 的儿子。我曾经是你父亲的崇拜者之一。”

“那现在呢？”

“我不崇拜任何人。”

他的声音十分清脆，仿佛那声音不是想让人倾听而是要人打断的。

“那你为什么要躲着我？”布鲁诺鼓足了未曾预料的勇气。

“我？”布劳姆惊讶地说道，“难道我没有回答过你的问题吗？”

此时，他才第一次近距离地看着他，一个上了年纪但却依然强壮的男人。他的脸上闪现着某种心酸而真诚的表情。早年的人生岁月在他面部刻下的松弛线条已被脸上的须发所遮掩，可是他做了一个动作，他似乎在极力忍住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变形

后就成了肩膀的一种耸动。布鲁诺准备转过身去。

“我,”布劳姆重复说道,“我没有回避任何问题。”

布鲁诺显然把这一回答当作了某种妥协,或许是进入对话的一条窄窄的缝隙,于是说道:“几天前我遇到了萨洛舅舅的私生女。你一定还记得他。”

“那又怎样?”

“让我特别激动。她的外表并不怎么像他,不过她的手指真的是和他一模一样。”

布劳姆浓密的眉毛向上提起,这是表示疏远的表情,表明他要把这几句过于向他表示亲近的话语推拒开。

“你一定还记得我的舅舅萨洛。”

“我当然记得他。他是个浪荡公子。”布劳姆咧开嘴奇怪地笑了一下,他站起身来,似乎对这无聊的对话已不屑一顾。

第二天他又碰上了他,就在离这条巷子不远的地方,而这次等待他的却是一种出乎预料的情况。

布劳姆对他说道:“你还在这里。”

“还要再待几天。”

布劳姆这时候看上去似乎更加壮实了。身上也看不出任何疯疯癫癫的样子。他的阔脸上现出老年人特有的怀疑的表情,似乎生活已经让他的期望和信念都化为一场空。

“你在干什么?”布劳姆问。

“没什么。随便走走。”

“你这样不觉得闷吗?”

“不会的。有不少地方唤起了我的回忆。”

谈话正要转入心平气和的阶段,布劳姆突然抬眼看着他说道:“要是我就不会回到这里来。”

“为什么?”

“因为这里的女人很烂。”

“我不明白。”

“难道你的眼睛被蒙住了吗?所有这些女人。所有这些女人。我老婆,我给了她完全的信任,她却以最为可耻的方式当了婊子。我立刻把她赶走了。现在你明白了吧。永远不要信任一个女人。宁可自己种棵树,养条狗。现在你该明白了吧。你看什么。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我猜是吧。”

“不要说猜这个字。这个字眼令我痛恨。不忠是女人的天性。”他的两条腿直直地立着,刚刚隐藏起来的疯癫的神情又出现在他的脸上。“不要说我猜。我警告你。”

这几句完全出乎预料的尖刻话语让布鲁诺神情沮丧。他一下子呆呆地愣在那里,就像一个面对一堆散落在地的贵重物品不知如何收拾的人。过了许久,他在暮色中来来回回地走着,这个时节的暮色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低矮的围栏上已笼罩着入夜时的暗影。奇怪。与布劳姆毫无意义的对话却无法让他平静,只有当他站在那座小山上,那座人们称之为被抛弃的小山

时，与在这个繁茂的季节依然稀稀落落、高不及膝的灌木丛的近距离接触中，他胸中的狂风暴雨只有到了这里才得到了平息。只有一片死寂。没有任何响动，连一只小鸟也没有。水流冲过狭窄的银色河床，宛如一条金属制的人体肌肉。他和父亲曾在夏末时节来到这里。由于他们每年只来一次，这个地方就像从来不会重复的奇景一般铭记在他的心中。被带到这里来的有斯蒂芬·茨威格，瓦色尔曼和马克斯·布罗德[①]。他们也被这里所渗透出的纯粹和简单所触动。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只有这座小山和点缀其上的稀疏的灌木丛。那条小溪也跟它们一样是纤细的。

最后那一年，作家们没有再来，父亲与那个毛贝尔教士在那里消磨了许多时间。那些冗长的、令人精疲力竭的交谈，一直持续到深夜。毛贝尔认为犹太人必须尽快移居到巴勒斯坦去。在那里他们应该开始他们的新生活。他的父亲对于锡安主义[②]的主张一向缺乏热情，对这一方案不以为然，还宣称，这只不过是换上了新伪装的反犹太主义。

毛贝尔教士一遍又一遍地宣称，他所说的只是一种宗教愿望，一种历史的必然。犹太人，即使他们并不愿意，也必须成为引路人。引路人。上帝的选民。一听到这些词儿他父亲就拉长

① 马克斯·布罗德(1884—1968)，生于布拉格的犹太作家，卡夫卡的挚友，著有《卡夫卡传》。

② 也译作犹太复国主义。

了脸，就像尝了什么难以下咽的食物。不过毛贝尔教士还是不断地说，你很快就将看到真相大白于天下。他的脸上流露出严肃而坚定的神情。布道者特有的坚定。

最后一次谈话，也是其中最艰难的一次，也是在这里进行的，就在这座小山上。周围的一切都在诉说着敌视、疏远和看不见的隔离。诚然，没有人知道这些麻烦将会带来什么样的结局。可是，那种痛苦的滋味已经四处流散。毛贝尔恳求道："你们为什么不离开这里？为什么不移民到巴勒斯坦去？"他的语调既热烈而又现实。教士还在堆砌着劝服的理由，父亲却脱下帽子说道："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不会移民的。我宁愿遭受迫害和羞辱也不会去移民。我什么坏事也没做过。我是个奥地利作家。谁也不能剥夺我的这个头衔。"

大为震惊的毛贝尔低下头说道："我不明白你怎么会这么顽固。"在一路沿着哈布斯堡大街走回来的路上，他们没有再说一句话。父亲的手不住地颤抖，一直回到家都没有停止。母亲给他端来了鱼，并问毛贝尔教士是否能帮助他们，父亲简短地答道：我不是靠他那张嘴才能活下去。

9

雨突然间就下了起来，夏天的细雨。布鲁诺穿好衣服，来到城里。时间还早，广场上看不到什么人。几个迟到的中学生急匆匆地从人行道上跑过；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动静。细密的雨丝在街道上切割出一块块润湿的碎片。

最后那一年里，一次接一次的考试，背负着沉重的书包，他徘徊在这条人行道上。三年级的期末考试很难，但他顺利通过了所有的考试。他带到家里的好分数却无法让母亲高兴起来。那种隐隐的悲伤，妈妈那最后的悲伤，又重新回到了他的身上。

他感觉到凉气直钻到他的腿上，推动着他朝前走去。他的视力并不太好。不过他还是看到劳费尔店里的百叶窗打开了，里面的灯光照亮了货架。恰恰就是那个货架吸引着他的视线。奇怪，他沉思着。物的存在可以一直延续更长的时间，因为它们只是被动地承受，否则就无法理解它们怎么能够历经这种种变

迁而依然如故。或许可以这么说,它们缺乏敏感性。他依然站在那里——店里的灯熄灭了,一道薄薄的暗幕降落到橱窗中。

此刻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那里,温和的气温让人说不出究竟是好还是有害。身上的衣服让他感到温暖,脚上的鞋子也保护着他。他走过“花束”门口,走过酒馆,他见到过的人们此刻迅速地从他面前闪过。有人进了杂货店,有人进了面包房。新鲜面包的香味在空气中停留片刻便又消散了。

此时他才发觉:在他到来之前盛开的鲜花已经凋落了,就像从来未曾开放过一般。树叶依然保持着绿色,果实正在成形。如果不是这场即使是在开阔的广场上也飘散不开的雾,他可以看到在罗森博格家的墙上,夏季的雨水所留下的几个深深的印斑。

不知怎么他想起了苏茜跪在女友的脚边,试图让她平静下来的样子。当她示意他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她的手势也是同样奇特而激烈。仿佛她手里牵着一条危险的狗。不过现在,相隔数日之后,他从她的动作中看出了一种母性,一种绝望地袒护着捣蛋的孩子的母性。她们俩总是紧紧相连,希尔是这么说的。此时他才理解了这种关系个中的酸楚,此刻他才理解了希尔告诉他这个残酷的秘密时目光中的含义。他就这样一路走一路沉思着。雾气无力地收缩到树干底部,润泽的晨光跃入顶部的树枝中。

他依然沉浸在自己的思索中,突然发现那个日本人正走近

前来。已经好几天没有见到他了。他一度想要朝旁边走去，可是那日本人已离他很近了。他身材矮小，体格健壮，没有刮胡子，就像刚从凶险的战场上下来。

“你还在这儿?”日本人问道。尽管他努力装出很自然的样子，可是声音听上去依然显得无精打采，意兴阑珊。

明天他就要离开奥地利。他无法再继续忍受这个陌生的异乡。如果他要继续完成学业的话，他会在东京继续上学。他问了一声“希尔还好吗”就笑了。他在这里失去了生命中两年的时间，希尔也属于这失去的一部分。现在他必须弥补这一段失去的时光。他说的德语含混而错误百出，尽管如此，他的意思还是表达得很清楚。他不会从这里带走任何东西，就连对希尔的记忆也不会带走。他带着几分哀伤严肃地说着。他的神情比言辞更为坚决。他们握手道别。日本人穿过街道，两条短腿敏捷地钻入了近旁的小巷。

不知不觉间，他发现自己又来到了狭窄的格拉本巷。晨雾散尽，夏季雨水那种好闻的气味在这里依然保持着清新和纯净，盖过了所有伴随的气息。在酒馆里坐着进餐的是店主和他的老婆。他们只是坐在那里吃着，互相没有说一句话。那男的看上去很年轻，大概有三十五岁的样子，不过他的长相简直就跟火车站旁的那个士兵一模一样。他会拼命地把人们推入挤得满满的车厢。他们还活着，布鲁诺自言自语道，就好像他从来没有对自己说过话似的。

时间已经到了十一点，肚子里的饥饿感让他回过神来。他正好站在一家餐馆的门前，于是他就要了煎蛋卷和加奶的咖啡。晶体管收音机里发出的富有节奏的音乐倾泻到这个沉闷的空间。餐馆老板不顾应有的礼节，把盘子和咖啡往他面前一放，连声“请用”都没有说。布鲁诺明白，这个人正在气头上，根本无心招待客人。他就坐在和露易斯一起坐过的位子上。想起了露易斯也未能触动他的心弦。他付了账就快步走了出去。餐馆老板用不满的目光久久地盯着他。他一度想折回头问问他的敌意是什么意思，可是那人已经径直走进了厨房，身后传来砰的一声沉闷的关门声。

空气中有种潮湿难耐的气味。布鲁诺忘了这是个多雾的季节。雾气已散，但空气却并没有恢复清新。背教者菲尔斯特站在他的店门前，吸着烟斗。他的站相已然显出老态。

他在“花束”门前遇见了希尔。她的脸色很难看，穿着也很凌乱，浑身上下一副受尽屈辱后被人从酒吧里扔出来的酒吧女郎的样子。几天前她跟酒吧老板吵了一架，丢掉了她的职位。她疲倦的脸上刻着几道硬痕，就像一个已经做了决定但却不知该如何行事的女人。由于不知如何将决定付诸实施，可以看出她正在折磨着自己。“我们要遭殃了”，她脱口而出道。布鲁诺试图劝慰她，但她却无动于衷。我们要遭殃了，这几个词此刻听上去就像一声声重重的敲击。希尔不知怎么说起了到酒吧干活以前的日子，说到她的家庭。在学校里她没有待多久。代数和

拉丁语——简直是一场可怕的噩梦。她把坏分数带回家,她的父亲就会嚷嚷着说把钱都浪费了。她的母亲血管里流着犹太人不健康的鲜血,没有几天可活了。无论怎样,她都别无选择,只能出去工作。她开始是在“洲际”饭店做女招待。应该承认,那的确是些好日子。就好比将酒精溶入了渴望着酒精的身体一般。可是后来的日子却将这些好日子吞噬得一干二净。布鲁诺想要转移她的注意力,就说道:“这里的一切都让我觉得了如指掌。”他平淡无奇地说出这句话,希尔听到了这句话,仿佛只是不经意地得到了一个信息。她难看的脸色越发苍白,突出的指关节暴露了她隐隐的伤痛。

“你会找到另一份工作的,”他说。这种表面上的安慰却在她的眼中点燃了暗绿色的、敌视的目光。她说:“难道你以为他们不知道我是谁吗?我父亲只管用尽各种渠道传播消息。体面的俱乐部不会雇我了,甚至连做女招待也不行。”

“如果是我就不理他们,”布鲁诺说。

“说说容易,”希尔说。

他一下子不知该说什么,于是站起身来说道:“我们先结账,结账。”隆卡从他那儿收了硬币放到账台上。

“你认识菲尔斯特吗?”他在街上问道。

“烟草店的老板。”

“你知道,他是个背教者。”

“我,”希尔说道,“我不喜欢去揭别人的老底。”

说完这几句话，他们就分手了。希尔既没有说声谢谢，也没有问什么时候再见。她那瘦削的面庞沉浸在冰凉的绝望情绪之中。布鲁诺没有去拦住她，也没有问，你要去哪儿。他想要一个人独处的愿望，这种自私的愿望，毫无阻拦地完全控制了他。

一连几个小时，他漫无目的地游荡着。一股陌生的力量积聚在他的脚趾间，他的脚步越来越轻快。如果不是夜光照在他身上，他会跳到河里并能横渡过河直到对岸。这一夜余下的时光他是在酒馆里度过的。

他一边喝酒一边迷迷糊糊地打着瞌睡，他突然发现了在这里逗留期间一直躲避着他的每件事：耶路撒冷。伊本格列维尔大街上的树木将树荫投射在人行道上，清凉的微风沿着街道吹过。两位老人正要向右转进阿布拉本纳尔大街。米娜站在窗前，视线始终没有离开过那两个老人。

耶路撒冷的最后那几天，那些烦恼与争吵。米娜坐在沙发上，饱满的眼中没有了爱。第三次、也是最糟糕的一次流产彻底夺走了她最后的柔情。她的双唇紧闭，身体的动作屈指可数。她没有做过一个多余的动作。可是恰恰是米娜这种让他并不习惯的决绝态度，唤醒了在他体内沉睡的不安情绪。米娜又回到了已被忘却的论文中去了。书和笔记本摊在书桌上。当布鲁诺说，“你为什么不歇一歇?”她说，“我不需要休息。”她饱满的眼睛里没有了爱。秋天转瞬即逝，寒冷的冬天把她包裹得更加密不透风。她一天天地离他越来越远。她那穿着羊毛袜子的双脚

只是加深了这种陌生感。于是那些信件来了,来自维也纳的对他父亲的赞美和颂扬之词。米娜并没有对他说,该这样做或是那样做。她沉浸在自己将要完成的论文中。他也不再向她诉说心里话。

二月里米娜从大学里浑身湿透地回来,裹上毛毯。她坐在床上的样子没有任何美感。当他告诉她,“我要走了,”米娜并没有问,“去哪儿?”她饱满的眼中凝结了多种色彩,一种刺目的绿色闪烁其中。

于是就像跳入河里一样——他走了。米娜送他到卢德机场。她的眼中没有了变幻的色彩,那一抹绿色已经在眼中凝固。

“啤酒?”女招待问道。

“白兰地,如果可以的话。”

“晚上这个点儿已经禁止提供酒精饮料了。”

“这样,那就来啤酒吧。”

布鲁诺喝完又添了一杯。就在他添酒的当儿,米娜的眼中又显露出另一种色泽,是那种让他爱到心痛的紫色。此刻他明白。那不是她,而是她身上的某种东西。聚集在她床前的那众多医生。那些提问。格拉奥大夫的目光。那姗姗来迟直到他们走后她才骤然爆发出来的痛哭声。不过第二天她的眼泪就流干了。她也不再要糖果了。

到了周末他用出租车把她接回了家。她迈着坚定的步子径直走去。她紧紧包在密不透气的鞋中的双脚露出青色,就像被

人打过似的。她没有问,“送我回哪儿?”她回到了她的笔记本中间。她的父母将太多的苦难传承给了她。她的父母相遇在奥斯威辛。从那里出来之后的第一年他们生下了米娜。那时他们都已经不年轻了。米娜出生在那不勒斯,在海滩上。

“奇怪,”布鲁诺说道,“我们从来没有说起过这些事儿。”米娜总是说,“有什么可说的,我的父母既没有传给我美貌也没有传给我荣耀。”布鲁诺也很少谈到过去。他的父亲。他的父亲,那无法愈合的伤口。

“我该付多少钱?”布鲁诺边问边走了出去。

10

夜幕降临，涤荡在河面上那不断闪烁的光泽中。他站在狭窄的格拉本街上，离开那家面包房有一段距离，他已经有种感觉，他在这里所发现的一切又将重新返回其隐藏地。他站在那里，突然发觉在公园的椅子上坐着一个男人。那人安静地坐在树荫的环抱之下，仿佛又被裹在一层沉寂之中。

"你好，"传来一个声音。

"奇怪，"布鲁诺对自己说道，"现在我所挂念的一切都已经结束了。他还想要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呢？"

"我是布劳姆。"

"我真高兴，"布鲁诺说道，他听见自己的声音仿佛是从一台无线电中传来。

他一边说一边靠近他，布劳姆站起身，挺直身子面对着布鲁诺，他似乎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才做出这个动作。

“你好吗?”布鲁诺对他说,“我能邀请你去喝一杯晚上的咖啡吗?”

“你怎么会想到请我喝咖啡?”布劳姆的话中带着不少嘲弄的口吻。

“以老交情的名义。”

“我已经把自己和你所谓的老时光彻底断绝了。轮回前世只会让我感到恶心。”

“要是那样的话,那我就对你说声对不起了。”

“你在这里待得太长了。”布劳姆用一种小官僚特有的不容置辩的权威口气说道。

这句不经意间平静说出的评论让布鲁诺打起了精神,他说:“每个人的愿望都应该得到尊重,”又立刻加上了一句,“我们怎么生活没有必要经过你的允许。”

“对,你也许说得对,不过就算是这样,你跑到这里来搅起恶灵也不是什么好事。”

“恶灵,你说的是恶灵?”

“对,不是别的。”

“我要求你收回这句话。”布鲁诺被激怒了。

“不,我不会收回这句话的。自从你来到这里,这里就越发地不平静了。又是犹太人。又是这样的噩梦。这一切不都已经结束了吗。”

“不,还没完。”布鲁诺生气地说道,“就我而言,没完。”

“我，”布劳姆说道，“我求你用用你的常识，别唤醒那些恶灵，别把他们召唤来。”

“这太荒谬了，”布鲁诺说道，“从你的嘴里听到这句话更是加倍的荒谬。”

“我看你是本性难改。犹太人一直都是一样无礼。”

布鲁诺听到他赤裸裸的话语，立刻冲到布劳姆跟前，抓住他的衣服，用有力的声音说道，“我不允许你嘴里说出反犹主义的言论。我期待你至少还能有少许悔悟。”

布劳姆似乎被这种剧烈的身体接触惊呆了，他挣脱开自己的身体，挥舞着手杖说道：“犹太人吓不倒我。”受辱的感觉燃烧着布鲁诺的双手，他又一次抓住他的上衣，一把把他推倒在地上。布劳姆直起腿，一边用手把上半身支撑起来，嘴里一边嚷嚷着：“我恨那些不知道分寸的犹太人。”布鲁诺的双手充满了一种陌生的力量，他弯下腰，一巴掌打在他脸上。出乎他的意料，布劳姆没有发出一声求救，而只是把头轻蔑地转开，仿佛他的对手并不是一个活人，而是黑夜中的幽灵。

“这下你会觉得轻松点了吧，”布鲁诺说着退后了一步。夜色照亮了布劳姆挨过打的脸。他的胡子上流下了一道细细的血丝。“现在你可以继续发表你的论点了。”布劳姆没有吱声。只是用袖子擦了擦湿淋淋的胡子。他的脸此时变得那么丑陋，直让人起鸡皮疙瘩。他的右眼珠飞快地转动着，仿佛想把自己的目光往里掉个个儿，直看到自己的后脑勺，左眼却毫无反应。

"别起来,安静地躺下,"布鲁诺下了一声命令就走开了。

当夜他就收拾起行李箱,把衬衫和小纪念品都塞进了箱子。鼓起的皮箱仿佛挺着一个圆滚滚的大肚子。想到布劳姆此时仍然躺在公园里,并没有让他感到害怕。他感到手上仍然燃烧着奇怪的邪火,就像那股依然在他的指间绷紧的陌生的力量一样。他结清了账单,又单独给女招待付了小费。老板娘不无嫉妒地眯着眼看着他把钱给了女招待,说道,"图塔尔,你总是能趁火打劫。"有种奇怪的情感告诉他应该回到公园去看看布劳姆是不是还躺在地上。但是困倦感袭来,他阖上了眼皮。睡眠让他暂时得到了解脱。清晨他早早起了床,提起箱子,也没有向任何人道别就朝着车站的方向走去。早晨的咖啡他是在一家小店里喝的。

咖啡有些苦,他就像喝酒精饮料一般一滴接一滴喝了下去。货栈的大门紧锁着。第一缕晨光摇曳在屋顶的边缘。那趟慢车六点钟到,他听到女招待的声音。就是这样,都结束了,他的脑海里闪过这几个词儿。他觉得很轻松,一种从沉睡中醒来后的轻松,他只是感到自己的膝关节,不知为什么还有些沉重。他又要了一杯咖啡,加了糖,又加了奶。他机械地调着咖啡,这却唤起了他的惜别之情。柜子里的蛋糕看上去干巴巴的,不过他还是要了一块。女招待把蛋糕放到他面前,他把蛋糕浸到咖啡里。现在是五点半,明媚的晨光从花园里一点一点地透出来,撒落在石板铺成的广场上,广场上湿漉漉的。他没有留下任何的记忆。

似乎一切都被撕裂了，连一丝痕迹也没有留下。

“火车什么时候到?”他问道。

“六点钟，”女招待说道。

“准时吗?”

“大多数情况下。”

奇怪。这几声问答在他听来只是几个光秃秃的单词。隐隐的疼痛，昨天晚上残留下来的疼痛，此刻传导到他右侧的大腿上。他站起来，向后伸了个懒腰。挺直身体朝着亮着灯的站台方向走去。

布劳姆，你有权对我提出控告，他一边说一边已经走上了站台。他的脸上不由自主地微笑着。这些话也是他不由自主地说出来的。他站了许久，脑子里空空的，什么也不想。茫然中他的目光对准了闪烁的铁路信号灯——等待着那块包着黄铜的木板垂落下来，机车也即将在汽笛长鸣声中开出一条通路。